

2002

12

总第 129 期

炎黄春秋

周恩来宋庆龄交往半世纪

叶剑英一生两件大事

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几点思考

黄宗英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

袁殊谍海风雨十六年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天坛圜丘坛

炎黄春秋

春秋笔

- 1 周恩来宋庆龄交往半世纪 杨明伟
- 8 叶剑英一生两件大事 王文理
- 亲历记
- 9 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 黄宗英
- 12 “一二·九”学生下乡宣传亲历记 霍 泛
- 16 我在非常时期接触的特殊人物 江春泽
- 22 “五七”干校祭 季 音
- 英杰谱
- 27 罗荣桓和他的家人 崔向华
- 一家言
- 30 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几点思考 李靖炎
- 求实篇
- 35 陈昌浩的功过是非 鄢烈山
- 人物志
- 40 国民党元老吴铁城的宦海浮沉 方 可
- 45 佟麟阁——抗日名将殉国第一人 熊先煜
- 48 孙中山挚友陈友仁 钱玉莉
- 人海浪
- 52 袁殊谍海风雨 16 年 尹 骐
- 他山石
- 60 苏联剧变的再思考 田 森
- 遗闻录
- 66 汪精卫何以曾为孙中山的“接班人” ... 王 勇 那孝伟
- 古今谈
- 68 钱镠铁券千年播迁记 钱听涛
- 文荟园
- 70 朝鲜前线第一个《人民日报》记者李庄 申 春
- 72 东北大野诗人穆木天 穆立立
- 75 三十年代电影童星张帆 宫洁民
- 九州景
- 76 绍兴女侠丰碑——风雨亭 程竞明
- 总目录
- 77 《炎黄春秋》2002 年(1—12 期)总目录 本刊编辑部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杜润生
任仲夷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国琦 郑 惠
范敬宜 凌 云 曾彦修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吴 思 刘家驹 庄建平

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 郝爱存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编 100045

电话: 68532569 68534879 68532048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 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 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 4.80 元

周恩来宋庆龄 交往半世纪

● 杨明伟

周恩来严肃地对红卫兵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卷起，幼稚无知的红卫兵“小将”在全国各地进行了时髦的“破四旧”和“抄家”活动。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虽然作古多年，但仍免不了被“破”的厄运，南京的红卫兵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逼得中共中央不得不表态；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尽管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她在北京的家也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

1966年9月1日，周恩来对首都红卫兵发表了郑重的讲话：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

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这番斩钉截铁的话，使头脑发热的红卫兵们稍稍清醒了一些。

宋庆龄的一生，周恩来是最了解的。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过程中，宋庆龄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结成了患难与共的朋友。

……

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是宋氏家族的二小姐。她有一个姐姐（宋蔼龄）、一个妹妹（宋美龄）和三个弟弟（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这兄弟姐妹六人，后来成为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

宋庆龄早年曾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1908年到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理安女子大学留学。回国后，于1913年任孙中山的秘书，追随这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1914年，她加入中华革命党，次年10月与孙中山在东京结为伴侣，从此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时，宋庆龄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掩护孙中山离开险地。之后，在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磋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过程中，宋庆龄帮助孙中山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改造国民党的措施。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为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于国民党“一大”召开后的6月16日,在广州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办了著名的黄埔军校,并亲自担任该校的总理。这年9月初,周恩来由欧洲归国到达广州,不久,便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1月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把军校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周恩来就是在这时期结识宋庆龄的。

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曾特邀总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到校讲演,对师生进行革命教育,鼓舞大家的士气。宋庆龄的讲演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年轻能干的政治部主任,也给孙中山和宋庆龄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半个世纪后,宋庆龄曾回忆道:“在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1926年12月,宋庆龄随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搬到武汉。不久,蒋介石自立中央,宣布国民政府在南京办公,形成宁、汉对立局面。在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暴露出来、离孙中山的遗愿越来越远时,宋庆龄团结国民党左派,站在了共产党人一边。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她仍真诚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战斗。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当天,周恩来出席了在南昌召开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以及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当时虽在上海,但她“公开宣传支持南昌起义”。当天,她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领衔与毛泽东、董必武等21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发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可耻行为,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这一宣言在当天南昌出版的《民国日报》上发表前,由周恩来

亲自改定。周恩来与宋庆龄的这种精诚合作,从此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程。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于1927年9月流亡莫斯科。她继续撰文,盛赞中国共产党人所发动的武装起义,“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它将“遍布国内各地”。这时的宋庆龄,显然已经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前景。宋庆龄回国后,仍旧不遗余力地支持周恩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

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间,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上海进行艰难的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得到了宋庆龄等人的大力帮助。宋庆龄甚至冒着危险,将一批中共中央秘密文件,其中有周恩来用“伍豪”签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妥善地藏于自己的住所,避免了国民党特务的疯狂搜查。

抗日战争爆发,宋庆龄对周恩来表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她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同心援义战,大海汇百川”。

“七七事变”的当天,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飞离延安抵达上海,将要去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谈判有关事宜。在上海,周恩来等人专程探望了宋庆龄,征求她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

这天,当周恩来、博古、林伯渠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住处时,宋庆龄亲自到大门口把周恩来等人迎进客厅,并高兴地说:“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路上辛苦了!”

自西安事变以来,她对中国共产党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极为赞赏,更钦佩周恩来等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胆识和勇气。当她听完周恩来当面介绍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看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后,她对中国抗战的前途更是充满了信心。她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主张,愿意为促成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尽力,并说:“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

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这次重逢，宋庆龄专门派人上街购买了丰富的食品，留周恩来在寓所吃饭。

7月中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到庐山同蒋介石等人会谈，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个月以后，淞沪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在这种危急关头，周恩来拍电报给宋庆龄，请她撤离上海。起先宋庆龄想坚守故土继续战斗，但在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宋庆龄听从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意见，于12月23日在路易·艾黎的陪同下，惜别上海莫里哀路29号孙中山故居，秘密离开上海，乘轮船来到香港。

到香港后，宋庆龄为配合、支持大陆的抗战，积极筹建“保卫中国同盟”，以争取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援助，共同为国内的抗日战争作贡献。

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8月初，中共长江局特派邓颖超到香港，会见宋庆龄和何香凝等人，邓颖超还约请宋庆龄一起去广州，推动广东以及华南的妇女爱国活动。宋庆龄欣然允诺。不久，她们悄悄离开香港来到广州。在宋庆龄和邓颖超等人的推动下，9月19日，广东妇女团体抗敌工作协会在广州正式成立，宋庆龄担任了名誉会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多次致电廖承志，让他保证宋庆龄等人安全撤离。他还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速派人帮助孙、廖两夫人等人离开香港。为此，中共中央发出特急通知，指示广东地下党组织尽全力确保宋庆龄的安全，护送她安全离开香港。就在日军占领香港的前几个小时，宋庆龄得以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港前往陪都重庆。

到重庆后，宋庆龄遭到国民党的监视。国民党特务们都知道，这位“国母”与共产党和解放区有密切联系，她倾向共产党和进步力量，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因此，对她限制更多。但在重庆期间，宋庆龄却有较多的机会与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局的同志们见面，并经常保持书信联系。

1942年，保卫中国同盟也从香港迁至重庆，



孙中山与宋庆龄（1920年）

但工作举步维艰。5月，周恩来致电避居澳门的廖梦醒，请她偕女儿前来重庆。廖梦醒到达重庆以后，一方面担任周恩来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另一方面协助宋庆龄开展“保盟”的工作。“保盟”的工作恢复后，迅速在重庆等地募集抗日捐款，并通过周恩来领导下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转交给解放区的军民。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打败侵略者、反对反动势力和拯救中华民族的共同事业，宋庆龄和周恩来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1942年冬，董必武等人要返回延安，宋庆龄特意在重庆自己的住处举行了一个茶餐会，邀请周恩来夫妇、冯玉祥夫妇等人参加。当周恩来入席看到宋庆龄安排的一桌丰盛菜肴时，风趣地说：“我到孙夫人府上打扰已非一次了，不过，容我率直一点说，似乎没像今天的菜蔬这样有风

味。我今天是跟董老沾了光，饱了口福。”

这天，宋庆龄的壁炉架上正好挂着两株金灿灿、黄澄澄的稻穗，这是秋天宋庆龄到农民家里访问时专门带回来的。大家对这两株禾穗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宋庆龄便从壁炉上把它们取下来，托在手上，深情地说：

“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是比金子还要宝贵吗！”

周恩来走过去接过禾穗，动情地抚弄着说：

“孙夫人说得好，人人都有工作做，人人有饭吃，这一天不会很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有好日子过，会有这一天的。孙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设想会实现，一定会实现的！将来革命胜利了，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

周恩来的设想，后来变成了现实，在新中国的国徽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上，都庄重地画上了两把金黄的禾穗。

新政协会议即将召开，毛泽东、周恩来特派邓颖超迎接宋庆龄北上，共商建设大计。周恩来恳切地对宋庆龄说：“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人员撤离南京，飞返延安。在走之前，周恩来最后一次与宋庆龄见面，是在九、十月间，他为了抗议国民党拖延和破坏谈判，愤然退出南京谈判，来到上海。在上海期间，他多次访晤宋庆龄，商讨局势。

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始终惦记着宋庆龄的安全，12月17日，周恩来又通过英籍华人陈伊范（Jack Chen）带信给宋庆龄，信中说：

亲爱的夫人：

我们回到延安已将一月，延安的朋友们都惦念着您，感谢您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中国人民只要坚持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度过这一历史上的困难时期，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

来。我们很敬佩您的努力，尤其愿分担您在这一历史困难时期所遭遇的困难。我们相信您的努力绝不会徒然的。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您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

请接受我及颖超的敬意及关切。

到1949年春天，全国解放在即，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筹备中。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派与宋庆龄交谊很深的邓颖超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6月1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1949年6月19日

两天以后，周恩来也亲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专上。敬颂

大安！

周恩来

1949年6月21日

6月28日，邓颖超带着这两封分量极重的亲笔信，和许广平、罗叔章一起，南下上海。

6月29日，宋庆龄接到信，她欣然同意随邓颖超北上。

由于身体原因，宋庆龄和邓颖超等人延至8月下旬才动身北上。8月28日，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宋庆龄乘坐的当时条件最好的火车来到

北京。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各方面人士早已迎候在站台上。

等宋庆龄稍事休息后，9月6日，周恩来主持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全体会议，欢迎宋庆龄就任筹委会主席，并讨论有关事宜。

9月21日，周恩来和宋庆龄等人一同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台上面并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这使宋庆龄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切、欣慰和振奋感。之后，周恩来和宋庆龄同被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大会闭幕时，宋庆龄被全体委员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来被选为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更加注意在重大问题上征询和汲取宋庆龄的意见；重要会议，请宋庆龄参加；国内、国际的重大问题，经常向她通报；对宋庆龄分管的工作，更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宋庆龄经常往来于上海、北京之间，她与周恩来除了面谈以外，还时常有书信、电报来往。

1950年5月24日，周恩来拍去一封致“上海宋庆龄副主席转中国福利基金会”的贺电，称：

6月1日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十二周年纪念，特电致贺，并祝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为新中国的人民救济福利事业而努力中获得更大成绩。

宋庆龄为周恩来的细心和周到所感动，她立即回了信。

这年8月，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福利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恰逢周恩来和邓颖超“银婚”（25年）纪念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从来不着意向谁提起这个日子，也不主张去纪念它。可远在上海的宋庆龄却挂记在心上。8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她特意发了一份贺电：

北京政务院周恩来、邓颖超同志：

你们在结缔二十五年中共同推进伟大革命事业，遥祝伉俪幸福与年俱增，欣逢佳期，特电奉贺。

宋庆龄

这份电文，包含了宋庆龄对周恩来、邓颖超诚挚的友情和几十年做事、为人的崇高品格。

周恩来与宋庆龄的交往及友谊，还蕴涵在日常生活小事中。

宋庆龄初到北京前，周恩来为她寻找一处住地，最后勘定后海北沿的一套住宅，并派人修葺、整理，他还多次到该处去检查是否适合宋庆龄居住。每次有共同的外事活动时，周恩来总要提前安排好宋庆龄的休息，并嘱咐有关人员要照顾好宋副主席的生活。

宋庆龄对周恩来也非常关心。她每次从上海回北京，总要亲自带些礼品送给周恩来等人。有一回周恩来请人转告她：不要这样费心了。她不以为然地回答：这不是费心，而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安慰。

周恩来虽然常去看望宋庆龄，但宋庆龄却很少像建国前那样请他到家中吃饭。究其原因，她是这样给身边人说的：“总理日理万机，有空闲时间应让他多休息，不要增添他的劳累。”

周恩来指示有关人员：孙夫人的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她的事业是为人民服务；她的事业就是党的事业。

1951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亲自登门拜访宋庆龄，建议中国福利会创办一个会刊，以英文版的形式向国外介绍、宣传新中国，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建设情况。宋庆龄欣然应允，并与周恩来商议了办刊的方针、所需解决的问题。1951年底、1952年初，由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的《中国建设》杂志创刊。

尽管新中国的国内、国际事务异常繁忙，但周恩来仍然对中国福利会和《中国建设》杂志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对其工作给予了悉心的指导。

1957年，在《中国建设》创刊五周年之际，周恩来欣然为该刊题词：

继续作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对今后杂志的编辑方针等方面作了具体的指导。1958年，就如何进一步改进杂志，宋庆龄和有关人员都提出了一些设想。周恩来得知后，非常重视，他指示有关同志：要尊重宋庆龄的意见，“对于宋庆龄所指示的要保持杂志原有风格一点要特别注意”。



周恩来宋庆龄访问锡兰

1961年11月23日,周恩来为《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题词:

把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广更远,并且加强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团结。

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

周恩来

1961年11月23日

为庆祝这一节日,周恩来还偕同邓颖超亲自到杂志社看望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与大家欢聚一堂。

宋庆龄对此事印象很深。周恩来去世后,她重新发表前后两份题词,并深情地说:

这里我要提一下周总理给予《中国建设》的亲切关怀。《中国建设》是一本为了加强国外读者对新中国的了解而办的刊物。周总理为《中国建设》创刊五周年和十周年题了词。

对中国福利会,周恩来更是几十年始终如一地直接支持和亲切关怀。宋庆龄在1978年6月

总结《为人民服务四十年》时,特别提到周恩来对中国福利会的这种支持和关怀。

1958年,中国福利会度过了20个年头。5月25日,周恩来亲笔题词,祝中国福利会“发扬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增进中国妇女儿童的身体和精神健康,为培养新的劳动一代,作出更大的贡献。”宋庆龄后来回忆说:“从此,我们一直按照这个精神进行工作。”

1963年6月,中国福利会举行庆祝成立25周年酒会,特邀周恩来、邓颖超参加。会上,周恩来热情赞扬了该会在协助抗战、支援根据地建设,在妇幼保健、文化教育和对外宣传等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历来是具体而细密的。1964年,中国福利会下属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小足球队》一剧。周恩来亲临现场,给予很高的赞扬、鼓励。宋庆龄对此记忆深刻,她在《为人民服务四十年》(1978年6月1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文中还专门提及。

“文化大革命”中,宋庆龄理解周恩来的处境,她曾说:“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不知要搞成什么样子。”周恩来去世,宋庆龄痛惜道:“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和宋庆龄都处于极艰难的境地。此时的宋庆龄,也成了受冲击的对象。在这种特殊的局势下,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写下了13位民主人士的名字,第一位便是宋庆龄。

对宋庆龄的保护，周恩来除教育红卫兵外，他指示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杨德中亲自主管宋宅的安全工作。周恩来怕宋庆龄在上海居住不安全，特意恳切地劝她到北京来居住。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宋庆龄在上海和北京的两处住宅总算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然而，上海郊区一些无知的农民，掘开了安葬宋庆龄父母的宋氏墓地。宋庆龄得知后，格外愤怒。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掘坟的做法无疑是最令人悲伤、痛心的。她含着泪恳请廖梦醒立即向邓颖超和周恩来反映情况。周恩来得知后，与宋庆龄同样愤怒，他在百忙中立即给上海有关部门挂长途电话，指示重修宋氏墓地，妥善处理此事。1967年，上海市革委会民政局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重新维修了宋氏墓地。虽然由于“左”的思想作祟，重立的墓上，立墓人只刻上了宋庆龄一人的姓名，但宋庆龄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到这一步实属不易，她自宽自解道：“祖宗总算有个地方蹲了。”她还表示，对周恩来的这一恩情，她将永生不忘。

宋庆龄理解周恩来，认为他也极不容易。她曾说过：“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不知要搞成什么样子。”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周恩来最终积劳成疾，癌细胞逐渐扩散。宋庆龄得知后，极为关切。1975年9月，当她得知江青在周恩来病重中还闯进医院干扰他治疗时，异常憎恨。她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了陈翰笙：“我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周恩来同志的病情严重，而江青还闯进医院撒泼……”

宋庆龄听说鸽子蛋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她便把自己养的鸽子下的蛋一个一个积攒起来，派人送给周恩来加强营养；有一次，工作人员在她住处的南湖池塘中打捞上来一条少见的二十三斤半重的胖头鱼，她立即想到了周恩来，特派人给病重的周恩来送去；……她只想表示一点心意，祝愿周恩来早日康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耗尽最后一丝精力以后，与世长辞。宋庆龄得知噩耗，悲痛欲绝。她独自一人坐着流泪，常叹惜说：“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

此时的宋庆龄也被病魔缠绕，但她抱病参加

了周恩来的追悼会，与人民一道向“人民的好总理”默哀、鞠躬。

1977年1月，在周恩来辞世一周年之际，宋庆龄怀着沉痛的心情撰写了一篇全面评价周恩来的长文《怀念周恩来总理》，称：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我们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凡是这个潮流高涨之处，人们都怀念周总理，把他当做患难与共的朋友。

从20年代学生时代起，迨至1976年1月8日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周恩来毕生鞠躬尽瘁为人民。他的遗愿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为了让下一代缅怀周总理、学习周总理，这年，宋庆龄还指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举办了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努力继承和发扬“周总理留下的革命传统”。

1981年5月，宋庆龄病情突然恶化，15日清晨，邓颖超和彭真代表党中央又一次去看望宋庆龄。宋庆龄表示了长期以来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他们立即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建议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次日，邓小平专程到病床前向宋庆龄表示祝贺。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这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国家的又一位“好帮手”，离开了人世。就在她去世的前两天，邓颖超以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宋庆龄“景仰、热爱、钦佩和崇敬的革命情谊，积蓄在我的心头，现在像打开的闸门，再也无法抑制了”的心情，赶写了《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一文，高度概括了宋庆龄伟大的一生，称：

你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久经考验的前驱，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

你比荷花更高洁，比青松更坚贞。周恩来同志曾称你为‘国之瑰宝’，你是当之无愧的。

（责任编辑 吴明）

叶剑英 一生两件大事

● 王文理



叶帅参加南昌起义是一大功劳。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革命、中国武装力量的发展史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在准备过程中,被汪精卫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觉察到了,于是他们策划以邀请二十军军长贺龙、十一军军长叶挺到庐山避暑,商议军情为名而后逮捕,让二十军和十一军的兵力消灭叶、贺部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由于是张发奎的参谋长,他得到这个情况以后,邀请叶、贺,以划船观赏夜景为名,商议对策。最后决定,叶、贺部队开往南昌,成为起义的主力军。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汪精卫的指挥下,张发奎决定剿灭起义部队。叶剑英知道张发奎想在广东立足,而广东掌握军政大权的是李济深,他们之间有矛盾。叶剑英利用这个矛盾,站在张发奎这一边,说服张发奎放弃对起义部队的追击。我们设想一下,南昌起义部队当时连续作战,疲劳不堪,缺粮少药。在这种情况下,李济深、张发奎两面夹击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叶剑英参与南昌起义如此重要,可是中央领导当时没有及时对这次起义进行总结。起义后叶剑英仍留在国民党营垒里工作,当时他已经是共产党员,有一些情况中央领导当时是不清楚的,事后可以在国民党的档案里看到。叶剑英拿出了锦囊妙计,才保住了起义部队。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叶帅在千钧一发之际,把张发奎他们的阴谋通知起义部队,那么起义部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起义部队失败以后,如果没有叶帅的这个妙计,那么起义部队保留的一部分人又是什么样子?我们再回头数一数看,建国以后,1955年授军衔是十大元帅,南昌起义里有几个人呢?有八个人:朱德、贺龙、刘伯

承、陈毅、聂荣臻、徐向前、林彪和叶帅。可以说,南昌起义保留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精英。如果说,南昌起义和起义部队撤退时被国民党消灭了,我们可以想象中国革命胜利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叶帅第二个功劳就是粉碎“四人帮”。我认为现在对粉碎“四人帮”这个重大问题,对叶帅所起的作用,对所产生的影响这方面,我感到宣传得不够。我们回想一下,“四人帮”利用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已经掌握了党和国家中央部门的许多领导权,掌握了一些省、市、区的领导大权。他们就是没有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还补充一句,军队当时有一个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那时,小平同志是协助叶帅。因为1973年小平同志出来当总参谋长是叶帅提的名。小平同志有一次对主席讲,怎么让我当总参谋长,把我放在刀刃上呢?主席说,这是叶剑英同志建议的。所以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小平协助叶帅。军队基本上是叶帅手里掌握的。我们想一想,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等这一代老的革命家就不可能复出。如果没有这一大胜利,我们国家的冤假错案就得不到平反。如果没这个胜利,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无从谈起。或者粉碎“四人帮”出点纰漏,就要人头落地,国家要大倒退。我们应该对粉碎“四人帮”这一段历史给以公正的看法,不是说我们在叶帅身边工作的人,要给叶帅争功,而是说怎么样实事求是地、客观地把我党的历史,如实地把它反映出来,教育后人。(作者为叶帅的秘书)

(责任编辑 刘家驹)

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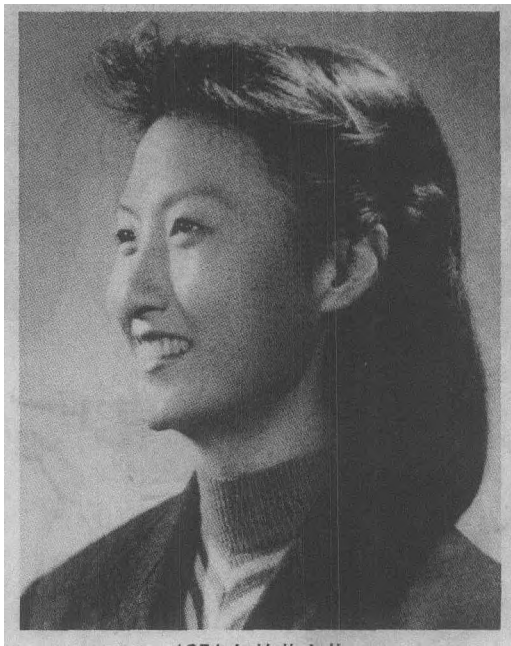
黄宗英

天地幽纷，忽明忽暗，疾电炸雷，交错震撼。我猛地惊醒，不知是梦是真？我又见到银发萧萧、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先生，他昂首健步向我走来……

莫不是刚看过草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铁骨铮铮罗稷南》搅动了潜意识中积存的情愫？我凄然想起30多年前死于肺癌的罗老，猛然悟到大智大勇者的死亡是他辉煌的永生。我好像又见他在马路对面笑着和我打招呼——恍惚记得前几天他才和赵丹一起散步，他俩依旧经五原路，过淮海中路，在思南路老文化俱乐部打弹子，吃西餐。罗老啊，如今你和阿丹在另一世界朝夕相处，两颗容不得些微渣滓的灵魂尽可像生前那样倾吐积郁，您为什么还来找我？

莫不是啊！啊一定是，一定是为那桩事——既非“军事秘密”，也非“党内绝密”，可竟然掖在我心角落里45年，从来没说过，从来没写过，不久前却由当年的后辈现今亦年逾古稀的周海婴给捅了出来……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段“罗毛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还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简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后，问他：“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



1951年的黄宗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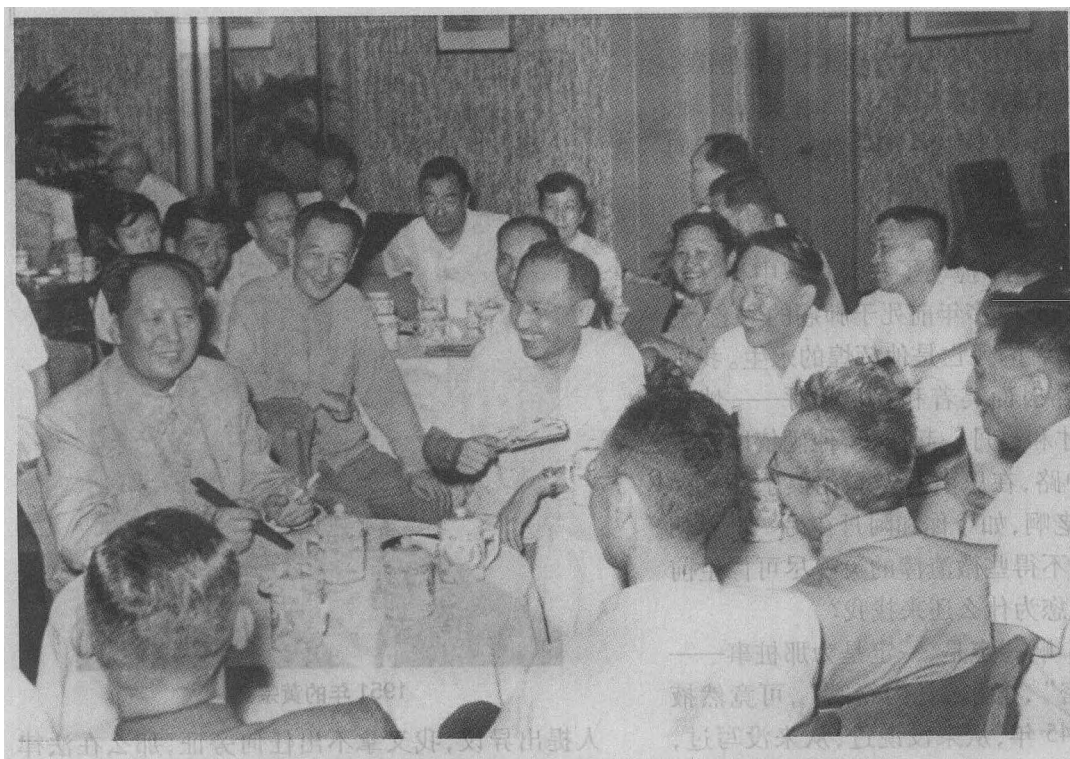
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看到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远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颤，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

作为经历过旧社会的演员，我曾在黑暗中憧憬、追索、企盼、等待，并一厢情愿就全心全意跟定了共产党，那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总结，年终鉴定，第一条就是听党的话。那怕是在某个早晨，我们突然发现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把

我吓懵了时,也是如此。(赵丹踏上26路车往徐家汇去电影厂时,售票员悄悄问他,“依旯没进去啊?!”——我们本来还以为深受欢迎的影片可能荣获“毛泽东奖章”哩。好在当时有于伶同志上门来开导,而黄源同志更常与阿丹对坐,一根接一根抽烟,黄源制服前襟落满了烟灰,显然领导人的思想负担比我们还沉重呢。)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们和党不隔心,还是一门心思为人民拍出好影片,只是……只是到反右时,党内传达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阳谋不是阴谋,我

言归正传。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漓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50年代领袖接见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安排。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在去年(2001



黄宗英(上左一)和赵丹(上左二)坐在毛泽东后面,下方左三为罗稷南

年)中国电影艺术资料中心为庆祝党的诞辰80周年摄影图片展览的版块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动笔前查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

毛主席接见上海各界代表人士

新华社上海8日电 毛泽东主席7日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并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毛泽东主席和大家围桌谈话约两小时。

参加这次谈话的有漆琪生、谈家桢、管移今、孙怀仁、周煦良、李锐夫、殷宏章、汪猷、应云卫、沈浮、郑君里、赵丹、金焰、黄宗英、陈鲤庭、章靳以、罗稷南、丁善德、陈大燮、武和轩、钱宝钧、傅于琛、丁忱、徐子威、蔣学模、刘念义、吴中一、李国豪、王元美、黄晨、苏德隆、陈铭珊、叶宝珊、聶傳賢、束世证、史森康等共三十六人。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书记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马天水等也陪同参加了这次谈话。谈话后,毛泽东主席并和大家一起观看了越剧。

才头一次陡地感到自己的心结凌挂霜了。那以后……那以后我才开始对政治有了神经兮兮的一面,虽然依然糊里马虎至今。

在“罗毛对话”后,赵丹和我曾让开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共36人),

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也来了。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来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外史》的大导演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只听出“苏区一别”的意思。还是此番为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秘书，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瑞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时毛泽东曾设宴款待陈小航。罗稷南有这番军旅经历，怪不得我以前总感觉到这位勤于笔耕的翻译家身上有一股军人的英武阳刚之气。怪不得了。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应云卫：“应家伯伯，依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眯

眯：“清爽勿清爽，当伊嘅介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满堂宾客他仿佛没有不认得的。（应云卫，这位老导演，老制片，“文革”中被拉出去游斗时猝死于街头大卡车上，颈上还挂着“大反革命分子”的沉重木牌。他被判定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直到1979年彻底平反时，电影圈内人才知道他竟是1935年单线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天地一舞台，人生一出戏”，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天才演员有他这等超凡的演技，实在是古今中外之一绝。老应啊，应家伯伯啊，我们大家好想你！）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剧团里还等着我（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哩。报上大标题的反右社论、通讯一篇比一篇“结棍”，《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人民日报》社论）、《人民代表揭露右派反动面目》（《光明日报》头条），而头版的右上角是毛主席接见我们，大家笑逐颜开簇拥着有说有笑的毛主席的大幅集体照片。我不敢再想7月7日晚上的“罗毛对话”，更不敢想“关在牢里”。不该想的偏又想：怎么没见什么文件、简报记载此事？我知道孕妇此时应该看最美的图画，听最美的音乐，可是又禁不住怯怯地问阿丹：“没听到批判罗老的提问吗？”阿丹神色严厉地“划”我一记：“依笨哦？！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阿丹这些日子特烦躁，他正为老友钟惦斐的《电影的锣鼓》和瞿白音的《炉边夜话》在挂钩上纲写检查。同时还要为参加中宣部一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讲话后与石挥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写检查。）于是我谨遵“非礼勿言”的古训，几十年来，几乎没跟人谈起1957年之夏，震撼心灵的一瞬间——发生于短短一分钟时间的“罗毛对话”。

此刻已是“罗毛对话”的45年之后，是7月4日的丑时。窗外接连雨声暴雷向我奔来。

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被吞噬了。

天与地汲存了此声此象，“对话”被刻入于宇宙文化之砾石。

（写于2002年7月4日 病中）

（作者黄宗英系著名作家和影星）

『一二·九』学生下乡宣传亲历记

● 霍泛

在北平学生举行“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抗日游行后的12月17日，北平共青团组织通知我：明天下午天黑前，你一定赶到北大农业学院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扩大抗日宣传团”的活动，活动的地区是冀中农村。这样做是为了掀起城市与农村密切结合的抗日救国高潮。此次南下共组成三个团，由北平城内各大、中学校组成的为第一团；由城外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两校组成的为第二团；由天津市各大、中学校组成的为第三团。我参加的是第一团。

我于次日下午七时左右到达农业学院，来的人已挤满了好几个教室。八时许，组织者宣布此次活动的任务，三个团的活动地区和南下的行动路线：第一团为中路，出北平沿河北省农村中部南下；第二团为西路，沿平汉线农村南下；第三团为东路，沿津浦线农村南下。宣传活动时间，暂定为一个月左右，最后三路总汇在高阳或蠡县。第一团约有400人，设总指挥部，部下依次编为中队、小队，我被指派为小队长。一切安排就绪后，当夜就整队出发了。

时令已是“数九”了，西北风有彻骨之寒。夜色如墨染，咫尺之间难见人形，只能听着前行者的脚步声前行；特别是为了躲开南苑一带的驻军，只得在迂回曲折的小道上行进，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一直走到晨七时，才到达一个村子。这时队伍疲惫紊乱，小队清点人数，比出发前减少了近四分之一。队伍严重减员，立即引起总团指挥部的高度重视，四五个负责人聚集在一起，经过低声商议，由其中一位向全体宣传队员讲话。他的讲话首先肯定了此次艰苦夜行，摆脱了反动当局的可能阻拦和冲击，取得了南下抗日宣传得以顺利展开的首次胜利，证明我们宣

传队的绝大多数同学是勇敢坚强的。接着他含蓄地批评了畏难退却的人，并热望他们的“一二·九”抗日爱国精神会长存不减。对他的讲话，全团报以热烈掌声。这时我才得知讲话者名叫董毓华，中国大学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也是本团的团长。听完董的讲话后，大家就地吃了一点冷馒头和喝了点冷开水，便乘着振奋起来的精神，搀扶着行动乏力和脚板负伤的同学，又继续向南行进了。

为了缓解疲劳，大家边走边唱唱歌。唱的歌主要有《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和在东北义勇军中流行的《义勇军歌》。前三首在学生中很为流行，其中第四首是在此次行动中，由一位新从东北来的同学教唱的：

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那一天，关东起狼烟！哎咳呀咳，关东起狼烟！

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不费一枪占了沈阳城！哎咳呀咳，不费一枪占了沈阳城！

妈拉个巴子太稀松，下令就撤兵，不到几个月丢了东三省！哎咳呀咳，不到几个月丢了东三省！

请看熙洽张景惠，甘心投降日本鬼，汉奸王八蛋！哎咳呀咳，汉奸王八蛋！

……

随着歌声与欢呼声，疲倦与困苦被忘却了。

二

队伍行进到一个大的村子里停下来，这里聚集了一大群农民。按照指挥部的指示，要在这里召开一个农民大会，还要我们立即分散渗杂到农民中间去，做面对面的抗日宣传。宣布开会和主持会议的，是本村一位中年教师。他说：乡亲们，今天突然召开这个会，是欢迎从北平来的学生抗日救国

宣传团。他们为了给咱农民宣传抗日,不辞辛苦走一整夜又半个白天的路,请乡亲们拍手吧,以表对他们的热烈欢迎!掌声之后,主持人便请宣传团的代表讲话。当即由总团一位同学,把最近敌人的种种侵略活动和全国人民奋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最引起人们振奋的是,有一位年纪已60多岁的农妇,主动要求讲话。由于她个子矮,会议主持人特地为她找来一张桌子,由几个人把她扶上桌子。她说:我听从关东逃回来的乡亲说,在关东凡是日本鬼子占了的地方,就抢掠、杀人、放火,有的地方整村都烧光了。被杀死的人不说了,就是活下来的人,也被当成牛马看待,难活下去!不抗日活不成!抗日就是救自己啊!我劝大家,不管是男人、女人、老的、小的,也不管是城里人、乡下人,都要一条心,要起来抗日!要抗日!要抗日!……话讲得言简意赅,特别是要抗日重复喊了几次,表达了抗日要求的紧迫,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与怒吼声!大会结束后,按照原定天黑前要赶到作为宣传重点之一的固安县城,宣传团只得匆匆赶路,农民齐集在村口,夹道相送,挥手告别。

三

我们以急行军的速度,在当日天黑前,到达固安城。

在宣传团还未到之前,固安县长已令将城门全部关闭,不仅宣传团不得进城,就连城内与城厢的居民,也不得进出,还在城墙上部署了警察和士兵,如临大敌。我们原来设想,依托固安县城为中心和住城里食宿安排方便的有利条件,展开对县城内外及周边一些农村进行宣传活动,后来这个计划难于实现了。全团300多人,只得散居在城外关厢的几家客店和居民家中。

反动县长这样做,引起宣传团的强烈愤怒,很快就有团员对这位反动县长编出了顺口溜:

一路风霜到固安,为了抗拒宣传团,
城门关了整三天,县长是个大坏蛋。

有人嫌“大坏蛋”不够味,将第四句改为:“县长是个准汉奸”。县长这样做,并没有影响宣传团的活动,具体安排是:一部分队员对守卫在城墙上荷枪实弹的二十九军士兵和警察进行抗

日宣传;又一部分队员在城厢向居民作宣传;其余队员安排到县城附近农村作宣传。其中对二十九军战士和警察的宣传最成功。一方面向他们说明国家危亡在即,而中央政府和冀察当局却步步屈从敌人,不抗日而热心于内战;另一方面介绍目前全国已出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大好形势。特别有针对性的说明现在是国难当头,亡国惨祸近在眼前,正是每一个军人尽忠尽职的时候,枪口如果不是对着日本人,而是对自己的同胞,良心上过得去吗?对得起出钱出粮养活自己的老百姓和国家民族吗?城墙上的士兵有几个人连连点头,表示对讲话的同情和赞同。有一个士兵用手指指向自己的心胸,示意自己是有抗日决心的。还有一个士兵,四指紧屈,拇指跷起,明示不但有抗日的决心,还要当冲锋陷阵的勇士。

全团300多人分散住在几家狭小的客店和一些居民家中。睡觉只能睡在阴湿的地上,没有盖的和铺的,就找来谷草,盖的除个别人有大衣可充当被子外,绝大多数人挤在一起和衣而睡。吃饭呢?每顿是冷馍、稀饭和外加几片咸菜。对这样的生活,有的团员编出了顺口溜:

摇、摇、摇斤馒头,小米稀饭玉米粥;
老咸菜,没有搁香油!

这样的生活继续了一个来月,由于长时间的和衣而睡,大家长了满身虱子。夜里不但冷得睡不好,虱子咬得更难受;每次睡下后,汗腥味又奇臭。对这样的生活处境,在所有宣传队员中,我没有听到任何怨言,反而“乐也在其中”,第二天走起路来,依旧是歌声不断。

四

在固安住了三天三夜,然后出发南行,天黑前赶到了下一个宣传重点——任邱县。

到达该县大辛庄的第二天,县长来了,对宣传团作了一次讲话。他首先声明是奉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宋委员长(宋哲元)之命来的。主要讲了三点:其一,抗日是政府与军队的事,参加宣传团的学生,不要为宣传话动荒废了学业,把书读好了,知识多了,对抗日和国家会做出更多和更大的贡献,同样有用于抗日。其二,现在正是“数九”天,老在乡下会冻病,政府对宣传团员健康是很关怀

的。其三，刘桂堂股匪正在附近流窜，万一把你们虏掠了，当政的实在承担不起责任。三点理由说完，最后归结成一句话，就是“我劝大家马上回北平去！”话刚一落口，宣传团员们不约而同齐声回应说：“不回去！不回去！还要宣传下去！”

第二天一大早，总指挥部传出消息：宣传团团董毓华昨夜被当地公安局扣押了。董毓华被扣押，显然是县长讲话失败后，对宣传团施以威慑手段，胁迫回北平。在董毓华被扣押的同时，二团行进到高碑店，就被警察、士兵武装押回了北平；三团还未步出天津市，就被迫解散了。

摆在我们眼前最紧迫的是如何设法救董毓华脱险。总团决定：于次日早晨派遣弘达学院学生会主席吴会同我和另一位同学，去找公安局长，要他把董毓华释放出来；如果谈判无效，就以拘押三位代表作为人质，把董解脱出来。我们三人立即从命。公安局长是一位近40岁的中年人，见面后，他的态度尚好。我们的谈话内容主要是：本团来到任邱县宣传抗日救亡，顺乎全国民心的爱国救国的大好事，而作为地方当政者，理应支持和给以方便，决不可加以阻挠与制造不应有的困难。宣传团在大辛庄已经两三天了，除向居民做抗日宣传之外，别无任何不轨行为。他听后微微点头，表示所言如实。我们接着说：既无不轨行为，抗日是所有中国人公认的民族自救的神圣事业，学生宣传抗日救国，非但无罪，而且有功。现在当政者有功不赏，反把积极抗日的董毓华扣压起来，其于理何！我们要求将董立即释放，以正爱国大义，顺应民心！如果不解脱董毓华，那就将我们三人监押，顶代董，使他获释！公安局长听后，沉默了一阵说：好吧！也无需你们三人来作抵押，我放人；但请保密，不要向外喧嚷。董毓华被释放了，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不可再公开活动，便秘密隐蔽回了北平。

第四天的下午，突然来了几十名武装便衣。可以看出，是一帮专门对付学生运动的特工人员和打手。他们来到大辛庄后，二话不说，先动手搜查有宣传团员居住的住户，只要见到宣传团的人，不是棍棒打，便是皮鞭抽，还边打边骂：“妈那个，看你们还宣传抗日不宣传！”有的宣传队员被打的头破血流，有的腿被打得走起路来成了拐子。宣传团的人很快被驱赶集中到一家大院子

里；紧接着又被押解转移到一所学校里，并强令宣传团员排成方队，就地坐下来，听他们的“训话”。训话者厉声说：前些日子用好话劝你们回北平，就是顶着不回去，看来你们是爱吃硬的不爱吃软的了！现在得捆着回北平去！全国有上百万扛着枪和有飞机大炮的军队，都不敢轻言宣战，就凭你们这些学生娃娃就能抗得了日？一天价空喊抗日！抗日！抗日是要动真枪真刀的，空喊宣传顶什么用？倒反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借口，说是政府利用学生来煽动抗日，违反了“睦邻友好”和“中日亲善”的外交方针，来向政府施加压力；甚至成为它发动新的侵略进攻的理由。你们这样做，真是无事生非，帮了日本人的大忙！训话说到这里，突然有一个女同学腾地站起来，严词回击他的训话：照你这样说，我们宣传抗日，倒反成了刺激和引来敌人侵略的原因，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而反对与阻挠抗日宣传，面对敌人侵略按兵不动，热衷于打内战和向敌人侵略步步退让、屈从，使敌人敢于大胆放手得寸进尺，致使整个华北五省岌岌可危，造成了今天这样极度危亡的局面，岂不成了国家民族的功臣！你们这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向敌人退让、屈膝的有罪者，不谴责，不惩罚；对积极宣传、组织抗日有功者，不但不奖不赏，反而进行镇压！请问：说出这样的话（“无事生非”），做出这样的事，还能算个中国人吗？说到这里，她沉痛地大声痛哭起来，全场也立即陷于无声的震怒中！训话的那个人，被这一痛快淋漓、针锋相对地反击，陷于理屈辞穷，无地自容。他恨怒至极，两手握拳，用血红的眼睛向宣传团横扫一遍，是要动武行凶了！在这紧急时刻，站在他身旁的另一便衣队员，向他摇头，低声说：罢了！罢了！反正明天要把他们押送回北平，任务也可完成了！

宣传团明天要被押送回北平，能束手屈从吗？总团领导经过密议，要求团员在前半夜佯躺装睡，等到后半夜便衣们沉入梦乡，宣传团员蹑手蹑脚，无声息地从后门溜出，开始了第二次长途夜行。由于有了第一次夜行的经验和近一个月行路的锻炼，于次日上午顺利赶到了高阳县城。

五

到达高阳后，只在县城的市面上，对来往行人

做分散的、小型的抗日宣传,同时为安排下一步行动举行了一场辩论。

会议在一个学校大教室里举行,议题是宣传活动已经进行一个月了,原定的终点是高阳或蠡县,这点已做到了。下一步的宣传活动如何进行?经过辩论,确定先到保定,然后回北平。于当日午前十时左右,整队向保定进发。

下午五时许,宣传团员手挽着手,列队进入保定市内,边行进边喊口号。口号除以往常喊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紧急行动起来武装保卫平津两市”和“武装保卫华北”等外,新增加的一条是“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游行路过的所有大街,除了来往行人观看外,没有看到一个警察或士兵,也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当游行将要结束时,竟有人来和宣传团领导接谈。接着便由来人把宣传团引领到保定私立同仁中学暂时休息;并分头把宣传团员安排到学生宿舍,这里已备有洗脸盆和面巾,木床上还铺放着被子,到了晚上,吃的又是白米饭和肉杂烩菜。

晚饭后不久,宣传团接得通知,要团员到学校礼堂听当政者的讲话。站在讲台上有三、四个人,由其中一个人开讲,大意说:同学们到农村一个月来的抗日宣传辛苦了。现在到保定来,我们深表欢迎和慰问!我们是热情支持你们的爱国抗日宣传行动的。当说出“热情支持”四个字时,马上得到听众的掌声。“一二·九”学运以来,当政者所作所为尽是反动的迫害与镇压,现在这四个字从他们嘴里说出,可说是破天荒的。他接着说:抗日救国是每个中国人的心愿,谁肯做亡国奴?你们读书人

积极抗日,执政当局和军队(意指冀察政委会和二十九军)也不例外,都是中国人嘛!只要政府抗日一声令下,我们决不会后人!(这段话又博得掌声)。你们到来,我们欢迎;要在这里继续做宣传活动,我们给予方便;要回北平,我们欢送!但在农村艰苦活动了一个来月,太累了,建议你们先休息一两天,再定你们的行动,这样可以吧?讲话到此就结束了。会后,有些宣传团员又在议论:有的说,这样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信得过吗?是不是又在耍花招,骗我们回北平?有人说,说的也可能是真的吧?宋哲元和二十九军是原属冯玉祥西北军系统的,不是蒋的嫡系,冯是主张抗日的,宋在古北口长城抗战,还是很坚决英勇的;只是由于南京政府坚持执行“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和先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才造成目前平津两市和冀察两省的特殊局面。让我们“听其言、观其行”吧!根据原来已定的回北平计划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总团就按当政官员所承诺的话,第二天在保定休息了一天,第三天坐他们安排的火车回到北平。平津学联组织的南下扩大抗日宣传第一团,历经一个多月胜利结束了。

(作者已87岁,是“一二·九”运动参加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西省副省长)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欢迎
订阅

安徽老年报

邮发代号 25-42

- ▲一版新闻、言论
- ▲二版卫生、保健
- ▲三版《枫林》副刊
- ▲四版中外文摘
- ▲月末版为生活版



增加知识, 开阔
眼界, 欢迎老年人订
阅, 欢迎中青年为自
己的长辈赠订。

全年 72 期, 订
价 21.60 元, 零售价
每份 0.30 元。

我在非常时期 接触的特殊人物

● 江春泽



薄一波

从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初,我先后被借调到中央所属的几个单位去临时工作。那正是我们党和国家风云变化、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我有幸在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与走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见识到一些不平凡的人和经历过一些不平常的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前面还有曙光”**

1974 年 10 月,我在北京大学被借调到人民出版社参加一个编书组工作。编书组的任务是编写苏联自 1953 年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一些统

计资料,供当时中央和有关部门了解外部世界情况参考。

编书组长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教师、统计学留苏副博士张康琴,她也是借调来的。此外还借调来三位教授,他们是:辽宁大学的宗则行、南开大学的滕维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王守海,其余大多数成员都是类似我这样的 50 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或留苏生。

编书组成立以后,全部成员集中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住宿。在这里我们看到原来的国家领导人,曾被“四人帮”关进监狱、刚被放出来的杨尚昆和薄一波。我们常看到杨尚昆和李伯钊的儿子每天都来招待所,陪因患脑血栓而行动不便的母亲去餐厅用餐。招待所里有个面积不大的院子,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那里看到薄一波在散步。他来来回回地走,尤其在邓小平复出的那段时间,看得出薄老的神情充满着信心和期望。起先,招待所的住客都不敢和薄老说话,日子长了,我们遇到薄老时,都带有人情味地向他点头致意,有时说几句与政治无关的话,薄老总是含笑回答。不料,招待所的负责人向我们打招呼了,说薄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要大家不要和他接触。

有一天,我去原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副所长樊元家里请教一些业务上的问题,顺便说起薄老在二招的情况。当时樊元的丈夫、原《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安岗也在场,他说他在晋冀鲁豫边区时是薄老的部下,他现在的名字“安岗”还是薄老给改的呢。

安岗很想去二招探望薄老,要我设法替他带个口信,以便薄老有个思想准备。好在薄老和我

们编书组同住一座楼，相遇的机会很多。我回到招待所以后，趁着在楼梯相遇的机会，我就既无自我介绍也不称呼对方，只用较大的声音说：“明天上午九点钟，请您在房间里等着，安岗要来看您。”这种特殊的带口信的方法成功了。据后来樊元对我说，次日安岗驱车到二招，直闯薄老住屋，薄老果然在等着他。安岗给薄老留下了自己住宅的地址、电话，还让薄老的孩子去安岗家拿书给他看。

可是好景不长，到1975年底，就在邓小平着手全面整顿、纠正“文革”造成的混乱、力挽中国濒临崩溃的经济之时，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滚滚而来，风声日紧。这时，在二招院子里看到的薄老，与前一段时期相比已判若两人，明显的苍老了，背有点驼，步履也艰难了，面部笼罩着失望与无奈的神情。大约半年之后，一个周末的傍晚，我从二招回家，在白石桥车站恰逢薄老迎面走来，与我擦肩而过。我按照上次替安岗带口信的做法，既不自我介绍又不称呼对方，只独自地说：“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前面还有曙光！”这是我见到老人面带愁容时突然发自内心的声音，其实我当时的心情也很抑郁，不知东方何时再白，曙光何时到来。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之后，竟然未响一枪一弹，横行了十年的“四人帮”竟顷刻间成了阶下囚！历史就是这样具有讽刺意味。

1980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参加经济调查工作，在中南海朱德同志原住处办公。一天中午，我去餐厅的路上，恰逢薄老从小汽车下来，他诧异地凝望了我一眼，也许是感到这个面孔似曾相识吧，轻声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我只简单地回答：“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借调来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我没有通报自己的姓名，更没有提及五年前在二招的往事。直到现在，薄老并

不知道我的名字。

给于光远通消息： “不要到编书组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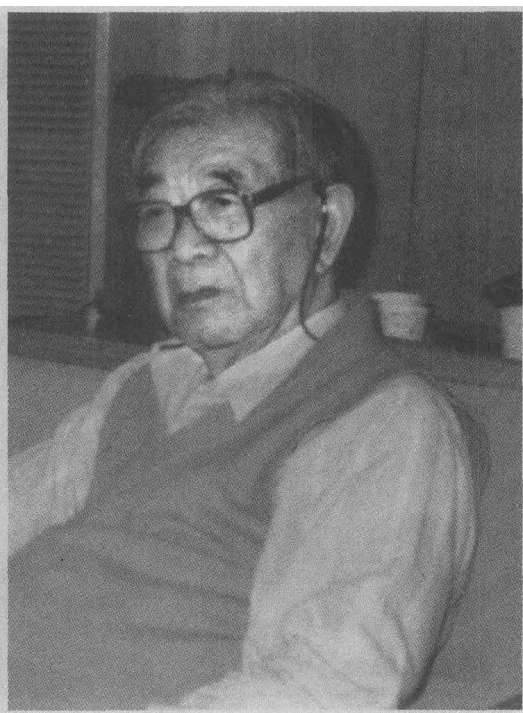
于光远是有独特见解的著名经济学家，我从学生时代就爱读他写的书。在我看来，于光远是“大师”一级的学者，是高不可攀的“大人物”。可是没想到我借调到编书组期间，却经常见到于光远，听他讲话，听他聊天。

于光远在“文革”前是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又是中央科学小组成员，后来还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文革”中他被打倒复出之后，1975年被任命为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7位负责人之一。当编书组刚成立时，据说于光远已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由宁夏“五七”干校返回北京，虽未正式分配工作，但行动上自由了。他常来编书组串门，编书组也欢迎他来指教。于光远知识渊博，既通晓社会科学，又熟悉自然科学，著述丰厚如山，视野开阔似海，见解新颖，是一个颇具魅力的人，大家都喜欢听他谈古论今，以开发思路。

不久国家出版局突然下发指示，要我们搜集汇报于光远在编书组的言论。编书组都明白，这

不仅是要批判他个人，更重要的是为“批邓”搜集“炮弹”。在这之前，他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强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及当时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负责起草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已经被“四人帮”定性为“三株大毒草”，号召全面展开大批判。

编书组召开过几次会，谁也讲不出于光远有什么“反动言论”，会上大家大眼瞪小眼，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我怕形势有什么变化，赶紧给于光远打了个电话，建议



于光远

他再不要到编书组来了。我说：“现在编书组成员都很好，没有人胡说什么，但运动深入了，压力加大了，会发生什么事，就很难说了，您还是少说话和不来为好。”后来，于光远果然就不来了。

1992年，我丈夫谢明干被派往香港任《香港经济导报》社社长，曾为于光远出版了一本线装的《碎思录》，于老很珍惜这本书，他赠给明干和我一帖字：

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

此为杜工部诗句，戊辰夏，胡耀邦曾以此见赠，今复书之，以自勉也。明干、春泽补壁。

于光远癸酉早春（印章）

他不仅亲笔写好，还装裱好，送我们留念。我们视它为有纪念意义的珍品，珍藏至今。

和耿飏在一个学习小组

1977年初，某日，北京大学人事处通知我，借调我去工作，并让我第二天就到钓鱼台去报到。

中宣部在十年动乱中被“四人帮”诬为“阎王殿”，给彻底“砸烂”了。现在百废待兴，来不及恢复部的机构，为了揭批“四人帮”之急需，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联络部部长耿飏兼职，牵头组织成临时班子，协助中央统管全国宣传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有：耿飏、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等5人。由耿飏抓总，朱穆之和王殊主持日常工作。宣传口全部工作人员仅20余人，只设办公室和业务处两个机构。我被分配在业务处工作。

中央宣传口每周一上午开办公会议，参加者除宣传口领导成员外，《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新华社社长曾涛、《解放军报》社长华楠、文化部负责人等参加，有时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

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也来参加。我们业务处干部一般都要列席记录。

当时工作人员集中学毛选五卷，耿飏也经常参加。在一次学习会上，耿飏同志详细描述了他参与粉碎“四人帮”的过程：

10月6日中午一点钟，叶帅给他打电话说，要交给他一个紧急任务。耿答：“坚决完成。”叶帅说：“好，待命吧。”当晚8时，耿飏由卫戍区一位军官陪同，带着华国锋的介绍信，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局长邓岗的办公室。耿向邓岗出示介绍信说：“华国锋同志派我们来协助你工作。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给姚文元打电话。”邓拿起话筒，犹豫了一下，但立刻就放下了，连声说：“不用了，不用了。”确实，党中央这时已经对“四人帮”采取了果断行动，姚文元已束手就擒，但邓岗此时并不知晓。耿飏随即让邓岗紧急通知广播局的核心小组成员开会，当晚他们就在会议室和衣而眠。耿飏顺利接收了中央广播电台。就在这天晚上，中央在玉泉山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叶帅的建议：华国锋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第二天就向全国广播了。

这段时期里，耿飏和宣传口的一般工作人员经常见面，平常在一个学习组学习。十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入政治局，分管国防与外交方面的工作，就不再兼宣传口的工作了。



耿飏

我所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些实情

我在中央宣传口工作的那段时间经历的重大事件之一，就是那场冲破“两个凡是”坚冰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我是这场大讨论某些重要事实的知情人与见证人之一。

十届三中全会后重建的中宣部，由张平化担任部长，中宣部决定把原来作为民主党派报纸的《光明日报》改变为面向科技文教界，要物色一位能正

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有思想文化战线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来担任总编辑。当时的中宣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戴云曾经是复旦大学地下党员，与我是校友。有一次他对我谈起要为《光明日报》物色一位总编辑时，我随即想到了原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曾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杨西光，杨此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所以我就对戴云说，杨西光也许是个比较合适的人选。戴立即表示赞同。戴早期在团中央工作时，曾担任过胡耀邦的秘书，后来去湖南搞“四清”运动时又与张平化很熟悉。因此，他随后就分别向胡耀邦（时任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宣部长张平化作了推荐。不久，杨西光就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

我此时还在中宣部参加全国宣传会议筹备组的工作，且担任调研组组长。我协助筹备组领导在北京和一些省市进行了大量有关拨乱反正的调查研究工作，召开过许多不同界别、不同层次的调查会，仅在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的省部级干部中就座谈过12次，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集中了很多“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材料，一面上报中央，一面整理出供理论界和广大群众当作批判的靶子。当时，经济学界关于按劳分配和所谓“唯生产力论”等问题讨论得比较活跃，而哲学界相对冷清，有所谓“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的说法。当杨西光知道我正在作这方面的调查时，征求我的意见，在拨乱反正中抓些什么重大理论问题开展讨论，我建议他找一个既能密切联系实际，又能带动哲学活跃起来的问题。

当时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观点，如果按照这一观点作为判断事物的最高标准，那么十年动乱中“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流毒，都将无法得到改正和深入批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经过争论交谈，大家思想上越来越形成一个共识：即“两个凡是”的观点是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扫除这个障碍必须明确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既是一个哲学范畴的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针对性很强的问题。

杨西光说，他在报社看大样时，发现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来稿就是谈这个问题的，他已经决定把这篇文章从理论版抽



杨西光

下来改在第一版上刊登。他又认为这篇文章学究气重，思想战斗性不强，需要大改，询问我能否找到合适的人来改。这时，我想起在中央党校搞调查时，那里的理论班子正在思考酝酿写同样主题的文章，就建议杨西光找中央党校教育长兼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商量一下，可否找该研究室副主任孙长江来改，我还告诉他《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也正在北京开会。修改这篇文章的执笔人为孙长江，杨西光、吴江，《光明日报》理论部的同志都参与了，最后送胡耀邦审阅，历经数月，先在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登。1978年5月11日，才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上。这篇批判“两个凡是”观点的檄文，由于和原文相比已经改动很多，而且考虑到它的震撼作用，没有用个人署名，而是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的。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均全文转载，新华通讯社发了通稿。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新闻界某权威人士当晚就给人民日报社领导打电话，指责这篇文章“很坏很坏”，“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次日，另一位权威人士也给新华社社长打电话，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



王仲方

旗子的。”主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则要求中央宣传部“查一查所谓的特约评论员是谁？”“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他还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批判“实践”一文，并公然要点名批判胡耀邦。张平化对此也随声附和。一时间，党内军内一些高层人士以及新闻报刊都对这篇文章或支持，或挾伐，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正当持“实践”观点的人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讲话中鲜明地表态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刊登了邓小平在军队的讲话，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号召“打破精神枷锁”，“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讲话，顶住了反“实践”观点的逆流，给了“实践”一文以明确的肯定和支持。

后来，中央党校的理论队伍又继续写了一系列反驳“两个凡是”的文章。第二篇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送《解放军报》，受到当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坚决鲜明的支持。据说他还亲自动手两次修改这篇文章，同时他为修改文稿事，与胡耀邦通了多次

电话交换意见。罗瑞卿于7月5日飞往德国治病，在出国动手术前还十分关心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讨论。临行前曾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50大板。”不料，一个多月后，传来了罗瑞卿在国外因突发心肌梗塞而永辞人世的噩耗。

为了把真理标准大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胡耀邦又组织了第三篇檄文：《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于1978年9月26日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继续打破“两个凡是”的坚冰，坚忍不拔地勇往直前。到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共刊登了650余篇支持、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尤其是一大批政界、军界有影响的人物纷纷表态，使得这场讨论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继“五四”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又一场极其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克服个人迷信、解决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的运动。

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呼之欲出，势在必行。在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带头发言，结合“文革”的严重教训，进一步阐述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突破了原定的议题，使会议开成一个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为随后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奏响了序曲。

听革命前辈王仲方讲 “文革”中炼狱的故事

我担任调研组组长后，1978年八九月间，被派往西部地区搞调查。同行九人，由筹备委员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仲方亲自带队，调研资料的整理工作由我负责。

预定的路线是去甘肃、青海、新疆三个省区。到西宁以后，在我们住的胜利公园招待所门前，简直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都是事前得知消息后，来看望王仲方的。青海是他工作过5年的地方，1961年他与原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王昭同志被中央派到青海省工作，王昭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仲方任省委常委、省政府秘书长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

王昭和王仲方到青海后，为纠正 1958 年“大跃进”中“左”的错误，不辞辛苦地踏遍了青海的山山水水。但谁能料到，正当青海人民的生活开始有所改善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雨，摧毁青海人民的美梦，王昭和王仲方先后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

王仲方无限感慨地向我们叙述了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和王昭的一生：王昭同志 14 岁入党，16 岁就担任河北省地下党平山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地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军政委、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后又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1953 年调公安部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担任副部长，是当时国务院各部门中最年轻的副部长，为创建新中国人民警察队伍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文革”中他进了监狱后，既受屈辱，又吃不饱，病重了又得不到起码的治疗，不到两年就病死在狱中。

王仲方 16 岁参加革命，1938 年 2 月入党。经历“一二·九”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奋斗历程。当“文革”风暴铺天盖地而来时，1967 年 3 月 27 日半夜，省公安厅向他出示了拘留证，被关押在青海省南滩看守所。这座看守所，是他担任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时建造的。他在这里一住就是 6 年。

王仲方之所以能从“文革”的监狱中幸运地活过来，除了他本人的乐观顽强的精神外，多亏了他的妻子史洛明在精神上物质上对他的支持。

他坐了 6 年牢，妻子就送了 6 年的牢饭。

当时狱中有规定，直系亲属可以给关押的人送东西。王仲方入狱后，他的妻子就经常给他送补给营养的食品、衣物，后来还可以送书。虽然不许见面，但双方从送物时交换的字条上能了解到对方的一些情况，得到极大的精神安慰和生活下去的勇气。6 年里，王仲方把监狱改变成自己的生活空间，他勤于打扫，阴暗的牢房无臭、无蝇、无尘。他还自己缝补衣裳、编织毛背心、毛袜、手套……在接受狱中审讯、调查时，他就戴八路军军帽，表达了他大无畏的坚强革命意志。他还在狱中唱歌，唱得最多的是抗战歌曲、延安歌曲和前苏联革命时期的歌曲。他说唱歌既可以使他不至于成为哑巴，同时，唱革命歌曲使他回忆过去经历的革命年代，更激励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王仲方在狱中还读了大量的书，这些书都是妻子分批送来的。有《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同眼前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相对照，毛泽东所阐发的精辟理论、思想，是多么脱节和背离啊！

我们一行在听王仲方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心情有时凄凉，有时激动，有时惋惜，有时庆幸，有时肃然起敬，有时同情万分，……但我们共同感触很深的是，我们应该学习革命前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在逆境中艰苦卓绝坚持斗争的生活信念。王仲方的炼狱故事使我们那次西部行中增添了生动深刻的一课。（责任编辑 方 徨）

党
史
纵
览

纵览世纪风云 透视内幕珍闻

昭示人间正道 领悟岁月真情



本刊走近伟人，再现波澜壮阔的人生传奇，坦露隐秘丰富的情感世界，诉说跌宕起伏的政治命运；
本刊步入历史，追寻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评说政坛要人的是是非非，揭示鲜为人知的内幕真相。

本刊常设栏目有：伟人风采、将帅传奇、风雨人生、心路历程、岁月风云、胜地寻踪、金戈铁马、珍闻轶事、隐蔽战线、史海钩沉、论说陈独秀、红色恋情等。本刊为国际标准大 16 开本，48 页，每期定价 4.50 元，全年 54 元。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邮发代号：26-194。

本刊地址：合肥市长江中路 57 号 邮编：230001
电话：(0551)2606693 传真：(0551)2608236
网址：cndszi.126.com E-mail：dszi@vip.sina.com

国内统一刊号 CN 34-1134/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 1005-9482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
华东地区优秀党史期刊

· 月 刊 ·

“五七”干校祭

● 季音

五七干校是响应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在1968年普遍兴办起来的。如今一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很可能以为既然是“干校”，想必是一座书声琅琅的学府，实际上只是驱使大批干部从事沉重体力劳动的一个农场。在这里，对于各种所谓有“问题”的人，日子很不好过，等待他们的，是批斗、凌辱和苦役……

五七干校这一幕已成为历史。但往事灼灼，仍然难以忘却。

1968年9月，人民日报社在北京郊区房山县农村办起了五七干校。干校的成员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干部，他们的任务是通过参加体力劳动，改造思想，“斗私批修”；另一类是有问题的人，他们当然不是轻松地改造思想，而是在交待问题和罪行接受审查的同时，负担干校里最苦最累的活。我在国民党集中营里坐过牢，自然属于后一类，干校一成立就被送了进去。按照“文革”年代的造反逻辑，凡蹲过国民党监狱的革命者，无一不是叛徒。那年头，林彪、“四人帮”把共产党的干部队伍说得漆黑一团，大刮“揪叛徒”黑风。我与其他一些战友，尽管都是九死一生从上饶集中营越狱出来的，却在干校统统遭到批斗、迫害。

干校在房山的时候，还附设了一个“牛棚”，专门关押走资派一类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他们集中居住在一间潮湿的地下室，被严格管理，不能自由行动，每天早晚都得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历数自己的罪行，汇报个人思想活动。晚间，我经常看到他们冒着刺骨的寒风，列队站在室外，齐声朗读“最高指示”，那声调，听了令人凄然。我蒙造反派宽大，没有被送进“牛棚”。

人民日报社的五七干校从1968年创办起，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历时八载，并且三易校

址。最初是在京郊房山县常舍大队，办了一年零四个月，即远迁河南省叶县农村，最后又搬回北京市昌平县小汤山附近。我是“三朝元老”的“蹲班生”，三个地方的干校，我都是留校学员，自始至终经历了全过程。风风雨雨，度过了八年时光。

干校学员是实行轮换制的，每半年或几个月一期。熬过了为时半年这段艰苦劳动和吃大锅饭的集体清苦生活，就能回京与家人团聚。每逢学员们早就盼望的结业这一天到来时，干校里到处喜气洋洋，人们打点行装，欢欢喜喜地走上回城之路，准备与家人团聚。我却只能与少数人继续留在干校看家，准备迎接下一批学员的到来。每次干校结业，都是我最痛苦的时候，眼看着人们都欢天喜地地走了，平时喧闹异常的干校，顿时冷冷清清，一片死寂。我如同一个废物，被遗弃在这个角落里。

有些年，我也享受过与学员差不多的待遇，可以按规定时间回家与亲人团聚。在小汤山干校的时候，两个星期休假一次。到干校结业时，我也随大队回城。所不同的是，在家休息几天，别人上班工作了，我却得跟着新学员一起，又回到干校，开始新一期的劳动锻炼，我始终是个“蹲班生”。如此反复轮换，我不记得干校在八年中究竟办了几期。

随着新学员的到来，冷落的干校又热闹起来，与上一届一样，人们投入紧张而内容相同的劳动，种麦子，种水稻，养猪，种菜……

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时我们也来到村里与社员们一起开会，学习“最高指示”，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不知怎的，有些社员说着说着，就忆起“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时期的苦，吃不饱饭，人都害浮肿病，哪个村饿死了多少人……我们一听不对头，尽力想把话岔开去，可是不管用，这些社员还是没

完没了唠叨着这些心酸事。也许因为这些事时隔不久,记忆犹新,他们忘不了。在叶县干校附近的农村里,尽管农民的生活困苦,依然到处充满“文革”式的革命气氛,村子里原先供奉的土地爷的土龕里,神像移走了,请来了毛主席像;不时还可见到农民脚步零乱地跳起“忠字舞”,但很难说是一种舞姿,只是在机械地移动脚步而已。

我们在干校的生活,比起城里时是差多了,尤其是平时生活比较优裕的人,到了这里,简直感到清苦极了。早晚是馒头稀饭,外加咸菜,天天如此,中午才能吃到一份大锅菜。开饭时,有些农民跑来,看到我们餐餐都在吃大白面馒头,羡慕地说:“你们干校里天天在过年。”原来,附近的农民要等到过春节时才能吃上白面馍。人民生活依然如此贫困,使我感到深深不安。

我们干校从房山搬迁叶县是1969年年底动员,1970年年初开始行动的。1969年12月底,正当人们准备过年的时候,负责领导干校的军宣队政委突然宣布,房山干校要立即迁往河南省叶县,原因是中央下令备战,要准备打仗。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林彪签发的著名的一号战备令。名为战备令,实为驱逐令,凡中央各部门的走资派,以及各种被认为有问题的人,统统都要赶出北京,送往外地。

大家在房山住惯了,这儿离北京近,回家也方便,都不愿意远迁河南。一些没有辫子可抓的人,就大发牢骚,反对南迁。军宣队为了排除阻力,统一这些人的思想,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也荣幸地被吸收参加。学习班只学两条毛泽东思想。一曰“备战备荒为人民”,重点是备战。军宣队一位政委,在学习班上侃侃而谈,大讲国际形势。他说,仗是一定要打的,我们要立足于打,而且早打,大打,千万不能麻痹。打仗固然要打烂一些坛坛罐罐,不过大战起来之日,也就是资本主义灭亡之时。他对战争前途很乐观。讲完“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接着他又联系实际,讲干校的搬迁问题。他说,如果仗打起来,北京必然首当其冲,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中央决定把一些可以离开的人往外地疏散,北京附近的干校统统要搬到内地,学员们最好是全家一起搬。果然毛泽东思想威力无穷,经政委这么一吓唬,大家再一议,反对干校南迁者不作声了,表示服从组织安排。有几个人还表示愿意把全家搬到河南干校落户。

学习班学习的第二条毛泽东思想是“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这也是有针对性的。干校南迁的消息传出以后,了解河南情况的人说,叶县是个出名的穷地方,到了那里少不得要吃苦头。何况在远距北京的千里之外,此去就别想再回北京了,说不定就要累死在外地。军宣队政委在讲话中,驳斥了这种怕苦怕死的思想,他说,干革命就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人背地里散布说叶县是个穷地方,这是谣言,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捣鬼,大家要提高警惕,注意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经政委如此活学活用地讲解了这两条毛泽东思想,干校南迁的思想障碍基本消除。

河南干校新址在离叶县城十几里地的刘庄大队,新址上除了几间破草房,就是一大片空地,一无所有,干校大队人马如果马上开过去,吃住都无法解决。于是决定先成立一个先遣队,去那里盖房子,同时做其它准备工作。等一切就绪了,再把整个干校搬过去。这先遣队肯定是要吃苦头的,人们估计,弄得不好,很可能到那里连吃饭也很困难。由什么人组成先遣队?经军宣队和造反派的头头们研究,决定主要由有各种问题的审查对象参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最高指示,理应最先在他们身上落实。另外由军宣队派几个干部带队。我,当然是先遣队员之一。1969年的岁末,天气特别寒冷,北京经常刮着五六级的西北风,飞沙走石,冻得人们不想出门。老天爷好像要考验一下我们这些即将远行的人,是否真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文革”那个非常时期,人们过新年的观念已经淡薄,我更是如此,临走前几天忙于收拾行装,无暇考虑过年。1970年1月3日,我们登上南下的列车,次日早晨到许昌下车,再换乘汽车,4日傍晚,才到了叶县刘庄大队。我们十几个人在几间破草房的地上铺上麦草,勉强住了下来。

眼前最紧要的任务就是赶快给干校建几十间校舍。军宣队有指示,干校建设要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主要靠自己动手。带队的干部打听到离干校十几里外有座卧羊山,山上盛产石料,附近的老乡都在那里采石头盖房子,用石块垒墙盖房,既结实,又省钱。带队干部随即作出决定:从先遣队中抽一部分人,组成采石队,上卧羊山开采石料。

我在柏各庄农场和干校已经劳动了数年,自问各项农活还能对付,唯独开采石料的活却没有干过。过去在乡间看过山边的一些采石场,干活的全是壮汉,光着膀子,挥动着大铁锤,叮叮当当的砸石块,嘴里还不时喊着劳动号子。这些采石工都是专门干这一行

的，既有强健的体魄，又有一手专门技能，把那些形状不规则的大石块，修成一方方整齐的石料。我们这些过去拿笔杆的书生，能干得了这项重活吗？我心里有些狐疑。

采石队由13人组成，其中6人是编辑部的知识分子，7人是报社行政部门与印刷厂的，全是“文革”中的受审查对象。1月16日，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这支队伍，带着简单的工具，开赴卧羊山。

卧羊山在叶县的东北部，它高出地面不过100多米，周围长度也只有3华里，由于这一带都是一马平川，在大平原上隆起一座孤零零的小山，就显得分外稀罕。

在离卧羊山不远处有个村子，名叫汝坟店。当我们进驻这个村子的时候，老乡们听说我们是上卧羊山采石头的，都惊讶得不敢相信。他们说：“同志啊，这活可不是你们干的，你们干不了！”大约他们看出，这支文质彬彬的队伍，显然都是干部。

“我们能行，干得了！”采石队里有谁回答了一句。我心里想，恐怕还得走着瞧。

一天，队伍终于拉上卧羊山。

山上很热闹，东一拨，西一拨，到处都是附近各生产队赶来采石料的民工，叮叮当当捶打钢钎的声音震响着山谷。我们选择了一块比较好的山坡地，就摆开阵势。编辑部的同志干这些活全是门外汉，幸亏我们中间有两位印刷厂的师傅，他们干活比较内行。在他们指导下，我们开始干了起来。

开采石头主要有三道工序。第一道是在岩石上打眼，由两个人操作，一个抡大锤，一个扶钢钎，在石头上打出一个个几十公分深的洞。这活相当累，也有些风险，我们因为操作不熟练，发生了多起大锤砸伤人的事故。

第二道工序是在打好的岩石眼里安放炸药，然后引爆。民工们把它叫“点炮”。这活最为惊险，点燃导火索后，就必须拔腿飞跑，找一处安全地点隐蔽起来。炸药爆炸后，轰隆一声，大小石块炸得满天飞。干这项活的人要能快跑，机灵，不然容易造成伤亡事故。

第三道工序是把炸裂的石头撬开。爆炸后岩石裂开了一道道缝，就用撬棍去撬。石头先是发出哧哧的松动声，接着是咯吱咯吱地响着，最后是扑通一声，石头滚出地面。这时候，我们这些撬石人就腾出手来擦擦汗

我们几个人轮换着干这三种活，这样就能全面掌

握开采石头的技术。有一段时间，我担负“点炮”任务，这是一项比较危险的活。一天，在石块上打眼的任务完成了，装好了炸药、雷管，采石队的人员便撤退到山下的安全地带，只有我一个人负责点炮。我点燃了一支香烟，在点导火索之前，紧张地注视卧羊山顶上的动静。这小小的卧羊山上开采石头的民工很多，为了统一行动，避免伤亡，公社派出一个人在山头上指挥，他挥舞着一面三角小旗，大声地发出各种命令。

“准备点炮！”山上传来命令，小旗舞动着。这是通知各采石点抓紧装药。

工地上的空气紧张起来，各采石点上的人纷纷往外撤退。

约摸过了五分钟，山上传来命令：“点炮！”

我立即沉着地点了好几炮。导火索发出丝丝的响声，爆发出点点火花，说明已经点着了，这时可不能有一秒钟延误，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拔腿飞奔，一会儿就跑到山边一个隐避处，蹲了下来。

轰隆，轰隆，轰隆，……连续不断的一片爆炸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卧羊山，爆炸的烟尘弥漫山头，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块随着爆炸声飞向天空，很快又像冰雹似的掉到山坡和地上，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有的大石头落在山上，轰的一声，地面都在微微震动。

我们到卧羊山不久，就听说发生过一场惨剧。汝坟店采石队强令一个地主子弟当点炮员。那时候农村里普遍实行一项政策，凡是最累最危险的活，就让黑五类子弟干，这同干校的做法有类似之处。这个地主子弟腿有残疾，平常就走不快，再加上导火索短，他刚点着炮没跑出多远，背后轰隆一声，爆炸了，一块飞出去的大石头从半空落下来，把这个不幸者当场砸死。

我幸亏战争年代在部队里多少受过些锻炼，腿跑得不慢，使我这个点炮员连一层皮都没蹭掉。

日子长了，我们在山上愈干愈熟练，开采的石料，一卡车一卡车的运回干校，盖起了几十间平房。这些房子的半截墙全用石块垒成。卧羊山上的石头不但坚硬无比，而且颜色各异，有紫红的，有橙黄的，有白色的，五颜六色，煞是好看。老乡们来参观干校，看到一排排整齐而好看的房屋，都赞不绝口。

我们在卧羊山上整整干了一年多，天天和石头、撬杆打交道，还真干出了滋味。干校领导把我们这些所谓有问题的人，送上卧羊山劳改，要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从事最累也最危险的活。我们是苦中求乐，取得精神上的平衡。我心想，与其在干校天天学

习最高指示,没完没了地开会检查思想,交待问题,还不如在卧羊山上光着膀子抡大锤来得痛快。

当我们完成采石任务,离开卧羊山返回干校时,我回头望望这座曾经洒过大量汗水的小山,心头不觉涌起一股复杂的感情。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震动了中国,震动了世界,也震动了五七干校。

人民日报社干校是在林彪的一号备战令下,从北京南迁到河南省叶县的。如今林彪垮台了,叶县干校的命运,又成了人们背地议论的中心。为什么要把干校从房山搬到叶县?难道就让我们困死在这里吗?

这时期,干校接连发生了一些不幸事件。

理论部的编辑王日东,高高的个子,平时看来身体还不错,不知是由于劳动过累,还是营养不良,突然病倒,叶县附近没有像样的医院,急送平顶山市医院治疗,路上要花费数小时,再加上几十里路的颠簸,致使病情加重,抢救无效而死亡。

一位叫张今吾的图书馆干部,不知是什么原因,不明不白地掉进村边一口井里淹死。是自杀?是他杀?不清楚。俗话说,人命关天,照说这是件大事。可是张今吾是一个因历史问题而受审查的人,人命在他身上就不关紧要了,听说干校领导未派人去作深入调查追究,就此不了了之。

农村部有个女编辑,名叫蓝村,是抗日战争初期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因历史问题受审查,长期留在干校。她矮矮胖胖的,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平时只能勉强支撑着干点轻活。一天,她心脏病发作,倒在床上,动弹不得。干校领导吸取教训,决定把她送回北京治疗。我看她躺在担架上,双目紧闭,一言不发,样子实在可怕。到北京后不久,她终至一病不起。

干校里还有些人,带着这样那样的病在劳动,他们担心哪一天会突然倒下,走上已死亡者的同一条路。

我呢?当然也希望把干校搬回北京去。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离家近些总好有些照顾。可是我没有发言权,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

总之,干校里人心惶惶。负有领导责任的军宣队,压力越来越大。

干校领导班子里有一位老干部,他为人正直,有一天,和军宣队头头争吵起来。他坚决主张把干校迁回北京郊区,那军宣队头头则推说这困难,那困难,叶县干校建起来不容易,丢了可惜。我在旁看得出,在双

方争论中,军宣队头头显得理屈词穷。说实在话,“九·一三”事件以后,毕竟大气候开始变化,硬着头皮在叶县继续走“五七道路”,越来越不得人心。

经过了一段时间酝酿,1972年,人民日报社干校终于从叶县迁回北京郊区昌平区小汤山附近,在那里建起一片新校舍。

我被调到干校伙房劳动,伙房里管事的师傅全是从报社食堂里调来的,也和学员一样按期轮换,我则是不参加轮换的长期固定工。师傅们都和我相处得很好,他们不问你是老右老左,只要认真踏实干活,他们就高兴,对你绝无歧视。

我在伙房里担任火头军,负责烧火。干校里生活简单,每餐伙房只要烧一大锅菜就行,可是吃饭的人多,而且干体力劳动活,大家都很能吃,一顿饭吃四五个馒头是寻常事,因此伙房每餐都要蒸大量的馒头,蒸馒头的大笼屉垒起六七层,一米多高。笼屉上锅以后,烧火就成了关键,火要烧得最旺最旺,不消二三分钟,蒸汽就穿过最顶层的笼屉,直冲屋顶,这就成功了。馒头蒸熟后打开笼屉,又白又松软,香喷喷的,不用菜就能吃几个。

相反,在这关键时刻,如果火上去,过了几分钟,最顶层上的笼屉依然没有热气,师傅们就会急得直跺脚,因为火不旺,即使烧得时间再长,馒头也蒸不好。打开笼屉,馒头全趴在屉上,皮上全是小麻点,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凹洞,吃起来粘牙,既不香又不松软。蒸出这样的馒头,给师傅丢了脸,责任全在火头军。

因此,每当蒸馒头时,笼屉上完了,师傅立即就跑到灶头来看火。这时也正是我最紧张的时候,全神贯注着炉膛,一点也不敢大意。当师傅看到灶膛里火势旺盛,火苗呈白色,亮得刺眼,就放心了,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走向厨房。今天蒸出的准是好馒头。

我为了把火烧好,也着实下了一番功夫。老农民说:“人心要实,火心要空”,这是绝妙的经验之谈。烧火最忌心急,死命地往灶膛里塞煤塞柴火,塞得满满的,空气不流通,火既烧不旺,又费煤费柴火。干校伙房里主要烧的是煤,我常年同煤打交道,也就渐渐摸熟了它的个性和脾气。我把好煤和次煤分别堆放,在刚点火时最关键的当口,就舍得用好煤,等到火烧旺了再掺些次煤和煤末,火仍然可以保持旺盛势头。当灶膛里的熊熊烈火由红变白,真正达到了白热化的时候,我心里比什么都高兴,一切人间的忧愁与烦恼,都丢到了脑后。

从此,我成了固定的火头军。每期干校轮换,伙房的师傅来到,他向干校领导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把我调去烧火,说这是上期的伙房师傅告诉他的一条切身体会。干校烧火任务渐渐变成非我莫属。想不到我这个被造反派视为不够格的记者,成了一个够格的火头军。

说实在的,干校八年,说得好听点是锻炼了八年,实际上是受了八年折磨,浪费了几年大好时光。那时我眼光短浅,总以为“左”祸难除,“四人帮”及爪牙将继续横行下去,短期内中国无望摆脱灾难,自然我也无出头之日。我几乎陷于绝望之中。

重新给了我生活勇气,使我看到了希望之光的,是1976年春天的天安门事件。它像一声惊雷,撕破重重黑暗,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我。它使我看到中国人没有被“左”的恶势力所征服,所压倒。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覆灭,中国走出了黑暗,使我看到了希望之光。

1976年10月底,人民日报社干校终于走完了它的历史过程,我又回到了编辑部。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原主任)

(责任编辑 吴明)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68.00	7.00
邓小平时代(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4.00
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23.00	4.00
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	严秀	12.50	3.00
沧桑十年——为了悲剧不重演	马识途	33.00	4.00
李锐论说文选	李锐	28.00	4.00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范硕	36.00	5.00
永远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	方实 杨兆麟	25.00	4.00
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	胡绳	12.00	3.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中国改革开放史	朵生春	66.00	7.00
无罪流放	贺黎 杨健	24.00	4.00
陆定一传	陈清泉 宋广渭	29.80	4.00
杨尚昆回忆录	杨尚昆	25.00	4.00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徐晓 丁东 徐友渔	26.00	4.00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	纪希晨	49.00	4.00
陈昌浩革命生涯	范青 陈辉汉	38.00	4.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羨林	24.00	4.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25.00	4.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羨林	26.00	4.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锐	29.50	4.00
思想解冻的春天			
——大转折日日夜夜(卷一)	张湛彬	24.40	4.00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上下册)	曾繁正	39.80	4.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23.80	4.00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命运	吴江	20.00	4.00
记忆文丛: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			
之一 六月雪	牛汉 邓九平	25.00	4.00
之二 原上草	牛汉 邓九平	24.00	4.00
之三 荆棘路	牛汉 邓九平	24.00	4.00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下册)	唐德刚 王书君	69.00	6.00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章含之	30.00	4.00
老三届朝歌——尘劫	丁小禾	22.80	4.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这部长达一百余万字的著作是在军委张震副主席的热情鼓励及关怀下写成的,由萧克将军题写书名。此书重点研究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相互关系;概述了正面战场的战况和战绩,回顾了成就与过失,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借以启迪后人,指导未来。

《我向总理说实话》本书作者自1983年1月至2000年9月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经历了人民公社以来农村改革的全过程。他于2000年3月致信朱镕基总理,如实反映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等状况。此信引起中央的关注,朱总理两次批示,调查组曾赴监利县调查。书中不仅记述了这段经历与感受,还对产生问题的根源进行了分析。

《永远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于今年10月出版。李铁映、李德生等为该书的出版题了词。胡绳写了书名。

温济泽是我国著名新闻学家、新闻教育家。本书辑录了温老的战友、同事、学生和亲人等写的文章61篇。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缅怀了温老坎坷而光辉的一生,赞扬了他忠诚于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同时,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温老的学术思想,对研究中国新闻史、广播史和新闻教学理论等具有参考价值,有些资料还是鲜为人知、十分珍贵的。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罗荣桓和他的家人

● 崔向华

罗荣桓是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他是“支部建在连上”最早的七个连队党代表之一。1929年他参加了著名的古田会议。会上,他因“观念正确,斗争积极”,被选为红四军前委委员。在古田期间,毛泽东指着路过的罗荣桓,对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说:“这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被批判的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罗荣桓也被调离一军团。毛泽东喟然长叹:“我倒霉时,他也跟着我倒霉。”“罗荣桓的品格,用十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同我相处这么多年,就是一个罗荣桓,还有一个邓小平。”

1937年5月16日,罗荣桓和林月琴在延安结婚。这天一大早,罗荣桓就骑上大白马去河对岸接林月琴。他们煮了一大锅有鸡块、萝卜、白菜的面条招待来宾。婚礼尽管简单却非常热闹,谭政、冯文彬、张爱萍、甘渭汉都来了。

林月琴是一个有着不平凡革命经历的红军女干部。她是河南商城人,1914年1月出生,15岁就成了职业革命家,一直追随红军艰苦战斗,长征途中,她是妇女工兵营营长,主要任务是搞运输。林月琴和大家一样,负重五六十斤艰苦跋涉。1936年2月,妇女工兵营随红四方面军主力重新穿越夹金山,在由懋功、丹巴向西转移时,林月琴病倒了,持续发高烧,几天昏迷不醒。后来在翻党岭山后,林月琴和全营大部分同志都得了雪盲症,眼睛红肿,什么也看不见。她们一手拄着棍,一手搭着前面同志的背篓,排成一路纵队,在

漫天风雪中艰难行进,终于在1937年1月随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罗荣桓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林月琴于1938年3月,生下第一个男孩,并按罗荣桓走前的吩咐取名北屯,意思是生于北方屯兵之地延安。北屯刚满月,她就托付给延安附近的一户老乡抚养。1938年10月,罗荣桓作为一一五师的代表到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期间,他抽空去看望寄养在老乡家已半岁多的北屯,回队后对妻子谈起儿子的情况。林月琴十分想念北屯,想把北屯接到自己身边。不久却听说那家老乡搬离延安,又得知北屯因营养不良病亡的消息,夫妻俩十分悲痛,林月琴一连数日难以安眠。

1939年2月,林月琴满心欢喜地生下第二个儿子,恰逢部队正在东进,罗荣桓高兴地给新降生的儿子起名叫东进,就骑马追赶部队去了。1939年5月,林月琴带着刚生的儿子跟随一一五师留守处奉命由晋东南向山东转移,开始了艰苦的千里行军。东进由挑夫挑着,晃晃悠悠地过了太行山,又夜行昼宿来到华北大平原,终于在战场上见到了罗荣桓。部队在日军围剿中吃住走打,无一日安宁,孩子经常夜哭。罗荣桓意识到儿子必须离队,他对妻子说:“我看,干脆把他交给老乡养活吧。”林月琴泪如雨下,心如刀绞。大家都同情她已失去一个儿子,当即有人提出,抽几个战士掩护小东进转移。罗荣桓严肃地说:“现在敌强我弱,我们一个战士要顶十个用,怎么能抽出人掩护他。”经地下党组织介绍,把小东进寄养在一户可靠的农民家里。自此,林月琴跟随

罗荣桓。1940年林月琴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南下。

1942年，是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最复杂、最艰苦的一年。罗荣桓曾称之为“拂晓前的黑暗”。艰苦的环境和繁忙的军务，使罗荣桓每天都处在紧张的工作状态之中。有一天晚上，林月琴发现雪地上的血迹，知道丈夫尿血，急忙喊来医生，检查尿样中还有小血块，病情已相当严重，医生对此病无法确诊。中央接到罗荣桓请求休养的电报时，中央调整山东领导班子的决心已定。毛泽东、朱德立即复电，在对罗荣桓的病情表示关切的同时，明确转告了中央的意见：“你的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不久，他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历史的重任落在罗荣桓肩上，他抱病受命，将山东抗日根据地一元化领导的重担挑了起来。

鉴于罗荣桓病情严重，陈毅拍电报给中央建议让罗荣桓来新四军治病。1943年4月，林月琴陪同罗荣桓由山东到苏北，整整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林月琴一路上都行进在罗荣桓的担架旁。在新四军军部，奥地利籍的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判定是肾脏发生病变，可能是肾癌，也可能是多囊

肾，由于没有X光机，无法进一步确诊，只好采用保守疗法。罗生特近一个月的精心治疗，虽还不能解决问题，但也有成效。罗荣桓自知病重，在返回路上对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5年计划，争取再活5年，打败日寇，死也瞑目了。”林月琴安慰丈夫道：“你的计划一定能实现，将来革命取得胜利，就有条件把病治好了。”

几个月后，陈毅又派人把罗生特医生护送到山东，专门为罗荣桓治病。自此他们相处如同一家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此时林月琴把东进从老乡家接回，东进和南下都叫罗生特为“大鼻子叔叔”，性情开朗的罗生特常逗两个孩子玩儿，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是大鼻子，你们是小鼻子。”罗东进记得，一次部队打了胜仗，他捡了个日军的破防毒面具戴在头上，跑到街上又蹦又喊，把老乡的孩子吓哭了。罗荣桓知道后严厉批评儿子：“你到老乡家的时候，路都不会走，是老乡用高粱煎饼把你养大的，老乡待你像亲生儿女一样。可你刚从老乡家里回来，就忘了本！你知道什么叫群众纪律吗？”这件事给幼年的罗东进教育很深，终生难忘。

1944年，罗荣桓指挥山东军民发动了一连串攻势作战，每次重要战役，罗荣桓都是坐在担架上指挥，林月琴随担架奔波于战火纷飞的前沿，

步步跟进新解放的国土，她的心境在胜利的捷报声中跳跃。1945年7月7日，是抗战8周年纪念日，罗荣桓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一文。一个月后，抗战胜利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进城后，罗荣桓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常说：“政治部要成为干部的家，使干部来了感到温暖。不要阎王爷开店，小鬼不敢上门。”他总是教育家里的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热情接待每一个来访的同志，只要有



罗荣桓(二排右三)和他的一家人

人打电话要来，他就叫林月琴或秘书到门口去等。有一次林月琴看天晚了，就叫打电话的人明天来。罗荣桓知道后就对妻子说：“这样不好，过去在山沟里打游击，什么时候要见就什么时候见，现在有病就不能见了么？人家来看我，能谈多少就谈多少，不能谈，见见面也好嘛！”一次，罗荣桓夫妇刚从外地回来，一位犯错误的同志打电话要来看他，没等那位同志来，罗荣桓却带着病先到他那里去了，那位同志很感动。罗荣桓一再说：“对人的处理要慎重，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老干部是我党的宝贵财富，要爱护他们的政治生命，关心他们的生活福利，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党的温暖。”对已故老战友的家属和烈士子女，他也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成长。朱瑞在辽沈战役中牺牲后，罗荣桓时时挂念着他的子女，1960年还交代林月琴一定要把朱瑞的孩子接到北戴河，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度暑假。

罗荣桓总是把自己看成是群众中的一员，他不赞成领导干部警卫森严，和群众隔绝的做法。一次从汉口乘船到南京，上船后发现所在的一层舱只有他和几个随行人员。一了解是警卫部门同售票处打招呼，这一层的票就没有卖。他批评道：“我看你们搞警卫工作的恨不得把我们锁进保险柜里。我们接近群众有什么不可以？”他出外视察，厌恶前呼后拥、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一次乘飞机去外地，刚走出舱门就见黑压压一群人来迎接，他很不高兴地对当地几位负责人说：“以后，你们再来这么多人，我就不下飞机，原机飞回去。”

罗荣桓具有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度，在他身上体现着党的政治工作干部最可宝贵的品质。作为军队高级干部，他实施领导，不是只靠地位、权威和命令，主要是靠对人的理解、关心和信任，特别是靠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和教育群众。他说：“我们主要是靠政治教育，是靠干部的模范作用去影响战士对一切号令命令的执行。”他对政工干部的要求特别严格，经常教育政工干部，要谦虚谨慎，不要盛气凌人。他强调，政工干部的威信，要靠自己的模范行动、模范工作去取得。罗荣桓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政工干部作出表率。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诚恳待人。不论是工农干部还是知识分子干部，都把他

当作贴心人，都愿意和他说心里话。大家把他看作温柔敦厚的兄长和诲人不倦的老师，说他身上有一股凛然正气。

在干部工作上，罗荣桓一贯坚持任人唯贤，公道正派，搞五湖四海。他经常讲，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早在1944年9月，罗荣桓在山东军区工作会议上提出，不能只在熟人的小圈子中，以合乎个人口味来衡量使用干部。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各方面的干部，受到广大干部的称赞。在配备干部时，罗荣桓在坚持“德才兼备”条件的同时，特别注意掌握“五湖四海”的原则，正确使用全军各方面的干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大肃“AB团”时，他冒着风险保护了一批干部战士，“罗政委刀下留人”曾在红四军传为佳话。抗战时期，山东湖西地区出现错杀无辜的“肃托”事件后，他赶赴当地，断然释放了还未杀掉的被扣押的数百名干部，处理了挑起这一事件的祸首。

罗荣桓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战争年代，他把自己的棉衣让给战士穿，自己的战马不是骑着病号，就是驮着战士的枪支和背包，他和官兵吃一样的糠煎饼。他关心战士，爱护群众，心中没有自己，只有官兵和群众。连毛泽东都知道长征路上战士请罗荣桓喝野菜汤的感人故事。困难时期，罗荣桓身居高位，却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他常说：“越是国家困难的时候，越要注意和群众同甘共苦。”他经常教育子女：“生活上不要搞特殊化”。教育他们要把自己看作是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弟，规定他们不准乘坐自己的专车，不准他们利用父母的名义办私事。即使在病危弥留之际，还批评儿子不该在没放假时回来看望自己。临终前他对子女说：“我什么也没有给你们留下，只希望你们坚信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他对林月琴说：“这些年，你为我作了很大的牺牲，也是一个无名英雄。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罗荣桓同志对我军的政治工作有重大建树，是我们总政治部的一位好主任，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责任编辑 刘家驹）

对社会主义问题的 几点思考

● 李靖炎

作者说明：本人是一名自然科学工作者，主要从事细胞核的起源进化问题的探索。但我在解放前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1958年以后国外所发生的种种重大事件，迫使我不得不反反复复地思索了有关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路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开拓了我的思想，而我有幸多年担任云南省政协常委，也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多方面的实际。基于我对国内外实际情况的一些了解，通过多年的思考，我逐步产生了一些看法，原已取得的认识得以更为深化。现在，把我多年来的思考所得提纲式地写出来（主要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前途问题），供读者参考。

关于现今时代资本主义的活力， 资本主义即令在当今最发达的国家 也尚未达到其末期阶段

马克思主义认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各自要经历其发生、发展与衰微的历史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将会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但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却造成了一种想法，即认为无论资本主义发达或是不发达，都一样可以创建社会主义。而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更加加深了这种错觉，竟认为即使资本主义极不发达，也可以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而达到社会主义。这种错误认识的最突出

的表现，就是波尔布特等人竟妄图在柬埔寨创建一个没有货币的“纯粹的”社会主义。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孟什维克派，就已在是否要夺取政权的问题上与列宁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这一论战一直持续到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他的晚年，在《论俄国革命》一文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俄罗斯的生产力和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都还很低，我们为什么不利用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尽速地提高俄罗斯的生产力和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呢？历史已证明列宁的答辩是正确的。但这种正确应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必须遵循一条正确的路线。如果路线错误，尽速提高生产力和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的愿望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如今回过头来看，问题非常明显，路线正确与否的一个关键，即是否承认和充分发挥资本主义的活力。世界帝国主义第一次大战，十月革命，接着又是惨烈的国内战争，使本来就不高的俄罗斯的生产力遭到剧烈破坏。但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充分利用了资本主义的活力，迅速地医治好了战争所带来的创伤。我国解放初期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充分利用了资本主义活力，结果创造了我国解放以后（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国又进入了第二个而且更加辉煌的黄金时代。在这两个黄金时代，全部是注意到充分发挥资本主义的活力的。

反之，在无产国家力图搞纯粹的社会主义

义而全面禁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时,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却会大大变缓,甚至远比不上资本主义国家。苏联、过去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北朝鲜和我国过去的历史,全都无一例外地表明了这一点。在上一世纪 20 年代末,布哈林与斯大林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布哈林主张继续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并且予以发展;斯大林则认为搞新经济政策纯然只是出于无奈,现在已经可以完全禁止资本主义而只搞社会主义的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了。论战的结果是以斯大林得胜,而布哈林数年后遇害而暂告一终结。如果当时苏联当局在建设国有企业的同时继续发挥资本主义的活力,在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 30 年代,大力吸收各发达国家的资金,那样一来,不仅苏联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大大加速,甚至有可能避免由于只搞计划经济所造成的自我孤立状态。还有,由被包围的恐惧感所造成的歇斯底里式的“大肃反”的大惨剧都可能得以避免。

问题还远不仅在于在不够发达或极不发达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时,必须利用和充分发挥资本主义的活力,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世界资本主义是否真的已经发展到了其日暮途穷的阶段?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普遍认为资本主义是到末期了。30 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更助长了这种认识。兴起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正是奠基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新建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20 世纪后半期的历史却没有主宰世界革命理论的现实性,也没有证明资本主义确实已经进入了它的末期阶段,因而非得为社会主义所取代不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种社会制度之所以灭亡并为更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根本上是因为它已经不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反之,当一种社会制度尚能继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时,它也就不会灭亡。

那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基本观点来看,世界资本主义是不是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末期呢?看来并没有。不仅在十月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并未达到其末期阶段,就是在现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看来也尚未达到其末期。

诚然资本主义世界在 20 世纪后半期,发生了一系列的经济危机,但是像 20 世纪 30 年代那样的经济大萧条却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且每一次经济危机使得产业结构得到调整,落后的企业被淘汰,整个的生产力反而得到了发展。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的是,反倒是在搞计划经济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受到了阻碍。仅从我国过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所生产的解放牌汽车的“几十年一贯制”来看,就不禁令人担心,如果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全都实行了计划经济,那么,汽车业究竟还会不会再有所发展?

在 20 世纪后半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科学技术上的大革命,大大地推进了全世界的经济发展。令人非常遗憾的倒是,所有这些科技的大革命,几乎没有任何一项是率先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

苏联的党和政府领导从来都极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从他们一再受科学骗子们(如李森科)的欺骗,以行政力量去推广伪科学,另一方面却又把真正的科学当作是伪科学(如基因学、控制论等)。社会主义苏联的垮台有许多具体的因素,但是最根本的一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赶不上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明显不过的一点是:美国能把全世界最优秀的科技人才收罗到美国,为己所用;苏联却做不到这一点。总之,资本主义,即使是在当今最发达的国家,也尚未达到其发展的末期阶段。

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与资产者推动科技发展的历史作用

恩格斯早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工人是资本的奴隶,资产者其实也是资本的奴隶。资产者终其一生不断为资本的扩增而奋斗,如此积累起了巨额的财富。这些财富虽然是以私有财产的形式而存在,但是大资产者及其家属一生中生活所消耗的在其财富中所占的比例其实微乎其微,其绝大部分最终实际上是为全社会所有。全部现代文明也就建立在这些巨额的财富的基础之上。没有巨额的财富,也就没有现代的城市、现代的交通、现代的企业、现代的科研机构 and 高等院校、现代的医院和医学,于是也就没有任

何现代的科学技术和文明可言。“四人帮”想搞“穷过渡”，提倡“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实在只能说是愚蠢至极的狂人呓语。终生不停地为资本的扩增而奋斗，客观上为社会积累起巨额的财富，从历史角度说，这正是资产阶级的巨大历史任务和贡献。

这种巨额财富的来源是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早已阐示清楚了。但是剩余价值所以能够产生的根源又何在呢？是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科学技术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可以说，根本没有任何剩余价值可以剥削，一切剥削都只能是超经济的，数额也只能是极其有限的。反之，科学越发达，资产阶级所能获取的剩余价值的数额也就越大。

在近代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首先是科学技术知识分子的贡献，但是严格说来，应该说是全社会（也包括资产阶级）的功劳，因为是这个社会培养造就了这些科技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了进行发明创造所必需的条件。这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理应属于全社会，而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也就在于：资产者利用其在文化上、组织管理上的才能和资金上所占的优势，将这些理应属于全社会的好处攫为己有。

科学技术越是发达，资产阶级也就越能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现代的大资产者是充分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他们能自觉地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来支持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这一点却远非所有的劳动人民阶级或阶层都能做到的，甚至较小的资本家也未必都能做到。因此说，推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现代大资产者所承担的第二个重大的历史使命。

现代大资产者的最大优势即在于他们掌握了现代的科学文化，因此能够充分理解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包括那些并不能赚钱的纯基础科学和那些甚至在眼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学科（例如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的重要性。他们能够理解现代科学技术所面临的困难和机遇，因此也才有能力掌握和发展。

大资产者不仅通过其所控制的国家机器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直接出资组成各式各样的基金会，以支持多种多样、五花八门的科学技术的探索；从有直接应用前景的技术创新起，

直到高度理论性的纯科学研究为止。这也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不断取得科技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使得人们可以不受官僚主义的阻挠，而纯粹只从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要求来考虑问题，研究问题。

除此而外，大资产者在各大企业中还开设了专门的科研机构来为各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服务，以保证企业自身的发展。

许多大资产者，在遗嘱中把巨额的资产捐赠给大学或科研机构，这也正是他们理解和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一种表现。应该说，大资产者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解和重视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国力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什么人能够取代资产者继续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劳动人民中间的什么阶级或阶层在执掌政权以后，能够取代大资产者而继续推动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这是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面临的一个最根本的严峻问题。

现代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发展上的竞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有最先进的企业、最先进的农业和最先进的军事力量。因此，掌握了政权的劳动人民若不能像大资产者一样有能力推动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那么他们所创建的国家迟早会因为科技的落后和生产力发展的滞后而被推翻。

如果劳动人民中间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或阶层在执掌政权以后能够代替大资产者在推进科技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则社会主义事业就根本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就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承担者问题，与无政府主义的头子巴枯宁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巴枯宁主张“越穷越革命”，因此把希望寄托在城市贫民和流氓无产者身上。而马、恩则把期望寄托在产业无产者的身上，因为他们必将在与资产者的罢工斗争中受到锻炼而越来越有组织性，而且他们也是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直接有联系的。

历史已经证明，在这一论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对的。在十月革命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创

建中,产业无产阶级都是主力。但是夺取政权是一回事,在夺取政权以后能否最迅速地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却是另一回事。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在发展科学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表明他们在理解和掌握现代的科学文化上是有困难的。苏联晚期科技发展迟缓,生产力停滞不前,虽则有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更是表明了最高权力并未掌握在真正能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能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阶层的手中。否则的话,他们早就会对起了阻碍作用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了。从美国的产业无产阶级对美国发展航天事业(登月、登陆火星、考察各个行星)的冷漠态度,甚至反对的态度来看,他们显然也不能取代大资产者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上所起的作用。一则在对现代科学文化的掌握上尚有相当大的差距,二则他们的眼前利益与发展科学技术的要求也并不完全一致。

那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究竟有什么劳动阶级或阶层既能创建新社会,又能完全取代现代大资产者在迅速发展科学技术上所起的作用呢?

这本来似乎是一种无解的难题,因为它要求出现这样一种劳动阶层,它对现代科学文化的掌握上,以至在组织管理的能力上,都不亚于现代的大资产者。

但是20世纪的后50年,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引起的社会变化,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这种社会变化在马、恩和列宁的时代是难以预料的。实际的发展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中自动化的程度日益提高,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得到广泛的应用以后,传统上作为产业无产阶级的主体的体力劳动阶层逐步走向衰微,将来还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走向没落。举例来说,产业无产阶级的重要成员之一的矿工,将来就必然会被操纵着自动化采矿机器的机器人所全面取代。与此同时,现代工人阶级中的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却空前迅猛地急速发展了起来,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迟早要变成工人阶级的主体。

这个科技知识分子阶层不仅包括所有设计和操纵高度自动化和信息化器械的人员,而且包括所有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教师和传统

上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资方代理人”)的所有企业管理人员,只要他们主要是靠拿工资吃饭的雇佣劳动者就行,无论他们所拿的工资有多高,也无论他们怎样看待他们自己,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只有“四人帮”之流的反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叫嚣要按照人的思想意识来划分阶级)。

实际上,作为雇佣劳动者的科技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从来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工人阶级中最有文化教养和组织管理能力的一部分。只是在过去的时代,他们的人数太少,又是资产阶级所不得不依靠和利用的对象,从而也自然是资产阶级所必须收买的对象。在那个时代,他们的社会地位与他们实际上的雇佣劳动者的身份是完全脱节的。但是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他们的人数急剧地增长着,要全部加以收买已经越来越不可能,将来还会更加不可能,这无疑将有助于他们获得阶级的自觉。

在过去的时代由于他们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他们对于工人阶级所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抱有冷漠、甚至反对的态度是势所必然的,他们因而受到马、恩和列宁的批判性的评价也同样势所必然的。但是,即使是在那个时代,他们作为科学技术的直接推进者和推广者,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就已经是至关重要的。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曾经指示说,要让科技知识分子通过亲身的体会,认识到无产阶级的政权是对科技事业的发展更为有利的,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除非是搞“大跃进”式的大胡闹)。

近50年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日益走向衰微没落的体力劳动阶层不大可能继续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反之,日益发展起来的科技知识分子阶层也日益变成为大资产者谋取超额的剩余价值的直接剥削对象,这自然也大有利于他们获得阶级的自觉。近几十年来有日益增多的科技知识分子在大企业所开设的科研机构中工作,他们所取得发明创造的专利则完全为大资本家所占有。大资产者由此得到的剩余价值之丰厚,是任何体力劳动工人所绝对无法提供的。在分子生物学的发

展上造成了革命性变化的 PCR 技术的发明者（后来得到了诺贝尔奖）仅从他的老板那里得到了一万美元的奖金，而他的老板却由此项技术专利而得到了数亿美元的利润！其实，即使发明的专利为发明的科技知识分子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也只能把专利卖给大资产者，让后者去赚大钱，这样的客观现实自然迟早会促使科技知识分子达到阶级的自觉。英国的大学教授历来被认为是英国社会的上层，但是，早在 20 世纪的 70 年代，他们就已经不得不组织工会以保卫自己的利益了。

在全体工人阶级中间和全体劳动人民中间，科技知识分子阶层是唯一在现代科学文化的掌握上和组织管理的能力上，都丝毫不亚于现代大资产者的力量。作为科学技术的直接创造者和发展者，他们也是唯一能在执掌政权以后，完全能够代替大资产者而继续推动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的力量。由于他们自身就从事现代科学技术的创造和发展，他们比大资产者更了解发展科技事业的个中甘苦，更能了解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所在，所以他们理应能比大资产者更好地、更有效地推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根据以上的分析，这个目前在工人阶级中所占比例还很小，但是正在日益发展中，迟早有一天会变为工人阶级的主体的阶层，这个在目前阶级的自觉性还极低，但是迟早会觉醒起来的阶层，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唯一能在将来开创新的社会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力量。

在他们发展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以后，他们终将会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进行斗争，逐步地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如今看来，大资产者不太可能，也不会有能力对他们进行镇压，而只能在他们的要求面前逐步地退却。因此这种社会革命很可能是长期的和渐进式的，但是总会持续地进行下去。现代的大资产者即使完全意识到了这种必然的历史发展，但是只要他们还在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大资产者之间的竞争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如此），他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阶层日益壮大起来。

如此创建起来的新社会无疑会跟“早期的”工人阶级所创建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有很多的差别，但是，那毕竟是次要的事

了，而且只可能做的更好，而不会不如。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所应该做的事

如果认可我前面的分析和推断，那么，共产党人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应该自觉地代表这个唯一有远大前途并肩负着历史重任的阶层的利益，为这个阶层的发展壮大和及早地获得阶级的自觉，认识自身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而奋斗。党要成为他们的先锋队，无论这个阶层目前还是多么微小，多么地缺乏阶级的自觉性。

为此共产党人就应该尽一切可能学习和掌握现代的科学文化，把自己锻造成为科技知识分子队伍中先进的一员。也只有这样，共产党人才真正有可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并代表劳动人民的长远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只能代表他们的眼前利益。

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中的，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也无论是已执政的，还是未执政的，都应该努力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促进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促进科技知识分子阶层的发展壮大，促进他们的阶级觉悟。为此，共产党人应该与一切怀有同样的具体愿望的政党和团体合作，无论他们是代表大资本家、小资本家或劳动人民。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经济，既符合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于发达国家中大多数大资产者的利益。

在不发达国家，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共产党人领导劳动人民夺取政权的目的，只是为了尽快地发展生产，尽速地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发展科学技术，而不是为了搞乌托邦式的“纯粹的”社会主义。为此就得充分地发挥资本主义的活力，走开放的道路，以求把自己的国家尽速地建设成为发达的国家。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切不可搞任何形式的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损害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利益的平均主义，虽则某些劳动人民可能会渴望这样做。如果那样做了，就必然会损害他们自身的长远的根本利益。

（责任编辑 程 度）

陈昌浩的功过是非

● 鄢烈山

我注意到陈昌浩，知晓这位红军时期重要人物的传奇经历和悲壮命运，关切对他一生功过是非的评价，完全是出于一种宿命的偶然。

我尚在襁褓之中时，我们根据地那个区的区委书记范青（我母亲至今一直称他为“范政委”），作为土改、合作化的工作队长在我家住过两年。知识青年出身的范青，1955年被人诬陷为“胡风集团”党羽而被押受审，历经“反右”、“文革”等劫难，九死一生回到老家湖北省汉阳县供销社做营业员。而这个汉阳县便是陈昌浩诞生和初试身手组织农会响应北伐军的地方。范青于1980年1月平反，同年8月中共中央为不堪凌辱于1967年7月30日服药身亡的陈昌浩举行追悼会。1983年范青接触有关陈昌浩的资料后，即“有一种强烈的要为他写传的冲动”，着手搜集有关历史文物、文献及与传主相关的回忆录，并采访陈昌浩的老战友、老部下和亲属，终于在1994年先出版了文学性的《陈昌浩传》。接着他又与武汉市党史办的陈辉汉合作，于2001年初冬完成了史传《陈昌浩的革命生涯》，并于11月抱病携稿赴京商谈该书出版事宜。返回湖北后范青病情加重逝世，没有看到该书面世。我案头的这本《陈昌浩的革命生涯》，共38万字，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刘华清、洪学智、李德生、陈明义四位将军题词。这本书既是陈昌浩一生经历的忠实记录，也是范青晚年心血的宝贵结晶。范青叔叔的夫人、与他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滕维茂老师寄赠一册给我做纪念。该书印数只有2000册，没有这种“世谊”的缘分我是不可能见到它的，也就不大会注意到陈昌浩。



陈昌浩

不错，陈昌浩在红军时期曾经置身举足轻重的显赫地位。粗略地说，他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的“三驾马车”（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之一，为红色根据地的建立与红军的发展壮大，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作为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的主帅，与徐向前联袂征战6年，配合默契堪称高级将领精诚合作的典范……然而，20世纪中国的革命志士与救国功臣中，一度比陈昌浩更加位高权重或德高望重的人物非止一二，不是有许多同样被人们遗忘了吗？

不错，陈昌浩的后半生郁郁不得志，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西路军失败，他在河西走廊幸得一位湖北同

乡、草药医生但复三仗义援救，死里逃生回到延安。从此，被解除军职，无缘效命抗战前线，而担任宣传科长兼政治教员，以“待罪”之身开始了漫长的“检讨生涯”。1939年党中央安排他携子搭乘接送周恩来治伤的专机到苏联治胃病，次年出疗养院后，多次申请一直未获国内批准回国，直到1952年才获允返京。“牧羊”苏联期间，当过采石工、消防队员，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卫国战争奖章”，战后主编《俄华辞典》。他偕妻、子回国时，刘少奇等人曾到北京火车站表示欢迎。尔后他担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革”爆发后，他在劫难逃。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中，他的老部下、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撤职，他便“顺理成章”地成了“陈再道的黑后台”，终以61岁的年龄含恨辞世。逝者长已矣，历史人物本身的魅力和历史事件的谜底，仍然一直为人们所关心。

二

读过《陈昌浩的革命生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是，陈昌浩作为一个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归来的政工首脑，竟然还是一位勇于冲锋陷阵的猛将和高瞻远瞩的军事家。

1931年12月，即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的次月，身为政委的陈昌浩，带上手枪和手榴弹登上缴获来的飞机，逼使俘虏的飞行员飞临黄安城敌军上空，撒传单，扔炸弹，揭开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序幕。50多年后，徐向前元帅回忆此事，仍对他赞不绝口。

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反第四次大“围剿”失利，他亲率前卫部队，指挥许世友所在的红十二师三十四团抢占北山垭口，使全军得以脱离险境，从漫川关胜利突围。在生死存亡悬于一线之际，陈昌浩充分显示了他把握战机、敢打恶仗的韬略和勇气。吝于颂人的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写道：“陈昌浩的行动极为敏捷，约一个半钟头，他就带十余骑扼守住那条小路的隘口了。（国民党的）萧之楚部迟到了一步……”

在随后进军川北的征途中，他与红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亲率一个特务营突破川军的第二路防线。陈明义将军（当时的总部参谋）回忆道：“陈昌浩和战士一起打仗，砍鹿砮，摔手榴弹，好像（自己）位置放的不合适；但从当时红军初入川陕，为了打开局面，指挥员的亲临前线，勇敢、沉着、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是有很大的表率作用的。”当我读到陈昌浩、王树声等人滚岩下

山的场景时，不由得想起三国破蜀名将邓艾。红四方面军能由鄂豫皖苏区撤退时的万余人又发展到八万多人的主力部队，陈昌浩主帅的这种英雄气质当是不可抹煞的因素吧。

三

与陈昌浩后半生屈沉下僚有关的三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陈昌浩是“张国焘的人”吗？

陈昌浩于1931年4月与张国焘、沈泽民、张琴秋等人同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鄂豫皖苏区，共事合作5年多，作为“第二把手”，他与张国焘之间肯定是互相信任的。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整编制，陈昌浩受命担任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随党中央和毛泽东北上。政治局在沙窝开会时，陈昌浩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毛儿盖会议上他发言支持毛泽东，受到毛的赞赏。他是明确支持红军北上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前夕，陈昌浩布置政工人员书写的一块石雕标语：“消灭刘湘，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抗日”，至今仍屹立在昔日的长征路上。那么，过草地后他为什么又违心地走回头路，南下与张国焘会合，而不跟毛泽东北上呢？可以说，要求他和徐向前率南下的命令，是以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名衔下达的，作为军人他不能不无条件地服从直接上级的指挥；但这也确实与他对张国焘多年积累的信任关系有关，他与徐向前都不愿四方面军从此分为两半。然而，他又绝非张国焘的死党。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宣布成立“临时中央”，陈没有表示支持。1936年夏，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师。9月16—18日，“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解决行动方向问题。张国焘反对执行中央13日来电，说北上“是断送红军”，坚持西渡黄河。陈昌浩第一次公开站出来反对张国焘，二人发生激烈争吵，互不相让，最后张国焘以“不干了”相威胁，带着警卫员哭着离开了岷州。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调动部队西进，陈昌浩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命令部队停止西进，待命而动。张国焘先是跑到前线徐向前、李先念等人所在的樟县大哭，说“陈昌浩反他”（所部红三十军军政委李先念回忆），有取而代之的野心，赢得了不明真相的众将领的同情和支持。接着，张国焘深更半夜找陈昌浩谈心，哭说利害，要求保存四方面军，说北上“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我们交出兵权，

开除我们党籍,军法从事”。但是续开“西北局”会议时,陈昌浩仍坚持北上,明确表示不能再作四方面军政委。有此种因素,特别是党中央不批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且战局已发生变化,四方面军才顺利北上实现与中央红军的大会师。由此可见,陈昌浩是一个独立的红军指挥官,而非什么“张国焘的人”。

第二,陈昌浩有加害毛泽东之心吗?

如上所述,陈昌浩率领的右路军随党中央机关走出草地后,张国焘命令他率军回师南下。毛泽东见争取陈、徐共同北上无望后,于9月10日凌晨,率中直机关与红一方面军建制的第三军团和红军大学,向林彪、聂荣臻的第一军团所在地俄界出发。与此同时,叶剑英于陈、徐熟睡之际,取出全军唯一的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军用地图,走出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并叫醒红三军的另一部分干部战士回归一方面军。待陈、徐天亮起床,发现叶剑英与军用地图不见了,中央红军连夜出走,还对红四方面军放了警戒哨。陈、徐突遇此事,很受刺激,半晌说不出话来。四方面军将领打电话请示陈昌浩打不打?徐向前回忆此事说:“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这样的一个陈昌浩,怎么可能有加害毛泽东之心呢?

第三,陈昌浩是否应该对西路军失败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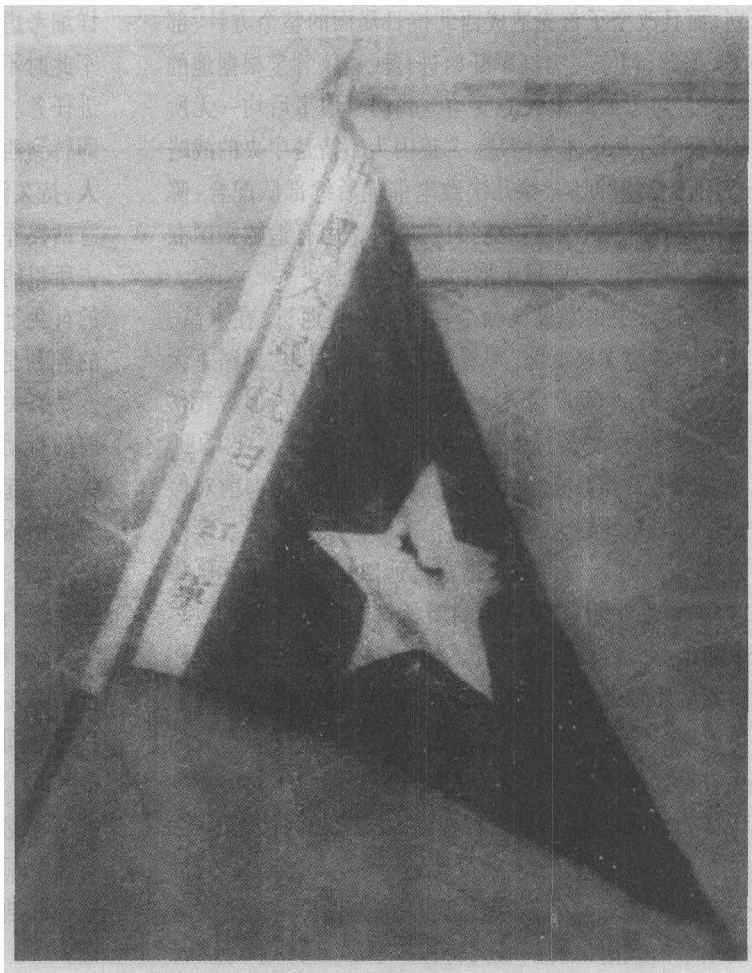
这个问题延安时期有“定论”,在80年代以前是禁忌话题。1982年,原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兵败祁连山石窝后的西路军工委军事指挥员、国家主席李先念,受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组织班子花了近一年时间,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后,于1983年2月25日完成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的几个问题的说明》,从历史的全局与河西走廊的地理条件以及敌我双方的优劣势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大型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对50多年前西路军的战史,从任务、战场主动权等方面,作了系统的描述与概括。政治的禁区已冲破,历史的迷雾渐渐消散,现在应该可以实事求是地回答这个问题了。

西路军的失败并非陈昌浩执行“国焘

路线”造成的恶果。(张闻天在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说:“什么叫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1991年修订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注释是:“(1936年)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已)过(黄)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正视历史,事实是,西路军不是什么“国焘路线的牺牲品”,而是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为了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最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英勇地作出了自我牺牲。它的赫赫功勋应当永垂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

西路军孤军独进苦寒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这支长征两年、三过草地、两越雪山,拖着机关、医院和伤病妇孺等非战斗人员近半的负累而没有根据地回旋的部队,面对的是出于“保存地盘”的顽固意志又得地形、



西路军军旗

天候、民风诸便，且有蒋介石明里暗里支援的驽悍的马家骑兵部队……撇开这些客观条件不谈，着重看看陈昌浩究竟接受的是谁的指挥，从战略上执行的是谁的“路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古城会师。由于陕甘宁苏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总人口仅40余万，而二、四方面军就有近5万人，难以容纳这么多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决定西渡黄河，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以接通苏联。在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偷渡黄河成功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宁夏战役的部署作了重大改变，先将“全力攻宁夏，打通国际通道”改为“分兵攻打南敌和以一个军攻打定远营”，接着又改为“先打胡（宗南部）敌，后打宁夏”。因后续部队止步待命，结果只有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800人渡过黄河。这便是后来奉命组成的西路军，承担的任务是在河西创造根据地、独立从新疆方向接通苏联。80年代徐向前回忆道：“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正因为不清楚中央的战略意图已变，其间陈、徐几次致电催促后续部队配合，陈昌浩还在中央不采纳他们的建议时，因有追随张国焘南下犯过错误的思想包袱而举人自代。

随后，中央军委又命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尽管渡河后半个月里，西路军无日不战，歼敌6000余人，给马家军沉重打击；但敌我伤亡相当，特别是经过古浪血战后，西路军减员至15000余人却得不到补充，陷于被动局面。因此，徐向前对停止西进的新计划大不以为然，与陈昌浩发生了共事以来第一次争吵。事实上，据滕代远回忆，共产国际已将90辆坦克与90门大炮运到新疆只等红军去取。但军令如山，陈昌浩还是坚持执行中央停止西进的命令。许多年后才知道，中央军委这个部署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也就是说，西路军停在永凉一带的牺牲和消耗，是为了策应全局而充当“疑兵”。

就在这时，“西安事变”发生，中央决定放弃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的战略大转移“作战新计划”，12月18日军委主席团命令西路军将基本任务“放在打通远

方上面”。可是，此时局势发生新变化，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进逼西安。军委主席团于24日夜令西路军东返，以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日西路军又奉命西进。瀚海阑干百丈冰，衣衫褴褛的红军将士们冒着剜指裂肤的酷寒，忍饥挨饿踏着戈壁滩连夜再度往西进发。

蒋介石回南京后扣留了张学良，调集重兵威逼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1937年1月5日，军委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1月16日军委不仅没有同意陈、徐关于将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以补充西路军的请求，且下令西路军东返，因为“目前关键在西安”。作为国共谈判大局中的一粒棋子，西路军就这样受命忽西忽东，丧失了时机，陷入敌军的重围。高台失陷，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余人壮烈牺牲。西路军总部突围进驻倪家营子，马家军倾巢来犯，双方在此展开了历时20多天的血战。这时西路军全部人马已不足万人，彩病号占1/3，处境十分危急。

2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17日中央复电陈、徐，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这个电文把当前的行动方针问题与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给西路军军政委员们特别是主席陈昌浩的政治压力可想而知。21日晚，党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要求他们：“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24日徐、陈致告急电文汇报险恶的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决心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3月2日党中央正式决定增援西路军，并于3月5日出动四个军并一个骑兵团组成援西军，由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率领出发，3月中旬到达镇原、平凉地区待命。

西路军撤出倪家营子后，敌军紧咬不放，又退至祁

连山,且战且撤。至此,西路军经4个月的苦战,连伤员在内已不满三千。3月12日徐、陈报告中央军委:“现全军不足五团,在野外老林中食骡马续死战。现百分之七十系彩病号,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疲乏大过,挖堡垒不易,现全军决死斗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3月13日又致电中央,作最后吁求:“(一)我们十三日晨被敌猛迫进到西洞堡西边九十里祁连山腹,全在山上露营,现敌已赶到,正持战中。(二)西路军现不足三个团,虽精神(诚)团结,斗志坚决,但子弹几尽,日夜连续血战,受挫极大。(三)附近皆高山险路,转移困难,在这紧急情况下,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估计援军全部或大部若能于五日内渡过黄河,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凉州进逼,则围可立解。西路军现存的大批干部及积极分子可以保存,并可协同援军解决二马,否则全部危险性极大。时迫词切,望即复示,并争取白天与我们通报。”毛泽东随即复电:“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停止待命,加紧训练。”22小时后,毛泽东又致电徐、陈:“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指示他们或率现存三个团人员向外蒙冲去,或率现存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14日西路军军部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决定分兵突围,各求生路。西路军8位军政委员最后联名给中央和军委发电,再次表示“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战线……”

这就是西路军失败的悲壮历程,二万名红军指战员用生命和鲜血书写的战史。对于这些,中央和毛泽东当然是十分清楚的。

既然如此,为何要给侥幸活着归来的陈昌浩加上不实不堪的罪名呢?

一方面,这是当时国共政治斗争的需要。正如3月2日中央就若取得国民党顾祝同部谅解、在“不影响和平大局”前提下成立援西军之事,致电彭德怀、任弼时等人商量时所言:“西路军若根本失败,影响极坏。”影响什么呢?有损于红军的威名,伤及中共在国共谈判与合作中的地位。因此,需要有一个人来承担指挥不当导致失败的罪责。作为西路军的第一号人物,陈昌浩可以说“义不容辞”。

另一方面,这也是党内路线斗争的需

要。陈昌浩1937年8月下旬潜回延安之时,中央正在开展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西路军失败已与张国焘路线联结在一起。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下了定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种定性结论一旦作出,就没有什么好商讨的了,从此成为铁案和研究禁区,直到“两个凡是”被否定之后。

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背景,由陈昌浩承担了政治责任,西路军和四方面军别的指战员,包括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程世才这些西路军军政委员,有的虽受过各种审查和处分,但在军内党内的任用和发展,并没有受多大影响。而陈昌浩因此牺牲个人的政治名誉和政治前途,也算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作的另一种奉献吧?时至今日,廓清了政治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陈昌浩若泉下有知,当可开颜一笑了。

(责任编辑 吴思)

传记文学 月刊

名人的辉煌与风采,百舸的苦辣与酸甜

欢迎订阅 2003年

● 国内外公开发行全国邮局(所)均可订阅
● 邮发代号 82-370 本刊可办订阅邮购
●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 邮编:100029
● 电话:(010)64813340 64813378(传真)
● E-mail:zhuanjil@yeah.net

透视大千世界 记述人生甘苦
关注时代风云 钩沉历史珍珠
雅俗共赏 图文并茂

每期6元

国民党元老 吴铁城的宦海浮沉

● 方 可

“国父”的小同乡 “蒋校长”的心腹

吴铁城，原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县）平湖乡人，与孙中山是小同乡。但他并未在故乡长大，而是于1888年3月9日生在离香山有千里之遥的江西九江。

吴铁城早年入九江同文书院读书，经林森介绍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策动新军标统马毓宝于九江独立，任参谋次长兼外交部长，为统一江西立下了显赫功勋。同年12月，吴铁城以江西代表身分，到南京商议国是，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受到孙的接见。当孙中山得知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是自己的香山同乡，便将他留在身边工作。

孙中山成立广东护法军政府时，吴铁城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后改任总统府参军。

1923年1月，孙中山发动讨伐陈炯明叛军的战争，吴铁城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军司令。2月，孙中山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吴被任命为广州市公安局长兼警务处长。10月25日，他又被孙中山指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4年9月，孙中山誓师北伐，吴铁城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长，率部保卫孙中山的安全。10月，广州商团叛乱，吴铁城率领警卫军星夜回师广州，与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军校学生军一起，平息这场叛乱。

这是吴铁城与蒋介石的第一次合作。蒋介石对这位“书生”的果敢坚毅非常赞赏。

由于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平定商团叛乱后，吴铁城重兼广州市公安局长、市党部委员、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等职。对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吴铁城从思想上不赞成，故竭力反对国共合作。

吴的这种坚决反共的右派态度，受到孙中山的批评，但却得到了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的欣赏。

为了支持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吴铁城将自己举办的警卫军讲武堂学员送给蒋介石，作为黄埔二期学生。当时，黄埔军校经费拮据，蒋介石为此大伤脑筋。身为广州市公安局长的吴铁城，从公安局经费中专门拨出一笔款项，以每天伙食费五百毫洋的标准，源源不断地供给黄埔军校。

孙中山逝世后，吴铁城所在的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一度成了反共的大本营。吴铁城、孙科和伍朝枢等人成为广州国民党右派的中坚。

利用任公安局长的便利条件，吴铁城将苏联顾问及在广州的知名共产党人登记造册，探清在广州的住址，准备寻机一网打尽。1926年3月初，吴铁城与孙科、伍朝枢一起到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密谋清除广州的共产党事宜。经过一番严密的策划，扣押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派兵解除了苏联顾问团卫队的武装。

可出乎吴铁城意料的是，就在他准备在广州大捕共产党人的时候，他却被蒋介石下令逮捕了。

原来,吴铁城与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欧阳格等人策划的“中山舰事件”爆发后,共产党、国民党左派纷纷抗议和谴责,要求严厉惩办肇事的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感到自己羽翼还没有丰满,不敢立即与共产党公开决裂,遂采取“舍卒保帅”的办法,借惩处制造事件的右派分子,以示其作为国民党“第三者”的“公正”。结果,吴铁城作为“替罪羊”之一,被免除本兼各职,押解到虎门横档炮台禁锢。吴铁城对此百思不解。但时间一长,他逐步琢磨出了其中的“奥秘”:原来蒋介石逮捕自己是“挥泪斩马谡”。

1926年双十节,吴铁城获释后投居上海的孙科家中。鉴于吴铁城在最困苦时刻仍不出卖自己的“义举”,1927年6月,蒋介石决定再次起用吴铁城,任命他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建设厅长。

游说东北,助蒋完成统一大业

1928年4月,蒋介石举行第二次北伐。6月4日晨,日本悍然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东北能否易帜归附,是国民党政府能否统一全国的最后标志。蒋介石派吴铁城北上,游说张学良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吴铁城沿京奉路乘“蓝钢花车”由浦口经济南到北平,与张学良所派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然后经山海关直驶沈阳。张学良及东北政要看到吴铁城如此豪壮的排场,不禁刮目相看。吴铁城利用与许多东北将领的旧交,感以私谊,晓以大义,几经折冲,始排万难,达成易帜协议。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冲破日本阻力,通电全国宣告“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终于使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

1929年9月,蒋介石策动张学良挑起反苏的“中东路事件”。为了鼓动张学良的反苏情绪,蒋介石决定任命吴铁城任东北劳军宣慰使,再赴东北劳军。

此时的吴铁城,正与林森忙于主持将孙中山的灵柩由北平奉安南京。他接到蒋

介石的命令后,立即冒着零下50度的严寒,秉节出关,驰驱于冰天雪地中,往来于中东路,遍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地。

吴铁城到处发表演说,疾呼:“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

这两句话,一时传颂全国,成为流传甚广的名言。

此次东北之行,炫耀了蒋介石的中央政权的声威,加深了他与东北人士的关系。

1930年,阎、冯、桂、汪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联合反蒋,中原大战爆发。坐视关外的张学良,对时局有举足轻重之势。所以,交战双方都不遗余力派出说客云集沈阳。蒋介石第三次派吴铁城出关游说。

吴铁城至沈阳后,缠住张学良不放,向东北军政当局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伐交”。

此时,辽宁国民外交协会正召开“追悼抗俄将士大会”,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都派代表参加致祭。按照吴铁城的要求,蒋介石命令南京政府拨款50万元,褒奖东北边防军对苏作战阵亡



吴铁城

的东北军将领。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政府向张学良、王树翰授勋。

6月3日是张学良的生日。吴铁城宣读了蒋介石的贺电：“汉卿兄及凤至夫人赏鉴：贤伉俪华诞，中正等远道未能趋贺，谨电祝福寿连绵，德泽广被！蒋中正、宋美龄同叩。”

对于蒋介石的关怀，张学良表示：“决愿为国家、为介公效命”。

但张作相、张景惠等老派将领认为：“我们吃高粱米的，哪能斗得起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的。”他们主张东北军的任务是保境安民，不与任何方面合作。故此，张学良为摆脱群集沈阳的各方代表的纠缠，避居葫芦岛。

吴铁城觉得，要想使“伐交”取得实效，关键是要有强大的雄厚的金钱作基础。所以，他回到南京向蒋介石建议：要舍得花钱才行。

蒋介石立即命令财政部长宋子文，给吴铁城拨了600万元现金，作为“伐交”费。

吴铁城利用手中雄厚的金钱，对东北军政大员发动了强大的“银弹攻势”：他一次就将百万元巨款送给张学良，惊得张少帅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在一次赈灾会上，以4万元买下一朵少帅夫人于凤至所做的纸花，令在场的人瞠目结舌。

他又与东北政要们豪赌，一夜之间赢得他们一无所有，但又如数奉还，他更会故意输掉数十万，令这些东北政要们心花怒放。

有人说：“张学良的副官、马弁都被吴铁城收买拉拢了，以致于张的一切行动，吴铁城都了如指掌。”

在吴铁城等人的劝说、利诱和催逼下，张学良终于表示：“待中央军拿回济南时，可以考虑出兵。”

8月15日，蒋军夺回了济南，并从9月6日起，展开陇海线上的总攻。9月15日，张学良召开的东北军政会议最后决定：“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我方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

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巧电”，令东北军大举入关。腹背受敌的冯、阎联军迅速土崩瓦解，蒋介石终于获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

10月9日，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张学良在沈

阳宣誓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800多人参加了这个隆重的庆典。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做监誓人，向东北各界致词：“本党政府特以此重任，付托张副司令者，知张副司令笃信本党之主义，接受国民革命之使命故也。”

他在表彰张学良自东北易帜以来的功绩后讲道：“任重道远，惟望张副司令辅助蒋总司令，同心协力，共策进行，党国前途，实利赖之。”

卖国挨揍，励精图治建上海

1931年12月，上海市长张群因学生反日运动高涨，被迫辞职。蒋介石命吴铁城接任上海市长职务。

就在他上任不久，日寇挑起“一·二八事变”，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被迫抵抗。蒋介石仍竭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月31日，蒋介石授意军政部长何应钦电告吴铁城：（一）各国领事既出而调停，不得任意射击；（二）通令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没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三）亲善各国军队与侨民，以取同情；（四）对假托爱国主义之捣乱团体，应严加制止；其他民众爱国之行动，须周密注意，以防“共匪”从中利用机会。

2月15日，何应钦再次致电吴铁城，让他以私人资格与攻沪日军将领商定“和平”方案。

唯蒋介石之命是从的吴铁城，立即多方拜见，竭力媾和。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在签订这个卖国的协定前，爱国律师吴迈曾亲晤吴铁城，义正辞严地告诫：“阁下如不顾民意，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协定，到时杀市长头者就是我吴迈！”

然而，《淞沪停战协定》还是签订了，这使吴迈悲愤交加。他率爱国学生、群众500余人直赴上海市政府，声讨吴铁城。一见到吴铁城，就怒斥道：“日前，市长向市民保证不与日军签订城下盟约；今日食言自肥，阁下有何理说？”

吴铁城窘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说：“这都是中央的命令，我是实难违抗呀！先生何不进京向行政院表达民意，吁请收回成命？那么，不仅协定条款可以从长斟酌，连我也当解厄之情，对得

起民众了！”

吴迈听后怒火中烧，禁不住脱口问道：“倘若中央命你施美人计，派夫人、令爱前去慰问白川大将，我断言阁下必将犯颜抗争，以全家声。然而，近年来东北诸姑姐妹，被兽军凌辱蹂躏者何可计数？阁下却知而无动于衷。两相对比，岂不是重家耻、轻国耻的汉奸惯常行为吗？汉奸人人皆可杀，今天我与你同死报国！”

说着，吴老先生操起席前痰盂，猛然朝吴铁城砸去。

只听“嘭”的一声，痰盂击中吴铁城左肩。吓得吴铁城连声呼救。预先埋伏在室外的上海市警察局长吴芷贤，急忙率便衣警察破门而入，将正欲穷追猛打的吴迈拦住，并抓进了看守所。

吴迈被营救出狱后，上海律师协会组成律师团，依法具状控告吴铁城、吴芷贤利用职权侵犯人身罪。

吴铁城知道众怒难平，也采取了当年蒋介石玩弄的采取“舍卒保帅”之计，将吴芷贤当作自己的“替罪羊”，撤职查办，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经过上任短短几个月的紧张忙碌，吴铁城开始知道上海市长真难当。还好，他没有像他的前任张群那样灰溜溜地下台，而是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终于渡过了“难关”。

上海是中国的交通枢纽，南京的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同时，上海又是江浙财阀的重要据点，是南京政府赖以存在的支柱。所以，蒋介石特别提醒吴铁城：“上海非普通都市可比……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则不能有头绪。”

吴铁城奉行蒋介石的意旨，在上海停战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继续推行黄郛在1927年任上海市长时所拟定的“大上海计划”。

为了建设大上海，吴铁城曾两度发行公债，第一次300万元，不到十天便已销完；第二次600万元，也很迅速的筹足。他运用了这900万元，建设新的市政府、各局所、市医院、市体育场、市图书馆、市博物馆，使市容面貌一新；他建筑虬江码头，港深可泊巨大商轮，对外贸易，日趋发达，工商百业，随之繁荣。全市人口也由1932年

的290余万人，激增到1937年的500万人，使上海不仅成为全国第一大都市，也成为东亚举足轻重的重要商埠。

吴铁城任上海市长5年多的时间，便完成了蒋介石赋予的“整理”大上海的使命，将上海建设成了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国际大都市。

喊出悲壮口号，发明“吴铁城条文”

1939年春，蒋介石调吴铁城到重庆，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1941年5月，吴铁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

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管家婆”。对于吴铁城任职期间的工作辛劳情况，陈立夫曾感慨地说：“无日无夜的开会，舌敝焦唇的讨论，党内的意见，要不惮辞费的求沟通。党友的意见，要接纳，要让步。共产党的意见要争辩，要驳斥。国际友人的意见要尊重，要解说。直到国民大会开会的前夕，我和铁城先生，简直到了日夜不得休息，身心交瘁的境况。”

吴铁城既有坚强的毅力和原则性，又八面玲珑、善于交际，很会平衡各方面的关系，不久便赢得了国民党上下的好感和蒋介石的欣赏。

1944年，日寇发动湘桂战役，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到12月时，日军在占领桂林、柳州后，一度侵入贵州境内，陪都重庆告急。正是在这种困难时刻，蒋介石发起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发布文告号召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踊跃参加青年军，准备最后大反攻。同时，他给吴铁城下了一道手令，命他全力宣传并发动这一运动。

吴铁城立即遵照蒋介石的指令，通令各地党部积极行动，在短期内完成了蒋介石的使命，并以“用美式武器装备青年军作为反攻的主力部队”，以“青年军将享受比一般军队更好的待遇”之类许诺来吸引青年。

在宣传“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中，吴铁城作出的最突出贡献，是将蒋介石的这一运动用两句口号加以概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这两句口号，深深打动了当时许多知识青年的心。吴铁城这两句简短有力的口号，与他在东

北所发表的“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机”一样,成为传颂一时、流行全国的名言。

抗日战争结束后,吴铁城是国民党政坛上最活跃的人物之一,被称作“全党的幕僚长”,专以调停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纷争为务。1946年1月,吴铁城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身分当选为国民党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当各方代表在审议宪法草案时,对“国民大会”的职权问题产生异见,互不相让。结果,吴铁城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令各方都能接受,达成协议。这一方案,被负责起草宪法草案的张君勱写入《宪法原则》第27条,称为“吴铁城条文”。

以一个人名命名一条法案,这在近代中国还是第一次。

党国“铁老”顶撞“总统”服药自杀

1948年11月26日,蒋介石批准行政院长翁文灏辞职,提名孙科组阁。这样,孙科留下的立法院长的位置便理所当然地要由吴铁城来继任,蒋介石也表示同意。可出人意料的是,在孙科开出的组阁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铁老”,要他当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并且向蒋介石表示,“非铁老同出不拜命”。

吴铁城走马上任未久,蒋介石下野了。但蒋介石仍在溪口通过电话向孙科内阁发布指令,以孤立代总统李宗仁。对此,吴铁城甚不以为然,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意见上的分歧。

为了取得美国政府的援助,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吴铁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一次会谈,请求美国贷款。

司徒对吴铁城说:“美国国会对中国政府内部不团结表示忧虑,如果蒋先生不出国,南京无从集中权力,因而和谈也就没有希望。”

对此,吴铁城也有同感。他认为,必须尽快劝说蒋介石出国,才能将权力集中在李宗仁和自己的内阁手中。于是,他请曾当过蒋介石机要秘书的李惟果,到溪口转告自己急切希望其出洋的意思。

吴铁城没想到,他的这个建议,蒋介石非常恼怒,大骂吴铁城忘恩负义,几天以后,他逼迫孙

科内阁辞职,而吴铁城的中央秘书长一职也被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下令撤销。

国民党政权迁到广州以后,美国希望李宗仁在广州组成一个与蒋介石截然分开的政府,但蒋介石无意帮李宗仁保广东,暗中指挥从上海、青岛等地撤出来的军队往沿海一些岛屿驻防,吴铁城对此痛加责难。

当美国政府公开发表给蒋介石当头一击的白皮书之后,这位早已不再是外交部长的党国“铁老”,又应麦克阿瑟的私人邀请,悄悄到东京访问。麦克阿瑟向吴铁城提出,美国政府已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但对李宗仁仍寄予希望。

借财政税收等问题,吴铁城向受到蒋介石支持的阎锡山内阁猛烈开火。

吴铁城尽管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提出批评,但对蒋介石仍是忠心耿耿。一位朋友问他:“那你今后作何打算?”

吴铁城凄惨地苦笑说:“到不得已时,恐怕只有到台湾去再说了!”

1949年底,吴铁城到了台湾。次年3月,蒋介石复任“总统”职,吴铁城被任命为“总统府资政”,继续辅佐蒋介石,苦心经营台湾孤岛。

1953年11月,“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为收容顾孟余、张君勱等人到台湾诸问题,与蒋介石父子产生了矛盾,蒋介石下令将王世杰免职查办。吴铁城与王世杰关系密切,闻听此事,立即特地跑进“总统府”替王世杰求情。并与蒋“总统”正面顶撞。本来,从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蒋就对吴铁城支持李宗仁的做法大为不满,现在又来顶撞更是怒火中烧,将吴铁城骂了个狗血喷头。吴铁城也不是那种随便服输的人,他毫不示弱,据理力争。

蒋介石气急败坏地摔碎一个茶杯,把“总统府资政”赶出了总统府大门。

吴铁城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大辱”?感情一激动,夜不能寐。他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病,平日每晚只吃一粒安眠药即可入睡。但因对蒋介石一腔怨气,却连吃两片仍睡不着。

1953年11月18日夜,吴铁城服了三粒安眠药,方才入睡。次日早晨,家人发现这位党国“铁老”真的长眠不起了。

(责任编辑 庄建平)

佟麟阁—— 抗日名将殉国第一人

● 熊先煜

佟麟阁，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农民家庭。他16岁时，入伍于冯玉祥麾下，每逢作战，佟必身先士卒，每役战绩卓著，冯玉祥奇其才，累加超擢，从士兵晋升至将军，是冯生前最赏识的将领。

日军大举入侵中国时，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宣言的感召下，决心走武装抗日的道路。当时察哈尔省是抗日前线，他的旧部佟麟阁等均在那里。他于1932年10月由山东泰山到张家口，从事抗日大业。

1933年5月23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向路透社记者发出狂妄叫嚣：“为保卫满洲国西境安全，日军有进驻张家口之必要。”经张家口各界代表集议：察省形势，益行危急，奋起抗日，刻不容缓。于是立即召开了察哈尔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大会决议：组织察哈尔省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领导对日作战，保卫察省，收复失地。26日，冯玉祥发出通电，号召志同道合将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同日，佟麟阁、高树勋等14名将领在张家口联名通电，响应冯玉祥的号召，参加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任命佟麟阁为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并代理察省主席。

冯玉祥、佟麟阁一经举起抗日同盟军的旗帜，一时从平津大学生到全国爱国志士，奔赴张家口投效者，络绎不绝。原西北军将领吉鸿昌、方振武等亦先后率部来归，从东北、热河撤退到察省的邓文、李忠义、刘震东等部，蒙古自卫军及察省自卫军，也加入抗日同盟军，接受冯玉祥的指

挥，总计参加抗日同盟军的军队和民众武装共达八万余人。

佟麟阁与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北路前敌总司令方振武等密切配合，并派出第一军第二师受吉鸿昌指挥出兵张北，猛烈攻击敌伪军，先后收复康保、宝昌、沽源，7月12日克复多伦，共击毙日军茂木骑兵第四团及伪军李华岑等日伪军千余人。抗日同盟军军威大振。佟麟阁在此期间治军理政，运筹帷幄，筹备军需，安定后方，出版《国民新报》，宣传抗日主张，组织民众武装，殚精竭虑，甚获察省军民的爱戴。

抗日同盟军的崛起和挺立，形成对日寇推行“华北特殊化”之严重障碍。5月31日，宋哲元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合法化，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20余县划为不设防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冯玉祥迫不得已，乃于8月5日发出通电下野，把收复国土的任务交诸国人。他于8月14日离开张家口前一晚，召集抗日将领佟麟阁等20余人话别，当时冯玉祥刺破指头，用鲜血在东北四省地图上写下“还我河山”四字，作为誓言。

抗日同盟军撤销后，华北失去屏障，日寇对平津的侵略，有增无已，迫使何应钦与梅津商订所谓“何梅协定”，使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所有中央军队撤离北平。当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调任北平市长后，宋哲元再三敦请佟麟阁负责军事。二十九军的师长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张自忠等亦联袂相邀。此时平津大学生和人民群众“不愿作亡国奴”、“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的

呼声,振奋人心。佟麟阁感到抗日救国之日到来,于是欣然出山,担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兼任军事训练团团团长及大学生军训班主任,常住南苑二十九军军部,主持全军事务,整军经武,夙夜匪懈。

佟麟阁在南苑多次召集二十九军的军官及军事训练团的学员、大学生军训班的学生讲话。他说:二十九军是坚定抗日的队伍,当日寇欲侵占华北之际,我们守土有责,义无反顾。

在“七·七事变”以前,北平外围的形势是:北宁铁路沿线,从山海关到丰台,为日军占领;北平北面的热河,有日、伪军集结,在西北面有李守信、王英等伪军,危机四伏。仅有北平西南尚为我二十九军的部队担任北平西南的防守。1937年7月6日,日军驻丰台的一个中队,全副武装,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我宛平三十七师驻军不许,相持达十余小时。二十九军当即作了应战准备,严阵以待。至晚,敌始退去。7日夜,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11时左右,藉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内搜寻,我宛平守军严词拒绝。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松井又于夜12时以电话通知我冀察当局(其时由北平市长秦德纯负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寻找所谓失踪士兵,被秦德纯拒绝。未几,松井又威胁将派武装部队进入宛平搜索。接着日军一个中队突然向我卢沟桥守军发起攻击。我三十七师一一〇旅二十九团(团长吉星文)第三营(营长金振中)在师长冯治安、旅长何基沣的直接指挥下,遂奋起抵抗。卢沟桥的枪声,响彻了大地,全民族的八年神圣抗战,从此开始。

卢沟桥事变发生,佟麟阁立即与师长冯治安、赵登禹、张自忠、刘汝明等紧急磋商,部署军事。

佟麟阁以军部名义向全军官兵发出命令: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

7月7日卢沟桥激战,8日上午10时稍停。11至12时,日军两次向卢沟桥发炮一百八十余发,卢沟桥车站附近被敌占领。同时敌人又由永定河东岸向西岸进攻,企图强夺卢沟桥。桥西金振中营守军一排,顽强战斗,全排壮烈牺牲。守宛平城西门城楼的连长见之,怒火满腔,不待命令,即派兵一排,手持大刀,飞速驰援,一遇日军,举

刀就劈,杀得日寇鬼哭狼嚎,血肉横飞。19岁的士兵陈永德,就接连砍死13个鬼子。有个鬼子,魂飞魄散,全身颤抖,抱着脑袋跪地求饶。他怒目圆睁,大吼“要为弟兄们报仇。”话落刀劈,鬼子一命呜呼。

在保卫卢沟桥的战斗中,金振中营官兵立下“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誓言,发挥大刀的威力,与日军拚杀。在迴龙庙(即大王庙)战斗中,三失三得,击毙日军大队长一木清,金营长负重伤。

11日,日军二百多名,进攻大王庙,被宋部大刀队迎头痛击,血肉相搏。此队日军被斩断头颅者三分之一,人心大快。

日军新开到之援军,拟沿铁路桥攻过永定河。我军埋伏的大刀队突起,挥刀大杀,日军伤亡无数。两军肉搏,历二小时之久。

日军步步紧逼,宋哲元令南苑二十九军军部迁入北平,并令赵登禹为南苑地区指挥官。佟麟阁在这生死存亡关头,不愿随军部离开,决心与官兵一同死守南苑。28日,日军陆空军进攻南苑。当时南苑守军有二十九军卫队旅、骑兵第九师留守的一部、军事训练团、平津大学生军训班等官兵五千余人。佟麟阁与赵登禹共誓拼死坚守。佟麟阁说:“既然敌人找上门来,就要和它死拚,这是军人天职,没有什么可说的。”遂指挥以上部队与敌鏖战,一部在外围与敌交战,一部在内固守,誓与国土共存亡。日寇陆空联合进攻,排炮轰击,飞机狂炸,战斗激烈。我军虽枪械较敌为劣,但士气却旺于敌千百倍。由拂晓至过午,双方伤亡惨重,然敌终未挫我一步。忽报大红门又发现敌人,佟麟阁恐其截断北路,乃分兵亲往堵击。因寡不敌众,被敌四面包围,佟率部利用高地,继续与敌苦战。佟在指挥右翼部队向敌突击时,被敌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他稍退裹伤,他执意不肯,益奋勇当先。官兵感泣,愿与之共生死,拚命冲杀,佟将军在继续指挥战斗中,不幸头部又受重创,壮烈殉国,时年四十有五。

佟麟阁将军是我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为国捐躯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佟麟阁遗体,由中国红十字会、冀察政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秘书欧秋夫率警卒十余人,驾驶红十字救护车于7月29日在大红门寻获。佟将军

全身浴血，两目模糊难辨，一行睹状，肃然起敬，遂收忠骸运回北平城内。佟夫人及其子女含悲收殓，隐姓埋名，寄厝于雍和宫附近柏林寺。老方丈仰慕将军为国献身精神，保守寄枢秘密，直到抗战胜利。

7月28日，在大红门继佟麟阁将军殉国而牺牲的有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将军。

佟、赵两将军系冯玉祥将军二十多年的袍泽。冯将军对于佟、赵为国捐躯，不胜惋惜，1937年8月1日在南京作《吊佟赵》诗一首，以志哀悼：

佟是二十六年的同志，赵是二十三年的弟兄。我们艰苦共尝，我们患难相从。

论学问：佟入高教团，用过一年功；赵入教导团，八个月后即回营。

论体格：同样强壮，但赵比佟更伟雄。佟善练兵心极细，赵长杀敌夜袭营。

佟极俭朴，而信教甚诚；赵极孝义，而尤能笃行。

二人是一样的忠，二人是一样的勇，如今同为抗敌阵亡，使我何等悲伤！

但我替他二位想想，又觉得庆幸非常，食人民的脂膏，受国家的培养，必须这样死，方是最好下场。后死者奋力抵抗，都奉你们为榜样。

我们全民族已在怒吼，不怕敌焰如何猖狂。

最后胜利必在我方！最后胜利必在我方！

你们二位在前面等我，我要不久把你们赶上。

吴玉章同志在法国巴黎主编的《救国时报》，于同年8月5日15期上发表社论《悼赵登禹佟麟阁诸烈士》，文中写道：

两将军为国捐躯的忠勇的气节，足以打破怯懦退缩、贪生怕死的心理，更能激发我无数健儿杀敌致果的决心。这种精忠报国、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实在是我国军人的最优秀的代表。

毛泽东在1938年3月12日延安举行纪念孙总理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中，称赞佟麟阁、赵登禹等人“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1943年1月1日，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举行表忠盛典，宣布抗日殉国将领佟麟阁、赵登禹等应一体入祀首都忠烈祠，并同时入祀全国各省



佟麟阁

市忠烈祠，以资衿式而励来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伟大的八年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北平市各界追溯八年抗战的首战功勋，佟、赵两将军之死重于泰山。为了纪念两将军保卫祖国、为国献身的历史功绩，于1946年4月5日(清明节)在北平八宝山忠烈祠隆重举行入祀大典，供奉佟、赵两将军神位，并将北平西城的南沟沿和北沟沿命名为“佟麟阁路”及“赵登禹路”。通州亦因佟麟阁曾在该县指挥抗日，乃命名一条街为“佟麟阁街”，以为纪念。

1946年7月28日佟麟阁上将忠骸国葬于北平西郊风景区香山南约一公里的兰涧沟山上他的故居后面。墓地松柏成林，面对百花山，环境十分幽静。是日移灵，由长官部同警察局及军乐队领路，送殡执孝者有长官孙连仲，佟上将家属、亲友、旧部及各界代表等。灵车由柏林寺出发，经北新桥、东四、东单、东西长安街、西单、西四、新街口，出西直门至香山安葬。沿途扎有素坊，居民和单位设案焚香献仪吊祭，万民肃立哀送。

(熊先煜，佟将军之三女婿，重庆市文史馆馆员、重庆市政协第八届委员、民革成员、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已故) (责任编辑 刘家驹)

孙中山挚友陈友仁

● 钱玉莉

多年来被历史遗忘的名人、孙中山的挚友陈友仁，祖籍广东顺德，1878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南部的圣费尔南多镇，从小接受英国教育。1912年初，他为响应辛亥革命，回国效力，先后当过交通部的法律顾问和英文《北京每日新闻》的编辑，随后创办了英文《京报》后，因抨击北洋军阀而被迫停刊。他随即离京南下追随孙中山，从此伴随孙中山左右。他不但参与了孙中山许多重要的决策和活动，还常常担当孙中山的代言人。孙中山逝世后，陈友仁执著地坚持“三大政策”，成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

巴黎和会的顾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孙中山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非常重视，认为应该充分利用战胜国的有利条件，取消原来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他对北京政府派遣的代表团不放心，因此他让陈友仁作为“欧洲和平会议专门委员”，以南方代表顾问的名义，去监视中国代表团。

1919年2月，陈友仁身负重任，到达巴黎。他既要时刻关注会议的进展情况，掌握北方代表的态度，又要不失时机地为代表团献计献策，以贯彻孙中山对会议的既定方针。他在和会期间做了很多工作，“不但代表南方发表了许多公开声明，举行过记者招待会”，而且还为中国代表团起草了向和会提交的正式文件初稿，充分体现了国民党在外交事务中的作用。

但是，巴黎和会的现实却令陈友仁十分气

愤，会议全为美、英、法、日等国所控制，与会各国的地位极不平等。在中国的山东问题上，英、法两国因早已与日本有默契，就明确地站在日本一边，美国的态度开始似乎还较公允，但当日本以退出和会相要挟时，美国也一反常态，倒向日本一边，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避免和会的破裂。面对如此窘境，陈友仁敏感到孙中山所期待的会议结果将成为泡影，为此提议立即退出和会，向列强进行示威。

当时在代表团内部，围绕着是否在对德和约上签字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有的代表瞻前顾后，始终举棋不定，顾维钧、陈友仁等人则是坚定的拒签派，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签字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的政治安定。5月9日国耻日这天，陈友仁在“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的会议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对于中日间利害关系，言之极为详尽，措词亦相当激烈”，他的发言论据充分，分析透彻，几次被掌声所打断。6月28日，中国代表团终于“共同决定，不往签字”，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第一次冲破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在国际事务中决定自己命运的范例。

巴黎和会结束后，陈友仁就山东悬案向美国上议院发了一份长电，既诚挚地希望美国能助中国一臂之力，尽快修正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又委婉地批评威尔逊总统违背自己的诺言，视中国陷于窘境而无动于衷。整份电报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要求实现领土完整的强烈愿望。陈友仁的电报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评价，孙中山也非常满意。

变卖家产受命办报

1920年夏天,孙中山为了加强舆论宣传,决定在上海创办一份英文报纸,以使外国友人了解国民党的革命主张,并尽可能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援助。陈友仁曾在北京成功地办过英文《京报》,因此这个担子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不久,由陈友仁主编的英文《上海时报》在上海问世。陈友仁全身心地投入,每天亲自为该报写一篇评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揭露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其独到的见解,精辟的语言,使他获得了“用英文写作的辛辣作家”的桂冠。

但是,正当陈友仁为英文《上海时报》的成功高兴之时,报社的资金告急!这时,他决定回英国变卖全部家产。当陈友仁风尘仆仆回到英国,把这个决定告诉妻子阿加莎时,她一下子呆住了。九年来丈夫一直在中国效力,她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如今他又提出变卖家产,不知这个家在丈夫心中还有没有位置,她不禁感到一阵伤感。她理解丈夫的选择,支持丈夫的事业,她明白丈夫一定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出这个决定的,因此她不但同意了丈夫的决定,而且还亲自前往特立尼达处理这件事。阿加莎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才智,把特立尼达的家产卖了个好价钱,超过了陈友仁原来的估算,这使陈友仁十分惊喜,这样他不但解决了《上海时报》的资金问题,而且还资助了孙中山一笔钱。

为孙中山“联俄”尽力奔波

1922年6月,当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就合作事宜进行会谈之际,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避难永丰舰,陈友仁则隐蔽在东山,收集叛军的有关情报,夜里再悄悄地来到军舰上,向孙中山汇报当天的情况,并商量对策。据达林回忆,当时隐蔽在东山的陈友仁,每天夜里潜到军舰上去找孙中山。当达林离开广州前夕,陈友仁向他转告了孙中山的话:“我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接着,陈

友仁又郑重地交给达林一封信,这是孙中山写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信是匆忙写就的,“用的是一张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的四裁的纸”。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齐契林:谨以此短筒答复您托达林转交给我的信。我正经受着陈炯明——一个完全受恩于我的人——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危机。达林将会转告您,在某种情况下我打算怎样做。向您和列宁致敬!

孙逸仙谨启

1923年1月18日傍晚,苏俄特使越飞偕同秘书和翻译,登门拜访孙中山,陈友仁作为孙中山的助手,也参加了会见,并就双方谈判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进一步磋商。在孙中山与越飞举行会谈的这段时间,陈友仁还多次代表孙中山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阐述孙越会谈的目的及内容,预示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将日趋密切,以期引起列强尤其是英美对孙中山的重视。美国《纽约时报》载陈友仁谈话:“如果列强继续同孙中山和苏俄为敌,将会导致中俄联盟的建立。”

《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陈友仁又公开发



陈友仁

表谈话,指出:孙越谈话中所含政策之最后结果如何,将视列强对俄国及对中山之态度为转移。

1925年3月,在孙中山病危之际,陈友仁代其起草了著名的《致苏俄遗书》,再一次重申“联俄”方针。据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英文秘书陈友仁,起草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由宋子文读了一遍,孙中山听过后,亲笔用英文签字。“遗书”中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羈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孙中山的发言人

随着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公开化,国内各报纷纷载文评述,认为孙中山将在广州建立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政府。香港《士箴西报》记者为此特地采访孙中山,陈友仁代表孙中山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具体阐述了孙中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问)孙逸仙博士现在有无或曾否与苏维埃政府直接或间接往来?

(答)盖以历史上的原因及地理上的实况,中俄两国不得不互相往来,看其为友邦或为敌国耳。俄皇时代是为敌国;今苏俄时代则可以为好友。孙逸仙博士之对俄政策,大概基此理由。然对于苏俄政府,英国政府现在亦与有直接的及公事的往来矣。

(问)现在有无苏俄代表驻在广州,如其有之,其任务目的如何?

(答)苏俄有代表驻广州,(他现已北上)。据他自己在报纸上发表其任务目的,系与苏俄驻伦敦之商务委员团相似。

(问)孙逸仙博士自接见苏俄代表后,曾否决定(1)设立新陆军学校一所,(2)宣布某种产业及土地为国有(如有其事,请指明何种)?

(答)孙博士现设立陆军学校一所,其用意系使陆军官佐得受正当的新式训练,倘孙博士对于兵额贵精不贵多的政策为是,则此种训练,系属必要之事,亦无烦苏俄代表之协助也。至孙博士对于公用事业国有的主张,已详见所著建国方略一书,(该英文本在英美两国刊行)。自接见苏俄代表后,亦无重要之改变也。

(问)孙逸仙博士是否拟在广州或广东省内别的区域,实行试验苏维埃的政府及或是“红色”军的组织?

(答)对此问题,完全否认。孙逸仙博士对于社会问题,从人类福祉上着想,以为依据社会主义组织的政府,可减轻人生的穷苦与罪恶,而且令人的生活合乎人道,日趋于上,然此只以社会服务者的资格立言。若以政府领袖的资格立言,彼则未尝拟于广州或广东省内之任何区域,以实施社会主义为其政策上之最急目的也。香港之敌党报纸,曾登载各种新闻,谓广州于4月1日实行共产,其日期颇堪寻味(西洋习俗以4月1日为愚人节,朋友中于此日各以游戏手段互相愚弄为戏)。此无稽谰言,实不值一哂也。

这篇《士箴西报》记者的访谈录,很快被国内各大报所转载,陈友仁一席坦诚的谈话,以事实驳斥了那些心怀叵测的诬蔑,维护了新生的国共合作的政府形象。

7月中旬,广州沙面租界的英、法工部局,制定了侮辱中国工人的十二条“新警律”,沙面的洋务联合工会、茶居工会等在共产党的指导下,

于15日实行沙面工人总罢工。这个行动使英国殖民者措手不及，不得不急调海军陆战队登岸，同时又急电香港速调舰队来沙面，用水兵顶替辞职工人的岗位。但这并非长久之计，英领事只得即刻致函孙中山请求出面调解，孙中山则把任务交给了陈友仁。

下午4时，陈友仁前往沙面与英领事交涉。他严正指出：工人们并不是反对加强治安，而是这次颁布的新警律只苛待华人，而居留沙面的外国人则可例外，此种不平等待遇，华人方面绝不能接受。

英领事本来期望国民政府能出面调停，敦促工人早日复工，想不到政府代表陈友仁竟站在工人一边，代表工人向他们抗议，只得表示明天就开会商议取消办法。陈友仁的态度体现了国民政府“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并最终迫使工部局取消苛例。

继承孙中山遗志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陈友仁全程陪同。岂料孙中山因积劳成疾，竟在天津一病不起，不久即在北京与世长辞。如果说孙中山在世时，陈友仁对他倾力辅佐已颇为感人的话，那么当孙中山逝世后，他仍对其开创的事业忠贞不渝，则更让人肃然起敬。

孙中山逝世后，原先潜在的分歧进一步激化和公开化，反苏的行动也步步升级。首先，由陈友仁起草、孙中山临终前亲笔签字的《致苏俄遗书》，因遭到国民党内一些人的阻挠，未能与另两份遗嘱同时见报。其次，孙中山聘请的顾问鲍罗廷，于1927年6月被武汉国民党中央解除了合同。最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竟然密谋杀害鲍罗廷。7月中旬，陈友仁收到了孔祥熙让他转交宋子文的一份密电，“请告出售人，商人同意按索价付款。盼如期发货。”他明白这“商人”是指蒋介石，被“出售的商品”就是鲍罗廷。事情十万火急，陈友仁决定让大儿子丕士担当“警卫”，尽快把鲍罗廷护送回国。正如陈友仁所料，汪精卫一面在武汉车站隆重送别鲍罗廷，一面密电冯玉祥暗杀鲍罗廷。据冯玉祥回忆：“我到郑州的时

候，接到汪精卫从庐山来的电报，通知我，鲍罗廷即将由汉口经过郑州回俄，请我把他扣留并杀之。我心里想的说，你要杀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汉下手？他显然学的曹操的做法，想杀祢衡，自己却不下手，把祢衡送给刘表，刘表又借手于黄祖而杀之。可是我决不是黄祖。”幸好冯玉祥没理会汪精卫的电报，鲍罗廷才逃过一劫。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公开反共，陈友仁却不改初衷，继续坚持“联共”政策。1927年7月14日，陈友仁在汪精卫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明确表示他和宋庆龄都反对“分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订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后来，陈公博也在其回忆录中证实：“重要中央委员中有三个人不赞成分共，第一个是孙夫人，第二个是陈友仁，第三个是廖夫人……虽然三个人不赞成，而大多数通过了。”但是，当时右派的势力占了上风，陈友仁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孙中山亲自建立的国共合作走向分裂。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陈友仁再次建议“联共”，并派大儿子丕士回国拜见国民党重要人物，恳请他们说服蒋介石，尽快建立新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多年后，邓颖超在接见陈丕士时，特就此事对陈友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扶助农工”是三大政策的基础，陈友仁对这个政策的解释很明智：“中国无论是在社会结构还是在思想上，都还处于中世纪。但这古老的结构已不稳固了，它行将崩溃。问题是要找新的社会力量来支持建立新的社会结构，以使生活重新稳定下来。这些社会力量首先应是农民和工人。满足了这两个阶级的需要，社会基础才稳固。”他认为工农群众不仅是国民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而且是对外交涉的强大后盾。他在担任广州政府外交部长期间，提出了“革命外交”的口号，认为不需要特别顾及过去的条约、协定与既成的事实，而应采取强硬的举措，借助民众运动的力量，以达成中国外交谈判的目的。1927年初，由陈友仁主持的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谈判，就是政府外交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责任编辑 刘家驹）

袁殊谍海风雨 16 年

● 尹 骐

在中国现代情报特工史上,袁殊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由于他的情报特工经历曲折,扑朔迷离,又不易被人理解,长期以来极少有比较客观全面介绍他的文字见诸报刊。

从贫困的学徒工到激进的左翼文化人

1911年,袁殊出生于湖北蕲春一个衰落的书香门第。由于家庭经济困窘,袁殊幼年即随母亲到上海谋生,12岁时便被送进一家印刷厂做学徒工。

少年袁殊虽然贫困,但后来终于有机会免费进入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读书。他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成为学校里一个活跃分子。

1927年初,北伐军推进到长江下游时,年仅16岁的袁殊便离开学校参加了北伐军。一年之内,他从少尉宣传股员升任中尉宣传科员,还当了一段时间连队的指导员。

1928年初,袁殊脱离军队返回上海,不久就参加了“狂飙社”,开始了在文艺界的活动。

1929年秋,袁殊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一所新闻学校攻读新闻学,同时又广泛涉猎政治和历史知识领域,还阅读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马列著作,初步接受了马列学说洗礼。

1930年冬,袁殊回国,曾一度参加洪深领导的“联合剧社”活动。1931年初,他创办了一份周报《文艺新闻》。这张小报推出不久,便以其独

到的新闻眼光和大胆泼辣的风格而引人注目,发行量迅速上升。正是这张报纸的显著成绩,把袁殊引入了左翼文化人的圈内。中共地下党和左联负责人对他这张小报给予了极大支持,不仅积极为它供稿,而且派党员作家夏衍、楼适夷具体参与他的工作。连鲁迅、茅盾等文坛巨匠也不断在该报推出佳作,使这张小报风靡一时。袁殊本人也被吸收参加左翼组织,并担任了“文总”的通讯联络工作。稍后,他又参加了反帝抗日联盟、中国著作者协会,参与发起新闻学研究会等,成了左翼文化界的一位活跃人物。

参加中共情报工作,又受命打入CC组织和受雇于日本情报机构,做所谓“白皮红心萝卜”

对革命产生极大热情的袁殊,主动向冯雪峰、夏衍表示了加入中共的愿望。1931年10月的一天,中共地下党的一位重要人物潘汉年正式约见袁殊谈话,潘代表组织不仅同意袁殊加入中共,同时要求袁殊参加中共情报工作。潘汉年当时正担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他和袁殊谈话时,还带来了一位叫王子春的助手。潘汉年告知袁殊:今后袁的工作将由王子春负责领导并实行单线联系。随后潘、王要求袁殊严守组织秘密,尽量给自己涂上灰色小市民的色彩,要寻找机会打入到敌人内部去收集情报,做一个“白皮红心萝卜”式的情报人员。

在王子春的具体指导下,袁殊很快就熟悉了

情报工作的“游戏”规则。从1931年冬到1935年春这三年多时间里，袁殊在情报战线上四处活动，左右逢源，干得颇为顺利，他通过有力的社会关系打入了CC派头目吴醒亚的情报特工系统。吴醒亚当时正担任上海市社会局长。社会局的工作表面上是要调节缓解社会矛盾，实质上则是以破坏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为主要任务。袁殊被吴醒亚安排为编外特别情报员，专事收集社会情报。吴醒亚是湖北黄梅人，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事业，建立自己的骨干队伍，他拉拢一批湖北籍的人物组成了一个“湖北帮”，利用政治与同乡的双重关系为其效力。与此同时，他又伙同潘公展、吴开先组织秘密小团体“力社”和“干社”。“干社”在当时几乎与另一个著名的反共组织“复兴社”齐名，势力和影响都不小。袁殊被吴醒亚拉入了“湖北帮”和“干社”组织，并担任了“干社”的情报股长。

左联的《文艺新闻》，左倾色彩很浓，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是和袁殊已经秘密打入吴醒亚系统大有关系。中共情报机关需要袁殊去扮演“白皮红心萝卜”的角色，吴醒亚情报特工系统也要袁殊多一层左倾“红皮”的保护色。

根据王子春的授意，袁殊又从吴醒亚那里争取到了一个职业记者的身份。经吴介绍，进入了由著名报人严谔声主持的“新声通讯社”。袁殊利用这“无冕之王”，出入各种社交场合，不久就因经常出席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新闻发布会而认识领事馆官员岩井英一。岩井实际上是日本外务省的情报人员，被认为是“中国通”，是专门负责在中国搜集情报的。袁殊有意去接近岩井，岩井也正需要在中国人中寻找情报关系。袁殊有留日的经历，能说流利的日语，因而很快就被岩井看中。于是两个人各有所需，一拍即合，不久就正式建立了情报关系。袁殊答应将通讯社若干不便发布的新闻材料提供给岩井，岩井则答应把领事馆将要发布的新闻信息提前告知袁殊，以帮助袁殊“抢新闻”。经过一段时间的配合，岩井表示满意，随即向袁殊每月提供200元所谓交际活动费，于是袁殊就成了日本领事馆雇用的一名情报员。

这样，袁殊在30年代初的上海情报战线上，作为一名中共情报干部的同时，便又具有国民党

CC特工组织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情报人员三重身份或三边关系。当然，当时他的立足点是在中共。

在此期间，袁殊和著名青帮头目杭石武结为所谓的异姓兄弟，又和帮会首领杜月笙等有密切往来。

第一次被捕，政治思想弱点暴露，“转向”后的彷徨

在1931年底到1935年初这三年多时间里，袁殊的情报活动十分顺利，也相当成功。但他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在党性锻炼和思想修养方面显然没有达到党的严格要求。因此，当环境突然发生变化，面临着严峻考验时，他在政治思想和个人性格方面的弱点便有所暴露了。

1935年初，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受到了严重破坏。中央特科负责和袁殊联系的王子春在约定的时间内两次未能和袁殊见面，性格有些浮躁的袁殊就沉不住气，立即通过熟人找到了远东情报局的关系，随后就加入了情报局的工作。当中共地下组织另派刘长胜代替王子春来和袁殊联系时，发现情况已有变化只好作罢。不久，发生了所谓“怪西人”案件。“怪西人”实际上就是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他被捕后因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新闻界便以“怪西人”称之。他的被捕是由助手陆海防的被捕叛变造成的。随后，袁殊也被牵连被捕。由于已经有陆海防的旁证，袁殊便承认了自己曾为中共情报系统和远东情报局工作。当时直接经办“怪西人”案件的是戴笠系统的王新衡。王和袁殊本就很熟，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那时袁是以吴醒亚系统的人和王交往的。当袁殊被捕已暴露了中共的政治背景后，王新衡便竭力对袁进行拉拢。吴醒亚获悉袁殊被捕并已暴露真实身份后，也对袁采取拉拢的态度。显然，戴笠和吴醒亚都把袁殊看作是可以利用的人才，都想把袁殊收罗到自己的门下。因此，袁殊被捕后不仅没有受到皮肉之苦，相反却是处处受到“关照”。正是在这样的人生历史转折关头，袁殊的政治品格和思想情操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在敌人面前，袁殊没有自首叛变，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也没有大义凛然，坚决拒绝敌人的

任何要求。他的被捕并没有引起组织的被连锁破坏。袁殊在敌人面前所采取的是一种表面上灵活、变通、圆滑、尽量保护自己，实质上则是某种退让、妥协的态度。

袁殊在被审讯时，王新衡追问他，和他经常在一起的女人是谁时，他无法回避，就把王莹供出了。袁殊自认为王莹只是一个演员，他们之间也只是交往密切的朋友关系，说出王莹的名字也不会给王莹造成什么伤害。但王新衡对这一线索却很重视，立即要求袁殊约见王莹，袁殊也就照办，给王莹打电话约她见面。结果是王莹一到就被逮捕。其实王莹已经是中共的地下活动分子。王新衡对她也早已怀疑。袁殊的交代正为军统提供了一个逮捕她的借口，而袁殊竟成了帮助军统诱捕王莹的工具。王莹被捕曾引起不少地下党员的紧张，夏衍就赶紧转移隐蔽起来。幸而王莹应付得体，又没有找到充足的证据，军统才不得不将这位著名演员释放。

军统为了拉拢和劝降袁殊，特派武汉行营法官徐业道到上海对袁殊“做思想工作”。戴笠要徐业道向袁殊转达他的话说：“你的事我都知道，等风波平息后，你可以加入到我们团体里来。你还年轻，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就此完结，要么参加蒋委员长领导的抗日工作。”当徐业道要袁殊对戴的话明确表态时，袁殊用书面形式写了大意如下的话：我不认识“怪西人”，过去也不认识陆海防。但从事过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现在中日两国的问题是抗日问题。希望蒋先生领导全国人民抗日。袁殊自以为这样表态并无大的问题，但事实上他是基本按照戴笠的要求办了。从立场上说，袁殊从坚决反蒋到“拥蒋”，这是在政治上的“转向”。

不久，袁殊被押到武汉，由武汉行营法庭开庭审判。负责审判工作的正是徐业道。审判的结果是从轻发落：袁殊被判监禁一年零三个月。袁殊明明是被军统秘密逮捕的，判决时却被说成是“投案自首”，徐业道是有用心的。

袁殊被宣判后，被送往湖北省第一监狱去服刑。两天之后他就被转送到湖北省反省院。该反省院的院长又恰恰是吴醒亚系统的一员大将，和袁殊也有些交情的黄宝石。因此，袁在反省院受到了特殊优待。袁殊可以读书，看报，打球，可以

写作，还可以请假外出办事。不过这样的优待是有附带条件的，袁殊答应为反省院当局办一本名为《诚化》的刊物，帮助当局实施“感化”犯人的政策。

1936年5月，袁殊实际“服刑”时间不足一年就被从反省院放出。离开反省院时，黄宝石要他到南京去见一见陈立夫。但袁殊知道，如果被释放就去见陈，就意味着首先投奔CC，也就意味着完全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共产党。他知道，戴笠和王新衡也不会放弃要他去加入军统的希望。然而袁殊不想改变当初参加革命参加党的初衷，因此，他被释放后首先想做的事就是希望尽快找到党，希望能够继续为党工作。

袁殊回到上海，党内同志自然要对他保持警惕。他只好去找虽不是党员但同党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的孙师毅。不料孙见到袁殊后劈头一句便问：“你回到上海是帮助特务抓人的呢？还是来看望老朋友的呢？”这使袁殊十分尴尬。他赶忙诚恳解释：“我回上海就是要向老朋友请示今后行止的。”孙师毅是个大好人，第二天就将袁殊的情况告诉了刚从陕北来上海不久的冯雪峰，雪峰此次来上海的主要使命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虽然已经从孙师毅的介绍中知道了袁殊被捕后的一些不好表现，但出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考虑，他还是答应了和袁殊见面。见面时，袁殊向雪峰汇报了近年来的情况。但雪峰并未明确表示什么或做任何承诺，只是建议袁殊先找一个教书的职业避一避风头再说。在没有对袁殊进一步审查并得出相应结论之前，雪峰也只能这么做。袁殊却深感失望，他立即向雪峰表示：既然如此，他想再去日本学习一回；并自我解嘲说，革命不成，先弄个文学博士回来。雪峰表示这样也好，随后还给袁殊送去50元路费。

袁殊动身之前，又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联系。鉴于袁殊曾是日方的情报人员，释放后又主动找上门来，领事馆极表欢迎，立即为袁办妥一切赴日手续，并送给200元路费；同时让袁到东京后再去找正在外务省供职的岩井英一联系。袁殊到日本后即去找岩井。岩井果然对袁殊给予了特别的关照：不仅为袁介绍学校，介绍一批学界与政界朋友，而且每月向袁提供150元的生活费用。岩井所以如此特别关照袁殊，当然不是所谓

的朋友之谊，而完全是一种政治投资。袁殊自然也是心中有数，但他乐于利用这样的“特别关照”。

1937年4月，袁殊第二次在日本“留学”还不足一年时间便又返回到上海。这时中日关系已十分紧张。岩井对袁殊说过：“日中关系破裂的大局已定。”言下之意是希望在日中关系“破裂”后袁殊能继续和日方合作。但袁殊回到上海后，首先去找冯雪峰，向冯汇报了这近一年时间在日本的情况，希望党对他今后的行止有所指示。鉴于袁殊的情况是如此的特殊而又复杂，雪峰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安排为好。当时地下党的同志一般都认为袁殊早已是“转向”人物，不能轻信，夏衍尤其心存芥蒂。雪峰只得让袁殊先利用旧关系找点事情做起来再说。袁殊只得独自行动，他便去找旧帮会的关系，由杜月笙资助他办一个并不起眼的“时事刊行社”，实际上不过是做了杜月笙门下的一个食客。一贯雄心勃勃，热衷于追逐政治浪潮的袁殊，一时间竟成了一个没有政治立足点的“盲流”，他感到了彷徨。

徘徊在政治夹缝之间——第二次被捕——在汉奸的悬崖上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历史又为袁殊提供了一个新机遇。正当他在政治上彷徨无所归依之际，5年前把他引上革命道路，引上情报战线的领导人潘汉年这时又出现在他的面前，并向他伸出了援手。潘汉年1931年吸收袁殊参加中共情报工作后，虽然并未具体领导袁的工作，但他作为中央特科情报主管，对于袁在最初几年间的工作情况以及他的精明能干特点还是有所了解的。1933年潘汉年离开上海后，一直奔波于江西苏区、长征路上、以及莫斯科、南京、陕北等地。1936年秋后，他再回到上海时已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中共代表，主要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到1937年春夏之交，国共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基本形成。潘汉年担任了中共上海工委主任，抗战爆发后又担任了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其工作范围已不限于统一战线，而是全面负起了指导整个上海党的工作。当袁殊又见到了潘汉年并将他这些年的经历

向潘作了汇报，同时表示希望能够“归队”重新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尽一份力时，潘汉年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从党的战略与策略高度出发，认为在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的新形势下，像袁殊这样和各方面都有特殊联系的人，无疑是一个应予争取并给予恰当运用的人才。既然他要求归队，接受党的领导，就没有理由拒之于门外。潘汉年经过慎重考虑后，排除了夏衍等原先表示不宜用袁殊的意见，决定接受袁殊的要求，先是让他参与一部分统战工作，接着又让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如帮助刊印抗战宣传资料，参加创办《译报》，为《救亡日报》解决部分设备，等等。

事实很快就证明，潘汉年重新启用袁殊的确是富有远见之举。“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已预感上海不保，中统和军统都计划要在敌后开展情报特工活动。特别是军统，更是雄心勃勃准备在敌后大干一场。他们都想到了袁殊这个和日本方面有特殊联系的人物，都想把他拉入自己的系统工作。尤其是军统，戴笠亲自登门拜访袁殊，表示要委以重任。当袁殊将这一情况向潘汉年汇报后，潘汉年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从当前看，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参加军统敌后工作有利于抗日；从长远看，在军统打入一个楔子，以后在情报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潘汉年同意袁殊加入军统工作。随后，袁殊就接受军统的安排，被任命为军统上海站少将情报组长。戴笠指示，上海沦陷后袁殊要留下来坚持地下活动。

不仅是中国国共两方都在争取袁殊为自己工作，而且日本人也在积极争取和利用袁殊为其侵华战争服务。这时，岩井英一又回到上海领事馆，并担任副总领事，其主要任务仍是为外务省收集情报。岩井深知袁殊和中国的情报特工机关的历史渊源，但却并不忌讳。因为他同样熟知情报工作的固有规律：互相渗透，互相利用。基本目标在于得到自己想要的情报，别的就是次要。当时岩井正着手办一个特别训练班，秘密培训一批情报人员。他便邀请袁殊这个“老朋友”参加培训工作和从事情报活动。袁殊也欣然接受了岩井的邀请，并分别向潘汉年和军统方面报告了这一情况。为岩井工作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从中进行反

侦察,以搜集中国方面所需要的情报。潘汉年和军统方面因此也都表示认可。

这样,在1937年秋天抗日战争爆发后,袁殊在上海就又同时和中共、军统、日本人三方面发生联系,同时为三方工作。不过在此后的约两年间,袁殊主要还是在为军统工作。原因之一,是中共还没有很重视他,进而充分运用他的计划。1937年冬天潘汉年撤离上海后,他和袁殊的单线联系就暂告中断,也没有别人再向袁殊提过什么要求。原因之二,是日本方面这时也没有对袁殊提出更多要求。岩井和袁殊之间也主要只是交换一些情报,尚无大的动作。而军统方面则对袁殊抓得很紧。众所周知,上海沦陷后,军统在上海十分活跃,不仅大搞情报,而且组织了一系列的暗杀活动,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头面人物。在这段时间里,袁殊确实为军统干了不少事,而且也真卖力,军统也因此而更看重他。1938年秋天,戴笠在香港召开军统骨干人物座谈会,并对敌后的有功人员进行表彰奖励,袁殊也被召参加了。会议期间戴笠对潜伏敌后有功人员恩威并举,首先是对他们大大奖励一番,并当场送给每人两把最新式的加拿大手枪,接着便又以冷峻的口吻说:你们可以拿这样的武器去杀敌;但是,谁如果对我们的团体不忠,你们也可以拿这个去对付谁。听了戴笠的话,袁殊内心惶然,他知道戴笠这些话不是随便说的,更知道像他这样非黄埔嫡系的人是不会被完全信任的。会议结束前,戴笠还单独接见一次袁殊,亲自向他交待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他回上海后要设法将已经投敌充当汉奸特工头目的李士群除掉。

在香港开会期间,袁殊获悉和他中断联系已有近一年时间的潘汉年正在香港活动。他便设法找到了潘汉年,并将自己这段时间的情况向潘做了汇报。潘汉年这时在香港仍以上层统战工作为主要任务,暂时也还没有要用袁殊的计划。但他很关心袁殊的工作,并且语重心长地对袁说:“你这次来开会说明戴笠待你不错。现在虽说是国共合作,但本质上两党是对立的。一个人的前途是在关键时刻决定的,向右,你可以跟着戴笠干下去,成为他的红人。但我看你成不了他的红人,军统是清一色的黄埔派。这就要看你自己的决定了。”听了潘汉年的这番话,袁殊在思想上

更加惶惑不安,甚至苦闷窘迫:为军统卖力干了许多抗日的事,但并不能得到完全信任;见到潘汉年,原希望中共对自己的行止能有具体的指示,结果却只有一番冷淡的告诫;今后还得要和日本人岩井英一继续交往,但他决不想真心实意为侵略者效力。因此,他现在似乎是在中共、军统和日本人之间的政治夹缝中讨生活了,就像是一种无根的浮萍在激烈的政治旋涡中飘荡着,徘徊着,他依然没有稳固的政治立足点。

回到上海后,袁殊开始考虑如何除掉李士群的计划。这李士群原先也是中共的情报干部,后被捕叛变投靠中统,抗战爆发后又投靠日本人当上了汉奸特务大头目。为了在日本人面前表现自己的能耐,也为了报复军统在敌后的破坏活动,当时李士群正在上海大肆搜捕军统潜伏的人员。双方针锋相对,互相厮杀,一时间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气氛极为紧张。袁殊要完成除掉李士群的任务当然决非易事,李士群一向就戒备森严。经过仔细策划,袁殊终于制定了杀李的计划要点,即组织人力秘密挖掘通往李士群办公室的地道,然后用炸药引爆,致李于死命。袁殊的这个计划很快就得到了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批准。谁知这一计划尚未来得及实施,王天木和另一位军统头目陈恭澍便已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捕获,并且供出了这个计划。袁殊随即也就被捕。李士群和袁殊过去就很熟,而且关系不错。但这次袁殊要直接指挥暗杀李士群,不能不使李士群十分恼怒。在审讯袁殊时,李士群严厉地向袁殊交底说:“要么你就归顺我,和我合作,做我的帮手;要么我就按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指令,将你处以极刑,希望你尽快做出选择。”

一向是“聪明”而又“灵活”的袁殊,既不想归顺李士群,充当汉奸特工大头目的帮手,但也不想和李士群硬碰硬,立即遭致杀身之祸。这时,他的三边政治关系和多重情报人员的角色便可以起作用了。他立即想到用日本人来牵制李士群的办法,于是他便暗中设法将自己被李士群逮捕入狱的消息向岩井英一作了报告。岩井英一果然就以日本领事馆副总领事的身份直接给李士群打电话,要求面见袁殊。李士群虽然归日本军方管辖,听命于“梅机关”的指挥,但对日本领事馆的要求又怎敢拒绝?于是岩井便亲往“特工总

部”会见了袁殊。袁殊只得将参加军统活动受命铲除李士群的情况向岩井一一汇报。岩井一方面批评袁殊不应该参与爆炸、暗杀这一类恐怖活动,另一方面又答应要尽力帮助袁殊脱离目前的险境。不久,岩井终于和日本军方谈妥,以袁殊是外务省情报系统人员为理由,要李士群将袁殊移交外务省情报系统审查。这样,袁殊便离开了特工总部的监狱,而由岩井在百老汇大厦给他安排了一个住处,并派了两个部下“保护”他,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监控。

然而岩井把袁殊从“特工总部”营救出来也不是基于过去“老朋友”的情谊,更主要的是岩井另有自己的谋算。他已经不止是要袁殊继续在情报方面和他合作,而是有一个新的在政治与文化的层面上利用袁殊的计划。袁殊被转移到百老汇大厦不久,岩井就要求袁殊尽快写出一篇论述中日关系的文章来准备公开发表,实际上也就是要袁殊公开表态,从而把袁殊从幕后的情报关系推到汉奸的前台来。

面对岩井这个新要求,袁殊不能不感到一种压力,一时间竟惶然不知所措。虽然他和岩井保持关系是潘汉年两年前同意和支持的,但那毕竟是情报领域内的互相利用以获取情报为目的。如果现在按照岩井的要求公开站出来充当汉奸的角色,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香港时,戴笠对他的不信任和潘汉年对他的告诫,言犹在耳。如果答应岩井要求,就意味着公开“落水”,后果就不堪设想,不仅无法向中共交代,就是军统也不会轻易放过他,甚至会致他于死地。但如果不答应岩井的要求,拒绝按日本人的意图写文章公开表态,后果又将如何呢?他的命运现在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他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袁殊已经站立在汉奸的悬崖上,前进或是后退一步只在一念之间。

公开的文化汉奸和秘密的情报工作者——周旋于两国四方间——最后回归到革命的行列

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袁殊对待岩井的新要求惶然不知所措之际,潘汉年忽然又一次出现在他的面前,并且

带来了中共关于情报工作的新思路和新策略。于是,已经走到了汉奸悬崖边缘的袁殊,再一次从险境中解脱了出来。

潘汉年一年前在香港会见过袁殊不久,就回延安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后就留在延安工作。这时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抗日战争的全面领导,加强敌后工作,决定成立中央社会部,负责党的安全保卫和情报调查工作。中共要独立自主担负起领导抗战的历史重任,加强情报调查工作已是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知彼”的任务,便是要组织一支专业的训练有素的情报干部队伍从事情报活动,努力掌握国内外的各方面情报,尤其是日本侵略者、蒋介石政府和汪精卫汉奸势力这几方面的情报,使中共中枢机关随时心中有数并制定相应对策。康生被任命为中社部部长,鉴于情报工作是新建中社部的工作重点,康生就要求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老搭档、在情报方面已有相当实践经验的潘汉年来协助他分管情报工作。

鉴于当时的形势,中社部领导多次研究,认为必须以更大的魄力从敌伪上层寻找突破口,以开辟新的情报渠道。这所谓更大的魄力,就是要更加大胆灵活地运用新的策略手段,争取一切可资利用的情报力量。根据这一思路,当时已经公开投敌成了汉奸特务大头目的李士群和过去一直同敌方有联系但近况不甚清楚的袁殊,都被列入了可以争取的对象。李士群可以分化策反,袁殊本来就和中共有联系更可以充分利用。为了落实加强敌后一线工作的领导,潘汉年受命再度奔赴香港,负起了加强敌后情报工作领导的重任。不久,中央正式任命潘汉年为中社部副部长,并责成他在香港组建华南情报局,把敌后情报工作统一领导开展起来。为了完成中央所赋予的使命,潘汉年在把香港的情报据点初步建立起来后,又立即把目光投入了敌后最大和最重要的情报战场上海。因为那里不仅有英美法等西方各国的租界及其情报人员活动,更有日本、汪伪和国民党政府的各特工情报机构的互相角逐。虽然中共在那里也一直部署有一定的情报力量,但还是比较弱,活动范围也有一定局限,因而能够收集到的情报特别是有价值的战略情报并不多。为此,潘汉年决定亲自到上海去开展活动,努力把

自己的触角伸向敌伪的上层,在更高的层次与范围内猎取中央所需要的情报。根据在延安就已经确定的思路,他要直接找到袁殊,争取从他的身上找到突破口,以打开上海情报工作的新局面。

潘汉年到达上海是1939年的8月末9月初,这正是袁殊被岩井英一从特工总部“营救”出来后不久,还在百老汇大厦“休息”之际。岩井要求袁殊进一步和日方合作公开发表文章表态另树汉奸旗帜,袁殊正为此而疑虑重重不知该如何是好。此时此刻,潘汉年来到上海不禁使袁殊十分欣喜,他急切需要潘汉年为他指引出路,走出迷津。潘汉年也正需要通过袁殊以实现自身的工作意图。这无疑是改变了袁殊后来的政治前途与人生命运。经过联系,袁殊很快就和潘汉年在百老汇大厦见面了。

见面后,袁殊首先把自己按军统的部署暗杀李士群未遂反被李逮捕,后又由岩井英一“营救”出来的情况向潘汉年做了汇报,接着又把岩井要求他进一步与日方合作公开写文章的问题相告。潘汉年听了袁殊的汇报后,根据既定的争取运用袁殊的方略冷静地分析说:“既然如此,你就听岩井的安排好了。日本人内部有矛盾搞派系,岩井要把你推出来另搞派系另树汉奸旗帜。如果你能以此为掩护更好地开展抗日情报工作,只要是真正‘身在曹营心在汉’,将来总是会被人理解的。”

得到潘汉年的肯定回答,袁殊就放心地做起了汉奸文章,撰写了一篇题为《兴亚建国论》的文字,无非是中日亲善共建大东亚共荣之类。此文得到岩井以及影佐祯昭的认可,被译成日文在报刊公开发表。稍后,便又按照岩井的意见,建立了一个所谓“兴亚建国运动”的机构,在岩井专门拨给的一幢楼房前挂上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招牌。

岩井利用袁殊另立汉奸派系组织,扩大其在华的势力与影响,并掣肘其他汉奸派系,潘汉年则利用袁殊这新汉奸派系机构做掩护,把自己的人渗透进去,扩大中共的情报阵地。他从香港表示愿意为抗日尽力的原改组派旧人陈孚木弄到上海来担任“兴亚建国运动”的委员长以提高“兴亚”的声望。袁殊则以主任干事名义实际操作“兴亚”活动。“兴亚”先后办起《兴建月刊》

和《新中国报》。潘汉年又把中共党员翁从六和进步记者叶文津从大后方调来参加杂志社和报纸工作,翁从六担任报纸和杂志的经理,实际掌管着一切。

潘汉年的幕后支持使袁殊问心无愧地做起了“文化汉奸”,但袁殊对军统不能不心存疑虑。军统对公开的汉奸曾采取严厉的惩罚暗杀行动,戴笠在香港关于必须对团体忠诚的警告袁殊并未忘记,他很害怕军统会对他这个已经公开“落水”的人进行报复。为了使袁殊消除顾虑,潘汉年通过情报系统动员一位和戴笠交情甚笃的资深人士亲赴重庆,将一封袁殊向戴笠表白的信件送到戴笠手中。袁在信中表示,他将像李陵那样忠于汉室继续为抗日做贡献,请戴笠予以谅解。戴笠鉴于蒋日之间的微妙关系和情报特工任务需要,果然回信对袁殊表示理解并加以安抚。这样,袁殊在上海这个复杂的情报战场上,经过几番搏杀,便又重新建立了同中共、军统、日本人以及汉奸组织的多边关系,而这一切又主要是在潘汉年的导演下形成的。

“兴亚建国运动”热热闹闹起来后,大大提高了袁殊在上海滩的地位。这时岩井用“岩井公馆”名义建立了一个专门从事情报活的机构,让袁殊主持其事。潘汉年便抓住这一机会把中共情报干部刘人寿派遣进去和袁殊一起开展工作。刘人寿在“岩井公馆”里架起了中共自己的秘密电台(后因障碍太多,这个电台未能发挥作用,后被悄悄拆除)。后来,潘汉年又用“胡越明”的化名直接和“岩井公馆”合作在港沪两地开展情报工作,从而使“岩井公馆”这个日本人的情报机构成了中共搜集日方重要情报的重要渠道。

袁殊成了上海滩上一个令人难识其庐山真面目的人物。他周旋在两国四方之间,把从日方搞到的许多重要情报不断向中共方面提供,以完成潘汉年交给的任务;同时也将许多情报向军统通风报信,以证明他对戴笠的承诺并非虚言;他对岩井交给的任务也不敢怠慢,特别是在公开的文化汉奸活动方面,搞得有声有色。他不仅主持出版汉奸报纸刊物,而且率团到日本考察,会见了包括天皇与前首相在内的诸多日本政要。1940年,由于汪伪对袁殊另立“兴亚”派系不满向影佐祯昭提出异议,为了缓和汉奸派系矛盾,在影

佐劝说下,岩井被迫令袁殊解散了“兴亚建国运动”机构。作为妥协条件,汪伪则给袁殊加了不少新的汉奸官衔:汪伪国民党中委、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从而使袁殊不仅在上海而且在整个沦陷区也成了活跃人物。但袁殊并未因此而忘乎所以,他仍旧在中共、军统、岩井英一、汪伪之间所连结的一条钢丝绳索上小心翼翼地走着。他在汉奸职务中遇有重大情况都要向潘汉年汇报。1941年夏天,汪伪按照日本人的意旨要搞大规模的“清乡运动”,袁殊被任命为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在接受这一任务时,袁殊向潘汉年汇报,潘向他提出三条原则指示,要他在履行这一职务时,一是不能做直接危害人民的事,二是要及时提供有关清乡活动的情报,三是对敌伪抓获的中共地方干部要尽力采取保护营救措施。这三条袁殊都基本上照办了。1941年秋后,袁殊又被任命为江苏省教育厅长,后又兼省教育学院院长。在这两个职务中,袁殊也基本上按照上述三条原则行事。1943年,袁殊被任命为镇江清乡专员和伪保安司令,在这个职务的权限范围内,他为中共的地下交通线提供过许多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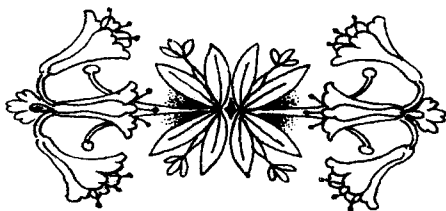
从总体上说,抗日战争时期袁殊在提供情报和掩护中共情报活动方面尽了不少力。他在接受潘汉年代表中共领导的同时,也在时时处处为自己留着退路与后路。对潘汉年交给的任务有时也并未完全尽心尽力。尤其是在潘汉年撤退到根据地之后,据潘汉年系统的一些人反映,有时去找袁殊联系,袁采取了消极应付甚至拒绝见面的态度。1946年袁殊进入解放区后,有关部门没有事先征求潘汉年的同意就同意袁殊重新登记入党,潘对此颇有意见。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已不可逆转。袁殊看到了这一形势,便进一步为自己寻求退路。他辞去了其他汉奸伪职,只保留一项伪上海市政府参议的头衔。这时潘汉年已离开上海两年多,接替潘原在上海工作的人虽和袁殊仍有一些联系,但已很少。当此历史又将发生重要转折的关头,袁殊再一次面临了今后去向的选择。他和中共虽然有联系,但毕竟并无组织关系。他对自己今后的道路仍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按他自己的说法,当时有三条路:一条是携带家眷前往日本做一个海外寓公。以他在敌伪时期所聚敛

的资产财富,他是可以终身不愁生计的。但这样一来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汉奸,因而他不想走这条路。另一条路是接受国民党的收编,仍可以高官厚禄。抗战一胜利,军统的王新衡就赶到上海,并代表军统任命袁殊为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军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这无疑给袁殊又一次提供了投靠军统,也许是升官发财飞黄腾达之路。但他深知军统内部派系林立,互相矛盾倾轧甚深。像他这样非黄埔嫡系的人,在军统稍一不慎是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的。于是他选择了第三条路,回归他早年就曾经追求过,中间又经过了反复曲折的革命之路。就在军统授予他中将站长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1945年的10月,他和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地下党的策划帮助下,安全转移到苏北解放区,最终回归到了革命队伍的行列。

袁殊投奔解放区受到了热烈欢迎。数月之后,组织部门让袁殊重新登记入党,并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在三年解放战争中,袁殊先后在苏北、胶东、大连从事内勤工作。1949年袁殊调到北京后又先后在中央军委联络部和国家情报总署工作。1954年军委在审干中给袁殊正式做了政治结论:1935年被捕时自首变节有严重政治错误,后来为中共做情报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谁知“结论”的墨迹未干,第二年(1955年)发生了潘汉年冤案,袁殊也随即被捕入狱。1965年袁殊以“军统特务”“日本特务”和“汉奸”罪名被判15年徒刑。1975年被释放后又送到湖北一个劳改农场“就业”,直到1982年才因潘汉年冤案平反而随之平反,同时成了一名“离休人员”。1987年11月,终因多种疾病缠身,精神又长期忧郁落寞而离开了人世,时年76岁。

(责任编辑 程 度)



苏联剧变的再思考

● 田 森

在这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人们回首往事,依然对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剧变怀有浓厚的兴趣。人们不断地问,为什么那么大的一个超级大国顷刻之间会分崩离析了呢?为什么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剧变竟然在苏维埃大地上那样相对平静地被接受了呢?究竟什么是这一剧变最深刻的原因呢?

列宁的起点

我们在探索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时,必须把我们的视线向后移。

谁都知道,旧俄国是一君权至上的国家,任何重大举措皆听命于以沙皇为代表的国家,巨大的封建势力长期束缚着人民的自由意识,而使得崇尚权威极为盛行。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列宁在“二月革命”之前始终认为,俄国应当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必须分步骤走,不可任意跨越。可是二月革命后的整个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改变了列宁的看法。回顾历史人们都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重苦难,俄罗斯大地上到处弥漫着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的希冀和渴望,可“二月革命”后的资产阶级政权同沙皇一样都主张把战争进行到底,因而也就使它站到了人民的对立方面;加之频繁的战乱也的确削弱了帝国主义战线,从而使得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在帝国主义锁链中的薄弱一节实现突破,列宁毅然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迅速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一举成功。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在感受列宁的革命胆识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那时在俄国发动这场社会主义革命确有其显著的特殊性——不成熟性。当时在俄共领导层内能跟上列宁思想的领导人甚少,致使列宁每前进一步都不能不做大量的思想工作,虽不能说步履维艰,但的确遇到的

阻力是不小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曾讲过一句流传深广的俏皮话:“俄国历史上还没有磨出烙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反对列宁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当时俄国的生产力的确很落后,自然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而思想准备也是十分不足的。革命既然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了胜利,就特别需要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的先天不足,并力图用后天的诸多措施来弥补。可惜列宁在胜利后工作了五年,就离开了人间,来不及大有建树。

大家知道,列宁上台后,在1918年至1920年曾搞过一段战时共产主义,当时他想把商品和商品交换全都取消。但实践很快就证明了用颁布国家法令的办法在一个落后的小农国家中按共产主义原则从事生产和分配产品,显然行不通。列宁的伟大就在于,当他认识到再这样下去会毁掉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时,便立即果断地予以纠正,于1921年开始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颇似我国现今实行的改革开放方针与政策。在国内方面,力求把经济搞活,提倡市场经济,号召共产党员向资本家学习管理经济的本领,对外则力主开放,强调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同外国和平相处,并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列宁还曾构想在苏联建立我们中国今天搞的特区那样的结构,可惜由于党内的反对,没有能够成功。列宁奉行的这个著名的新经济政策,由于符合客观实际,因而迅速取得了成效。他当时曾表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奉行25年。

列宁去世前曾给代表大会留下遗言,希望总书记能由一位不似斯大林那么专断和粗暴的同志出任,可惜他的意见并未能传达给代表。后来斯大林掌权后,便开始逐渐扭转新经济政策的方向,只是由于新经济政策所仍有的持续的惯性作用和当时的客观形势,使得在1929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新经济政策仍始终在苏国

民经济中不同程度上发挥着它的积极作用。斯大林这个自称为列宁的学生和列宁主义的继承人,对新经济政策的不以为然明显的。他在他撰写的论述列宁主义的所有名著中,只字不提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难道这能被理解为是偶然的吗?

斯大林执政 30 年,苏联凭借着这个过度集权的模式在当时国际和国内的特殊环境下充分发挥了它的动员作用,以至在较短的 15 年时间内便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打下了国力的基础,同时也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个模式还为提高全苏联人民的普遍素质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上所述,在沙皇统治年代,这是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家,然而革命后,对教育的重视和普及,使得苏联终于成为世上少有的几乎没有文盲的国家,并为苏联造就了大批各式各样的专家。

但是,成就毕竟不能掩盖错误。任何一位公正的朋友最后都不得不忍痛承认,斯大林模式存在的诸多严重问题,终于导致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大地上进行的这次空前大规模试验遭到了失败。

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任何社会无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作用的载体。苏联社会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凭借着一种过度集权的模式来运作的,而它终于由于同生产力的发展难以适应,而无法焕发万千群众持久的创造热情。它的生产力显然被它独特的体制遏制了,在同西方的较量中一再失利,从而使这个载体逐渐失去了生命力,而这正是它的僵化体制所造成的。

下面我们就来对斯大林模式存在的问题做一些粗略的远不完备的分析。

僵化的经济体制

1. 只强调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计划的制订又缺乏科学决策过程,制订者判断的失误屡见不鲜。而生产管理者和劳动者只须埋头完成计划指标,什么成本、什么效益,一概可置诸脑后,其浪费之惊人,效益之低,令人难以想像。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对生产什么产品及其数量都卡得很死,难怪在苏联经济发展史上闹出过由计划机关决定生产多少块砖的笑话来,甚至西方学者评论苏联计划经济时说:“那是一从头到脚都被紧紧束缚起来的经济体制”。

2. 把公有制作用绝对化了,在所有制问题上搞纯而又纯。大家知道,20 世纪 30 年代斯大林曾不惜用暴力手段强行消灭非公有制,用残酷剥夺农民的方式推行集

体化,从而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给农业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后果。斯大林急于求成,他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国有化和集体化两种公有制并存的格局,仍力求早日建立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种在条件尚不成熟时,硬要排除全民所有制之外的其他所有制的想法和做法,给苏联经济带来沉重的损失。一个有讽刺意味的材料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据报道,长期以来,苏联人的所谓“别墅”中拥有一块自留地。剧变后千孔百疮的俄罗斯,之所以还能够挺过来,自留地是立了很大功劳的。一般居住在城市的居民,在郊外大都有一块自留地,这块地每年虽要向国家交租但极低廉。每逢假日,城里人就到这里来经管自己的自留地,种上土豆和应时的蔬菜。俄罗斯人在解体后最困难的日子里,正是凭借着这块自留地减轻了他们沉重的生活负荷。

3. 只重视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有关的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终于形成苏联畸形的经济结构,造成苏联的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发展缓慢,人民的必要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经济的低增长,甚至负增长。

苏联僵硬的经济体制和畸形的经济结构终于使得总体发展速度日益递减,到剧变前夕的 90 年代初,其经济发展速度已呈现负增长。昔日曾一度拥有过的速度优势已一去不复返。西方在 50 年代发生的微电子革命把这个曾经多少诱人的苏联速度优势粉碎了。至于从效率和效益来考察,苏与西方相比则始终处于劣势。而在像农业这样的重要领域内,情况只能更令人沮丧。据一项材料统计,苏联革命前 4 年,当时沙俄的年粮食总产量为 8600 万吨,而到斯大林逝世的 1953 年,苏的粮食总量竟低于过去沙俄的年总产量,仅为 8250 万吨。大家知道,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和提高效率的最终目的都必须落在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可是由于苏维埃经济效率的低下和增长率的缓慢,使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比之西方工人生活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苏联人有时发牢骚说,苏维埃体制对工人的剥削甚至超过了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苏联人在两相对比之下逐渐开始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产生动摇,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能在 1991 年那样相对平静地接受了剧变现实的深层次的原因之一。

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相联系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问题,那就是苏联人的人均寿命水平大大低于西方。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至少同苏联人的营养状况以及

医疗水平有关。

政治上过度集权

1. 过度集权、党政不分每每被视为斯大林模式在政治上的一大弊端,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这种执政体制使得权力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最后甚至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形成了个人专权的格局,也正是这种执政体制导致民主的缺乏和监督的少有,必然会带来腐败,带来社会生活中的缺乏活力,它的确是斯大林模式失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其实,在苏共党内早就有人提出更新执政机制的问题,强调“在物欲横流和政治文明低下的今天,这个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来得迫切”。

长期以来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政治生活都没有遵循口头、文件上强调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是采用过度集权的制度,致使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只有服从的份儿,哪里还能表达不同的意见呢?这样的体制又怎能发挥人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呢?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做法更是随处可见,其结果也必然使得党变成了官僚化的组织。

能否清除腐败从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存亡。苏联的执政模式最后终于证明它已无力凭借着自身的力量来铲除腐败了,这也是导致1991年剧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2. 缺乏权力制约机制。社会主义可以否定西方民主的“三权分立”,也不必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模式,却绝对不能否定制约机制的精神,否定建立制约机制的绝对必要性。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在他那本著名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写道:“一切有权的人们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看来,绝对权力必然伴随着绝对的腐败。所以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孟德斯鸠主张“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个真理。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又一次从反面证明了这个真理。缺乏权力制约机制,必然导致“人治”,导致“一言堂”,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肃反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如果有权力制约机制,怎么能够允许随便杀害无辜的忠良呢?又如何能发生上千万人在斯大林年代惨遭杀害的悲剧呢?当时参加十七大党代表中被逮捕、被杀害的竟有1109人,占代表总人数的过半。胡乔木也曾回忆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

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斯大林在一手掌握大权后的不受监督,为所欲为,早就在苏联人民心中激起极为强烈的震荡,这种震荡在事隔很久之后,终于产生了它的滞后效应。正是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机制早就为斯大林模式埋下了覆灭的祸根。

3. 大搞个人迷信。个人专断与个人迷信有着密切的关系,搞个人专断必然需要个人迷信,搞个人迷信又必然会进一步强化个人专断。斯大林统治时期,个人迷信的确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56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也对斯大林搞的个人迷信提出了批评,指出斯大林“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一个令人深思的事情是,过去人们都以为反对个人迷信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首先提出的,其实不然。最早主张开展反对个人迷信的是马林科夫,他在斯大林逝世两周后,即在1955年3月19日便建议在即将在4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讨论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为了开好这次会议,马林科夫连反对个人迷信的讲话稿和全会的决议草稿全都事先准备好了,只是由于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多数成员表示反对而未果。马林科夫曾经担任过斯大林的秘书,是斯大林钦定的党的领袖接班人,一直追随斯大林左右,可是最早提出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却是马林科夫,这的确足以引起人们许多思索。

4. 严重违背巴黎公社精神。马克思高度赞扬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巴黎公社,所倡导的是人民公仆精神。可是斯大林模式却造成了为数不少的大小唯上是从的官僚,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的命运而是自己的官运,不是去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而是为上级服务,做人民的老爷。巴黎公社提倡领导干部应选举产生,可他们却偏偏奉行上级任命制,于是那些并无才能、奴颜十足的人反而得以身居要职,形成了一支唯唯诺诺、唯上是从的干部队伍,且他们又都是终身任职。领导干部终身制易于造成滥用权力,也易于造成腐败,实不足取。

5. 扼杀民主和自由。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要求,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民主,就不能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又何以能成为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呢?社会主义又何以能动员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可斯大林不仅无视民主,而且破坏民主,搞“一言堂”,把自己凌驾于人民之上,终于铺垫了后来覆灭的命运。

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斯

大林模式歪曲马克思主义,把自由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大加反对,其结果只能束缚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积极性,把一个本来应是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硬搞成死水一潭,人人自危。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斯大林模式在政治上一贯奉行超越历史阶段发展的路线,人们不会忘记早在1936年斯大林就曾庄严地宣称:“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赫鲁晓夫在此问题上深受斯大林的影响,他执政后调子更高,他在1959年就说,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两年后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把调子再度提高,说要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鲁晓夫以后的几任领导人都保留了高调。由此可见,斯大林模式“左”的影响有多么深!斯大林模式“左”的思路对其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也算得上是左倾的源头之一吧。

思想禁锢

苏联人民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在74年内不论在科学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取得许多瞩目的成就。它在宇航科学方面的领先地位,更令国家和人民骄傲不已。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正视另一个重要的现实,这就是斯大林模式在思想领域内采取的禁锢方针给苏联的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的确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谁都知道,科学是自由思想的花朵,而在昔日斯大林模式的统治下,不存在自由讨论的空气,这对新观念的产生显然是极为不利的。它只能使真正的科学难以发展,相反地趋炎附势的伪科学可以赢得自己的空间。典型的例证是,20世纪40年代苏联的农学家李森科发表了他的那篇臭名昭著的《自然选择和种内竞争》的歪文,竟然公开否定达尔文学说,并大举批判摩尔根的遗传学派。由于李森科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他的伪科学很快便在苏联生物学界占了上风。其实,在其他科学领域,如系统控制论和量子力学等方面,一些正直的科学家也曾受到压制和批判,致使这些学科难以健康发展,导致它们比之西方国家落后了很多年。在斯大林模式的统治下,昔日俄国曾有过的学派林立的局面已被彻底粉碎。科学的命运如此,文化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在斯大林模式统治的年代,苏联文坛缺乏生气,除去卫国战争年代由于当时的文学创作气氛稍为宽松了一些,再加

上爱国主义热情的被激发,曾经产生过一批颇具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外,总的来说,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无法同昔日俄罗斯时代相比拟。我们不能说,斯大林对科学、文化的所有干预都是错的,那样说也不一定确切。但斯大林把自己扮成真理的化身,对不少科学文化成果横加批评,历史已经证明对的少,至于造成了多少悲剧,又酿出多少苦酒,也早已凝成沉重的、痛苦的史实,足以供后人去痛定思痛。苏联科学文化发展的道路告诉人们,真理不能钦定,更无法长期垄断,科学文化活动中的真理只有通过长期实践的检验才能确定。

大家知道,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微电子革命大大加速了社会前进的步伐。随着这场革命的日益深入,西方的生产力水平、国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这对苏联的覆灭实具有深层次的影响。当然我们必须公平地指出,由于冷战的需要,苏联当时的确发挥了斯大林模式动员的优势,集中了相当的人力、财力、物力,并采用了特别的扶持方针,给军事有关的一些科学部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从而取得了卓越的成功。至今在有些军事科学部门,俄罗斯依然保有优势。但从总体考察,苏联的科学水平已被微电子革命后的西方抛在了后头。人们都高度评价美国硅谷的作用,其实硅谷之所以为硅谷,除了它技术力量的因素外,绝对不可忽视它的文化生态环境。在那块土地上,人们对科学问题畅所欲言的讨论,对新思想的推崇,对新发现的追逐,而不少企业家更是努力把科学家的一些新观念、新思路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如果没有这一切,硅谷也不可能对西方科学的发展做出那么大的贡献,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了。当然我们在客观地评价微电子革命迫使苏联不得不面对在科学上落后于西方的这个现实时,也必须看到苏联科学的发展还遇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里,僵化的过度集权的苏联体制对付不了变化多端的市场要求,也难以有效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更调动不了人们从事科学发挥创造的高度积极性。

民族政策不当

民族政策不当是导致苏联剧变的一个导火线,苏联诸多加盟共和国的离心终于给了这个超级大国以沉重的致命一击,使它再也站不起来了。

谁都知道,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拥有一百多个民族,约占全世界民族总数1/30左右,堪称

世界少有的多民族大国。

列宁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他具有光辉的民族平等的观念，一贯反对用暴力来解决民族问题，极端厌恶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列宁的后继者斯大林并没有将列宁的平等、自由、兄弟般联合等光辉的民族思想在实践中继续贯彻下去，而是反其道行之，把列宁十分痛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付诸了实践，并导致在斯大林模式统治的约半个世纪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阴影一直笼罩在苏维埃大地。对少数民族横施暴力，把许多本属于民族关系的问题混淆为阶级矛盾，忽视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硬性推广俄罗斯语言文化，不适时地强调融合。把俄罗斯人称之为“杰出民族”，各民族的“领导力量”等等，这些做法都极大地伤害了少数民族。当然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也做过好事。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实行的是联盟各国“拉平”的方针，这对少数民族的发展，特别是它的教育发展就曾起过重大作用。革命前少数民族地区文盲很多，可是苏联不仅基本上消灭了文盲，而且为少数民族造就了大批科学、文化方面的专家。然而斯大林在民族问题方面确实也做了许多错事，赫鲁晓夫上台后，政治上也未能让 40 年代所有被迁移的民族返回故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尽管也采取了一些发展民族经济的措施，但总体上说，在民族问题上仍奉行“左”的方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 80 年代下半叶苏联民族问题已日趋尖锐化，多少年积累下来的民族矛盾濒临爆发。可戈尔巴乔夫先是看不清问题已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看不见苏联当时已面临民族分立运动的极为严重的威胁，及至有所察时又无力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以解决。而在“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又辞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中止苏共活动，实行全苏非党化，从此统一的苏共已不复存在，这也就自然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后果。

外交上的霸权

20 世纪初期，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面对外来敌对势力随时可能的侵犯，苏维埃国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在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苏维埃国家不仅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而且已经成为地球上无可争辩的强国后，在 1945 年至 1948 年间强化世界革命的论调，宣称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实现共产主义，从而在西方颇引起一阵惊慌，相互之间的军备竞赛日益升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愈演愈烈，长期压得俄罗斯透不过气来。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长期的军备竞赛，苏联的

财政已不堪重负，据称，苏联单是为同美国对抗就花费了 7000 亿卢布。难怪西方学者认为，正是不堪重负的军备竞赛最终拖垮了苏联。持续地军备竞赛并力求保持同西方均衡的军事实力，的确曾经刺激过苏联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它的强大，然而也正是军备竞赛逼使它不得不把可观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发展国防事业上，这样势必又会加重它的财政负担，从而导致国民经济更加畸形的发展，影响经济社会指标的完成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不顾人民生活而一味争霸的做法只能激起人民的日益不满，从而终于葬送了自己。所以，从深层次考察，应该说大国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乃是苏联覆灭的深层次原因之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去努力埋头建设自己的国家，却热衷于谋求霸权地位，不惜随同美国一样的军事开支，甚至发动持续 9 年之久的阿富汗战争，仅为这次战争就花费了数百亿卢布，并且葬送了大量苏联青年的生命，更可怕的是它为社会主义抹了黑，令人们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胡耀邦同志早有所察。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他就曾指出：“苏联在世界上的形象很不好，内部建设和对外关系都存在很多严重问题。”

苏联奉行的大国霸权主义不仅表现在它四处把革命强加于人，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呼唤所谓世界革命为名，极力扩充军备，进行渗透，热衷冷战，意在称霸天下。苏联大国霸权主义还表现在它在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每每以“老子党”自居，实行家长政治。在国际共运中又要求别人服从苏联利益，唯我独尊，大摆“老子党”派头。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犯下的这种极为严重的错误，使它在国内外都大失民心，从而也就自然为 1991 年剧变埋下了祸根。

结束语

在造成苏联剧变的众多深刻的原因中，经济落后和政治专制是导致解体的最重要的原因，而其中经济的日益衰退所起的作用更大。经济因素在这次苏联社会剧变中毕竟扮演了发挥终极作用的角色。

今天仍有些同志把苏联剧变的主要责任归之为戈尔巴乔夫。不消说，戈尔巴乔夫对此当然负有他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让戈尔巴乔夫去承担主要责任则有欠公允。再说戈尔巴乔夫纵有千种思维，万般激情，亦难呼风唤雨。他在 20 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再大，若不伴随着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是不可能把这座有着 74 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大厦送进历史博物馆的。他还没有那

么大的能量和本领,把主要责任都算在他身上反而把他的作用夸大了。应当客观地说,足以使苏联社会主义大厦倒塌的是“左”的、僵化的斯大林模式。还是邓小平说得好:“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正是苏联斯大林模式长期的“左”断送了它自己。

1991年苏联的剧变,是长期以来苏联社会主义诸多矛盾造成的后果,对此首先应当负责的是在苏维埃大地统治了约半个世纪的斯大林模式,虽说正如本文在一开头就提到的那样,这个模式也有它的功绩,然而比之它的众多失误来说,它的功过是不相称的。被诸多严重矛盾紧紧缠身的僵化的、“左”的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有其必然性。

最后我想用恩格斯在1890年写给奥托·伯尼克的一封信中说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这篇文章。恩格斯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济变化

和改革的社会。”是的!社会主义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斯大林模式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种模式,它的失败也只是这种模式本身的失败,或者说一种扭曲了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当然,我们注意到了由于斯大林模式在社会主义试验中的极为重要地位,它对后来人们搞社会主义所发生的影响是很深远的,造成的损失也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也高兴地看到,随着时代的前进,今天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力求摆脱这一模式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深深体会到没有富裕、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在人类进行社会主义试验的伟大工程中,肯定还会出现新的、真正能给人们带来富裕、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幸福的社会主义模式。

(责任编辑 洛松)

推进党史党建事业发展的阵地 展示党史党建研究成果的窗口

理论工作者的理想园地 实际工作者的忠实朋友

上海党史与党建杂志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31—1856/K;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9—928X

邮发代号:4—708,每月5日出版,全年12期订价60元,

地址:上海市康平路141号,邮编:200030

编辑部电话:64335969;

E-mail: dsdj@ccphistory.org.cn

《上海党史与党建》杂志是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的综合性理论刊物。其主要栏目包括东方论坛、毛泽东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专题研究、海外了望、史料考证、党建论苑、党建史鉴、社区党建、国企党建、新经济组织党建等30多个。刊物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资政、育人为宗旨,立足上海,面向全国,贴近生活,服务现实,融思想性、学术性、史料性、可读性为一体,成为展示党史党建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推进党史党建事业发展的主要阵地、党史党建理论工作者学术交流的理想园地、党建实际工作者学习探索的忠实朋友。

本刊1993年被评为全国社科类中共党史核心期刊,2000年和2001年被评为华东地区党史优秀期刊。近几年来,刊物刊登的各类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中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现代史》、《邓小平理论研究》等刊物广为转载。

欢迎订阅

大江南北

2003年《大江南北》杂志(月刊)

《大江南北》于1985年创刊,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主办。主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优良传统。特色:历史与现实结合,学术性与文学性兼备,主题深刻严肃,风格真淳纪实。

大江南北杂志社地址:上海市中山南二路777弄东安花苑1号
1501室(经理部、发行部)
1504室(编辑部、通联部)。

邮编200032

电话(021)64566073 54244019

全国邮局办理订阅零售。邮发代号4-443。大16开本,每期定价4.10元,全年49.20元。

本社发行部亦办理订阅邮购。

汪精卫何以曾为孙中山的“接班人”

● 王 勇 那孝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6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执全会决定将广州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在选举国府主席的会议上，与会11名委员（国府委员共16人）全票选举汪精卫为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在随后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汪精卫也担任了主席。至此，汪精卫成为国民党新军政领袖。

在孙中山逝世前，其主要助手有负责政治的胡汉民，负责财政的廖仲恺，负责党务的汪精卫，负责军事的蒋介石。当时蒋介石的资历声望比不上前三位，尚不具备担任领袖的实力。可是就实际地位和影响而论，汪精卫与廖、胡不分伯仲，为什么他能一跃而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呢？

国民政府成立之时，正值国内革命运动高潮之际，这是一次以国共合作为主要标志、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目标、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伟大政治运动。孙中山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体现了这次革命的根本特点。当孙中山在世时，可以凭藉他的崇高威望，排除干扰，领导革命运动按预定的方向发展。可是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内部左中右三派的分化日益明显，原来反对三大政策的右派分子重新抬头，反共活动日趋嚣张。此时的国民政府面临严重挑战，对外必须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对内必须加强统一战线，维护党内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最需要的是——一位既能保持三



汪精卫

大政策的连续性，又能调和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稳住政局的首脑人物。

在当时的国府委员中，真正的左派人物仅廖仲恺等人，虽然他们遵从孙中山的主义、政策、遗嘱并为之而奋斗，但作为政治势力，他们在国民党领导层中因其政治态度的“过激”，不易被全体成员所接受，处于少数地位。

在国府委员中，可以出任国府主席的人选还有胡汉民。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胜利后就一直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在国民政府成立前，他是

广州大元帅府的代理大元帅。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胡汉民基本上是站在孙中山一边，支持改组国民党和联俄联共决策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他也看到要摆脱国民党的困境，需要借助苏俄的援助和共产党的力量，但他又认为必须对之加以防范。在国民党的左中右三派中，胡汉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态度影响着政治天平的升降，关系着今后三大政策的实现程度。在孙中山逝世后，自认为是国民党正统派的胡汉民，看到许多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党的领导职务，以及共产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和崇高的理想，越来越赢得民心，这将对要掌握国民革命运动领导权的国民党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对联共政策日渐怀疑，由对苏联和共产党的利用防范转为反对。加上胡汉民素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不和，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冲突也逐渐激化，所以若是由正在向右靠拢的胡汉民主持了国民政府的话，势必不利国共合作的坚

持和三大政策的执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宣告不做官吏、当时在政府中没有担任实际职务、“唯国民党与三民主义是奉”的汪精卫，受到了各方势力的重视。汪精卫政治活动的一大特点，是具有过人的应变能力，善于“相机而变”。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他一开始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共产党如果加入国民党，“本党的生命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凭借他多年追随孙中山的经历，知道国民党的改组势在必行，才抛弃自己的观点，转而支持孙中山的主张，投入改组的准备活动中。孙中山逝世前后，汪精卫又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去迎合时代的潮流，表现出新的姿态。在一段时间内，他不断发表左派言论，高呼“要将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一齐打倒”，只有“永绝军阀祸根，人民方能解除痛苦，团结自救”。他开口就是国民党改组精神，言必称拥护农工运动，文必举国民革命大旗。一时间他不仅得到了国民党左派的信任，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也博得了广大工农民众的好感。另一方面，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能透彻地揣摩孙中山的思路而著称，他多次根据孙中山的口授由自己代拟的各项文件，孙中山极为中意，故后来成了孙中山遗嘱的执笔人，这一切均使他在国民党内也具有一定的威望和政治资本。再加上在左右派斗争中他所做出的“无所偏颇”的超然姿态，亦争取到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最终成为能为各派势力同时接受的主要人选。

在为国民党赞扬一位新领袖的过程中，苏联顾问鲍罗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拥有国民党所急需的政治和军事援助，再加上孙中山生前对他的信任，在孙中山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鲍罗廷的话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国民革命运动中，许多重要决定实际上是他做出的。在1924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原则是：联合国民党左派，促使国民党中派左倾，孤立国民党右派，通过使国民党的纲领和政策左倾的办法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按照这个精神，鲍罗廷当然得支持既有利于维护国共合作，又能调和左右派矛盾的人选。所以还在孙中山病重期间，鲍罗廷就曾对汪

精卫透露了支持他为新领袖的信息，这也是汪精卫在改组国民政府期间态度左倾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对国民党政策有一定影响力的共产党人也认为汪精卫“当他还革命时，会把苏联顾问和我党的意见加以发挥，会做一个很好的留声机”，而“胡汉民从思想上说是右派，虽然有时也可以同左派妥协，但有他地主阶级的独立立场”，从而支持汪精卫，否定了胡汉民。

另外，汪精卫在改组国民政府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幕后活动，为自己当选国府主席费尽心机。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的领袖欲望迅速膨胀，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首先是政治上急剧左转，事事向鲍罗廷请示，在各种场合做出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姿态，俨然是总理遗志的继承、捍卫者。其次是排挤自己昔日的战友、现今的竞争对手胡汉民，私下改动胡汉民主持国民中政会的政府人选，交给报纸发表，却不让胡知道，以此架空胡汉民。第三是亲自到潮汕去见军方实力人物许崇智，为自己的当选拉住关键的一票。更让人产生垢病的是，在投票选举时，汪精卫自己投了自己一票。虽然这一票不是他当选的主要因素，但一向自命清高的汪精卫急于上台的迫切之情却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当时负责唱票的会议秘书伍朝枢过后对人说：“我对汪本来相当敬重，但由此次选举来看，完全表现他是热心利禄的人，我从此就鄙视汪兆铭了。”

与汪精卫相比，胡汉民就显得书生气十足。在当时的形势下，胡汉民不是没有顺势出任国民党领袖的欲望，可他不愿为此而挖空心思使手腕，只想让别人捧他，做众望所归的领袖。他以这种君子风度参加最高权力的角逐，加上政治立场上的不识时务，在这场争斗中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胡汉民的个人素质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国民党领袖。李宗仁曾评价胡确为一守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无政治家风度。他说：“当时党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的旋乾转坤的领袖却不足。”由于人缘太差，造成人们对胡汉民“恶感多而好感少”，转而拥护善于蛊惑人心的汪精卫。（责任编辑 刘家驹）

钱镠铁券千年播迁记

● 钱听涛

1940年我祖父在故乡常州逝世，按旧俗要将神主送入东门外白家桥的钱氏宗祠。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这个宗祠，前厅单独立龛祭祀的是第一世至第三世的吴越国五王：武肃王钱镠、文穆王钱元瓘、忠献王钱弘佐、忠逊王钱弘俶、忠懿王钱弘俶，以后看到《菱溪钱氏族谱》，才知我是武肃王36世孙。解放后回家乡，宗祠改作仓库；“文革”中族谱作“四旧”上交。读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他称道，在五代十国中，吴越最安静，“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但税收繁苛，剥削严重，营造宫室，穷奢极侈。以后背上我出身资产阶级的包袱，更讳言这些封建时代的先祖了。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武肃王铁券原物，十分惊讶。家谱上记载的这件铁券原来只是一块如瓦片一样的铁质文物，还稀稀的留下若干鎏金字迹。怎么经过了一千多年漫长岁月竟能保存下来。我就在那些《家乘》、《纪事》中探索，居然流传有绪，而且是充满传奇的故事。

这具铁券，制作于唐昭宗乾宁四年八月。《两浙金石志》记载：此券“形如筒瓦，长一尺八寸三分，阔一尺一寸，厚一分五厘，重一百三十二两，正书，二十七行。”《十国春秋》称：“铁券，形如瓦，方广约一尺五寸许。盖镕铁铸成，镂金其上者也。唐昭宗以赐彭城郡王镠。券文凡三百二十二字，晶光闪烁，天语温纯。”《野获编》称：“质如绿玉，不类普通之铁。其字，皆用金填。”我看到的实物大致如此。但字迹漫漶，大致三分之二已看不清了。

据史料记载，唐末藩镇割据，天下大乱。钱镠与董昌都是浙江临安一带的起事首领，剿灭过黄巢农民起义军。公元895年董昌称帝，建元顺天，国号罗平。钱镠反对他这样做，先是规劝，后则征

讨，终于将董昌打败。唐昭宗乾宁四年八月，皇帝派中使焦楚鎰赐钱铁券一具，隆重褒奖他。据说唐代，皇帝颁赐铁券一共只有四次，当时是极高的荣誉。

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当时钱镠虽对唐称臣，实际已于唐昭宗景福二年以杭州为中心建立了吴越国。历经子孙三代五王，铁券一直藏在宫中。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在北宋政治高压之下，第五代吴越国王钱弘俶没有像三年前南唐后主李煜那样：“一旦归为臣虏”，而是主动纳土归宋，和平统一。钱弘俶率领王族子孙近亲一千多人，由杭州迁居汴京开封，以示忠顺。晚年受封邓王，死于南阳，归葬洛阳，这是宋太宗端拱元年。钱弘俶迁河南时，将这具铁券及历代皇帝所赐的竹册、玉册、诏诰等家传文物仍藏在杭州吴越国宗庙内。宋太宗淳化元年，杭州地方官认为这样不妥，就将铁券等全部吴越旧物运到汴京献给皇帝。宋太宗为了安抚钱氏，钱弘俶已去世两年，因此下诏将铁券等归弘俶子安僖王钱惟浚保管。过了30多年，宋仁宗即位，惟浚已经去世，其弟惟演，官拜翰林学士，历任工、刑、兵部侍郎尚书，官爵显赫，又负文名，与杨億、刘子仪同为西崑体重要代表人物，拜翰林学士，这批文物就转归惟演保管。惟演这一支钱氏子孙在宋代与皇室、后族六世联姻，惟演死后谥文僖公，追封思王。其子钱晦，娶献穆大长公主的女儿。铁券归钱晦保管。宋仁宗知道他家存有铁券，曾索观，后又归还。到宋仁宗之孙神宗即位后，铁券已归钱晦之弟冀国公钱暄之子钱景臻收藏。因为钱景臻娶仁宗幼女秦鲁国大长公主，成为驸马，官至右领军卫大将军，御史大夫。死后谥会稽郡王，这是靖康元年。第二年金人南下，皇帝、宋室被虏，即

“靖康之变”。徽宗之子赵构南逃，宗室中哲宗废后孟氏及这位秦鲁国大长公主幸免被虏南逃。大长公主已高龄 72 岁，是赵构的曾祖母，南下后她第一个上表请赵构即位，赵构即宋高宗，以后当然对这位老长辈感激万分。绍兴四年，高宗下诏为大长公主建邸浙江台州（今临海），让钱氏这一支子孙世居于此，安享尊荣。大长公主南下时当然把铁券等吴越文物携带南逃。公主长子钱忱，字伯诚，历仕哲徽钦高四朝，娶唐氏，与南宋大诗人陆游之母为姐妹。陆游于 12 岁时（绍兴六年）随母至姨母家，拜谒了这位老长辈大长公主，看到了铁券等宝物，陆游后来写了一篇《跋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文》（见《陆游文集·渭南文集》第 31 卷），详记了铁券流传经过，并称：“某年十二三时，尝侍先夫人，得谒见大主，铁券实藏卧内，状如箭瓦。今七十余年，乃得见录本于武肃诸孙榘家。后十字，盖文僖手书。某家旧藏文僖书帖，亦有押字，皆与此同。武胜军节度使印，则文僖尹洛时所领邓州节钺也。开禧三年六月乙巳，山阴陆某谨书。”“某”是陆游自称，开禧是宋宁宗年号，三年是 1207 年，当时陆游已 83 岁，追述 70 余年前往事。这一年陆游在钱榘家见到的是铁券的录本，上面还有钱惟演手迹。

又过了约 70 年，元兵南下，宋恭宗德祐二年临安陷落，宋亡，元兵将到台州时，钱忱后裔钱叔澂背上铁券等传家宝逃难。兵荒马乱中，铁券等坠入河中，叔澂也在途中死难。从此铁券没有下落了。但 60 多年后又出现奇迹。元顺帝元至二年一个捕鱼人在浙江黄岩县南泽库附近的水中打鱼，鱼网中发现一个铁瓦似的物件，他把它抛在一旁。附近村中一个老学究曾听过一些铁券的故事，就用铁价把它从渔人手中买回去。这消息后来被人报告了钱叔澂之兄钱世珪，世珪用十斛谷子从老学究手中买回，世珪是钱氏宗祠族长，从此铁券就保存在宗祠里。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元亡，明太祖把这一年改为洪武元年。他在位时，仿前代想褒奖功臣，要参考这具铁券，就召见世珪之子钱尚德。尚德捧了铁券及吴越五王图像到南京朝见朱元璋，皇帝赐宴，下诏仿铁券制了一个木券，原件赏还。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再次召见钱尚德后裔钱克邦，要看这铁券，克邦又奉券进京。皇帝仍是优礼有加，并称赞钱弘俶纳土归宋

的美德。观后依然赐还。永乐五年明成祖又想看铁券，差行人曹闰到台州找到武肃王十七世孙、广西参政钱汝性。汝性与曹闰一起，“奉券驰驿，进呈，御览毕，以礼遣还。”以后铁券一直珍藏于台州宗祠。清代以后，直到乾隆二十二年皇帝南巡至杭州，钱氏在嘉兴的裔孙，告老还乡的原刑部尚书钱陈群，率台州后裔钱选至杭州奉铁券呈览。乾隆皇帝大为赞赏，亲制观铁券歌赏赐钱氏族：“表忠观永祀钱塘，铁券却在台州藏。久闻其名未睹物，秋卿同族今呈将。铸铁如瓦勒金字，乾宁岁月犹存唐。……”乾隆当然仍是赞扬钱镠及其后裔的忠君之忧。但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家的衰败，铁券的命运也起了波折。光绪二十一年，藏在宗祠里的铁券竟被盗走，从台州盗至嵊县出售，被时任嵊县县令的常熟人徐印士用 400 银元购去。这事被出生于安徽广德的武肃王三十二世孙、举人钱文选获悉。钱文选之兄乙斋正以观察兵部在浙江办公。他就与嵊县长乐乡一大批钱氏族向徐印士力争，结果终于以原价从徐手中赎回，一起赎回的还有乾隆御赐宝匣一只。赎回之时，长乐钱氏族演戏剧 10 天，以示庆贺。长乐钱氏分中段、前段、后段三房，三房房长轮流保管。据钱大莘在《钱王后裔在嵊州》一文中说：每年春节，族人用花轿抬着铁券，伴以乐队，连同吴越王遗像一起在大宗祠供奉。抗战爆发，1942 年嵊州沦陷，钱氏族将铁券严密密封，藏于后段钱麋麟家深井内。抗战胜利后才取出，仍恢复春节的隆重祭典，并把铁券藏于商会会长钱元瑞家。1949 年 5 月，长乐解放。钱氏族感到共产党、人民政府可以信赖，就决定由钱元瑞代表钱氏献给国家，由杭州浙江博物馆收藏。直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于 1958 年后筹建，至全国各地征集文物，这件国宝才运至中国革命博物馆以一级文物珍藏陈列。这件历经一千一百多年沧桑变迁的国宝，虽然一角稍有损坏，金字大半漫漶不清，但的确是流传有绪的原物，实在是无价之宝。我曾再三谛视，思绪万千。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这类国宝是最好的见证。何况它说明我们国家有识之士历来主张统一，反对分裂。我们应保护这类国宝，让子子孙孙受到教育。

（责任编辑 吴 思）

朝鲜前线第一个《人民日报》记者李庄

●
申
春

1950年7月10日,《人民日报》社长范长江找到总编室主任李庄说:朝鲜战争已国际化,美国海空军占绝对优势,现在陆续增兵。法国《人道报》和英国《工人日报》都准备派记者去采访,中央决定派你去,由三家联合组成记者团,你牵头。少奇同志已写了信给朝鲜劳动党中央,他们会帮助你们的。

李庄像当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样,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李庄考虑最多的是他第一次到异国他乡执行采访任务,又是第一次同外国记者共事。当然,他还有自己的家庭。他的爱人赵培蓝当时也在《人民日报》做编辑工作,表示全力支持李庄。她唯一的希望是和两岁的儿子、一岁的女儿一起,照一张“全家福”。

1950年7月中旬的一天,李庄偕同马尼安、魏宁顿从北京出发,抵达安东后跨过鸭绿江桥进入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当时,新义州已遭美机多次轰炸,街上行人来去匆匆。李庄一行三人乘汽车踏上前线的征途,他们先从西海岸的平壤到东海岸的元山,在防空壕里听取江原道劳动党委员长林春秋的情况介绍。在返平壤途中,记者团分乘的汽车突然遭到四架敌机俯冲扫射,打坏了一辆车,没有人员伤亡。这是李庄去朝鲜前线第一次遇险。当时他同两位外国记者站在一个小山上的树林边,见到几处村庄被燃烧弹击中起火了。魏宁顿说,这太疯狂了,超过希特勒空袭伦敦。他们三位目睹了美军无数空袭,决定起草了一份揭露美军暴行的声明,他们回到平壤后,声明由新华社从平壤发出,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宣传部、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柴成文和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丁雪松的协助下,李庄偕同两个外国记者、翻译和警卫人员,分乘四辆汽车直奔汉城。车队过“三八”线行至距汉城30余公里处,突然遭到八架美机的攻击。李庄指挥大家分散卧倒在稻田里,敌机轮番俯冲时的刺耳声和剧烈的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一架美海军战斗机飞得过低,碰断公路旁一排柳树,在距车队前五六十米处坠毁,驾驶员身亡。马尼安用照相机全部摄入镜头。

他们到汉城后,发现整个城市已在朝鲜人民军的军管之下,电车照常行驶,行人熙熙攘攘。

当时,美国在朝鲜作战的部队主要是第八集团军,美军第二十四师少将师长威廉·迪安被俘。主力已撤到大邱和釜山地区顽抗。

三人记者团决定分散活动。马尼安要回平壤访问金日成后回国,魏宁顿则去大田采访新战场。李庄决定去大邱、釜山。一天夜里,李庄车行至大邱以北一条河流渡口时,守桥的警备队员告诉他,桥上有定时炸弹,汽车不能通行。李庄耐心地说服了警卫,他让两部车拉开距离,迅速通过。当李庄乘坐的第二辆吉普刚过桥,车后一声巨响,掀起的混凝土块像雨点落在车顶上,李庄在车上安然无恙。

在距大邱不远的一个山村里，李庄十分高兴地见到了东线最高指挥官武亭将军。

武亭将军对李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抗战时期，武亭就在太行山上指挥一支朝鲜义勇军对日作战。司令部与李庄所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同住山西辽县（今左权县）的一个村庄，是老相识了。现在新的战场重逢，特别亲切。武亭介绍了当前敌我态势，然后对李庄说：“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可与八路军相比。”李庄

详细记录了武亭的谈话。李庄兴奋地感到，在抗日烽火中成长的指挥员定能完成他的祖国解放大业。李庄还提出要到第一线人民军部队采访。

武亭再三考虑，同意李庄到不远处的人民军一个师采访。李庄在人民军李师长陪同下，登上一座海拔千余米的山顶，用望远镜可清晰看到大邱城的全貌。城周围，美军和李承晚军队正在紧张构筑防御工事。

李庄在朝鲜东线停留了一周时间，他采访了司令官、师长和参谋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采访，李庄接到范长江的来电，要他回国汇报。

就在李庄回国后不久，朝鲜战局发生骤变，美国邀集了十多个国家，打着联合国军旗号，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29日攻占汉城，向北大举进犯，并攻占平壤，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11月初，李庄第二次入朝。

在这之前从10月19日开始，我志愿军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五十军相继开赴朝鲜前线。

他来到志愿军第三十八军采访，有时随军长梁兴初和政委吴岱一起行动，有时到三十八军的一一二师采访，在堑壕里和战士们一起吃着炒面，倾听战士们的心声。在第二次战役中，他和战士们连续七天七夜强行军追歼敌人。这次战役，共歼敌三万余，缴获大批汽车、坦克、大炮和其它武器。在他写的《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的通讯中，叙述了指战员的英雄事迹。



李庄全家福

在前线，李庄总是争分夺秒，找机会托人把稿件带回国内。当时，战地传递困难，军用电台不发新闻稿件，又不能邮寄，只有托人捎到安东再寄往北京。他每次采访一结束，便找一处能隐蔽的岩凹处，赶写通讯。天寒地冻，笔尖结冰，他只能用口中热气边呵边写。

第三次战役后，李庄得悉我所在的志愿军第五十军在汉城以北高阳地区打了一场漂亮的步兵打坦克战斗，全歼英军皇家重坦克营，他赶来采访了一四九师师长金振中和四四六团2营营长杨树荣，还有5连的爆破手们，很快写出了《皇家坦克营的覆灭》。

在第四次战役中，李庄又回到了三十八军采访。他在汉江南岸18昼夜的阻击战中，采访了许多指战员，写出了生动感人的通讯《光辉的阻击战——汉江南岸战斗纪实》，还有《我们打出去》等篇，记录了那段在朝鲜战争中最壮烈的史实。

李庄先后两次赴朝鲜前线采访，写出了大量的战地通讯。遴选出其中一部分，结集为《朝鲜战地目击记》、《战斗十日》两部书出版。

不久前，我到李老寓所见到他时，见他靠拐杖助行，却依然笔耕不辍。我望着眼前这位已85岁高龄、满头银发的老记者，心灵被震撼了，我禁不住对李老说了声：珍重！珍重！

（责任编辑 刘家驹）

东北大野诗人穆木天

● 穆立立

父亲穆木天是东北籍的诗人,他曾说自己是“东北大野的儿子”,说东北是他“心中的十字架”。对于父亲的东北情结,我也有个从了解到理解的过程。

父亲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是以他的象征主义的诗歌和理论成名的。20世纪20年代初在东京帝大,他读的是法国文学专业,懂日文、英文,后来又自学了俄语,长期从事法国文学和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然而,在我的记忆中,从他的身上实在看不出诗人的潇洒,更没有丁点儿洋味儿。光看他那剃得光秃秃的头,听他那浓重的家乡口音,

整个是一东北土老冒。抗战时期,我们一家人主要颠沛流离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地。在那些地方,冬天并不太冷,但父亲却总要戴一顶“牛皮朝天”的东北大皮帽。家里吃饭时,经常有的三样菜是焖四季豆、拌茄子、蒿子杆沾酱。80年代我到东北去做了一次考察,1990年又回家乡去参加纪念穆木天90诞辰研讨会,我突然明白了:父亲当年之所以要戴那种皮帽,是要表明他是流亡关里的东北人,当年他吃那几样菜时,心中品的是东北味、故乡情。

父亲是吉林省伊通县人,“九一八”前夕离开东北时写的《别乡曲》、《奉天驿中》、《啊!烟笼着的这个码头》等诗篇中,他“心如刀刺地”与之告别的是即将被“禽兽”“盘踞”而“沦于腥羶”的整个东北的大好河山。想来,他说自己是东北人,是由于他情之所系,是整个东北的命



穆木天

运。

这种东北情对父亲的主宰力量是极强的。1926年春,他在东京帝大毕业后,随即回国。在广州,他结识了麦道广,开始了俩人的恋情,并于1927年生下了我的路易哥哥。这是父亲第一次自由恋爱形成的婚姻。1927年出版的诗集《旅心》中的《献诗》就是父亲献给麦道广的。当时麦道广是在中山大学音乐系学钢琴的大学生。从《献诗》中缠绵的诗句,可以看出穆木天对麦道广的深情。但是对她的爱却不能拴住我父亲的东北心,也未能激起穆木天

更多的诗情。似乎只有对东北的牵挂才是穆木天的泉源。就是那本被认为是象征主义的诗集《旅心》,父亲认为其中也是“隐含着亡国之泪”的。

父亲从日本回到祖国后的两三年中,曾一度感到写不出诗来了。而在东北的这一年半里,他走访了家乡的许多地方——蛟河、敦化、巍峨险峻的老爷岭,一望无边、满目青葱的黄松甸,他看到了奶子山黑油油的煤块,长白山直径五六尺的木材……这一切使他为家乡山河的壮丽和宝藏的丰富赞叹不已,更使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封建军阀统治的黑暗无比痛心和愤怒。于是,父亲的诗情就像一颗在风中飘荡的种子,一下子落在适宜的土地,汲取了充分的营养,开始蓬勃生长。在1930年作的那首《写给东北的青年朋友们》中,他呼喊:“到处是民众的苦难,/到处是民众的凄惨,/朋友,睁大了我们的眼睛,/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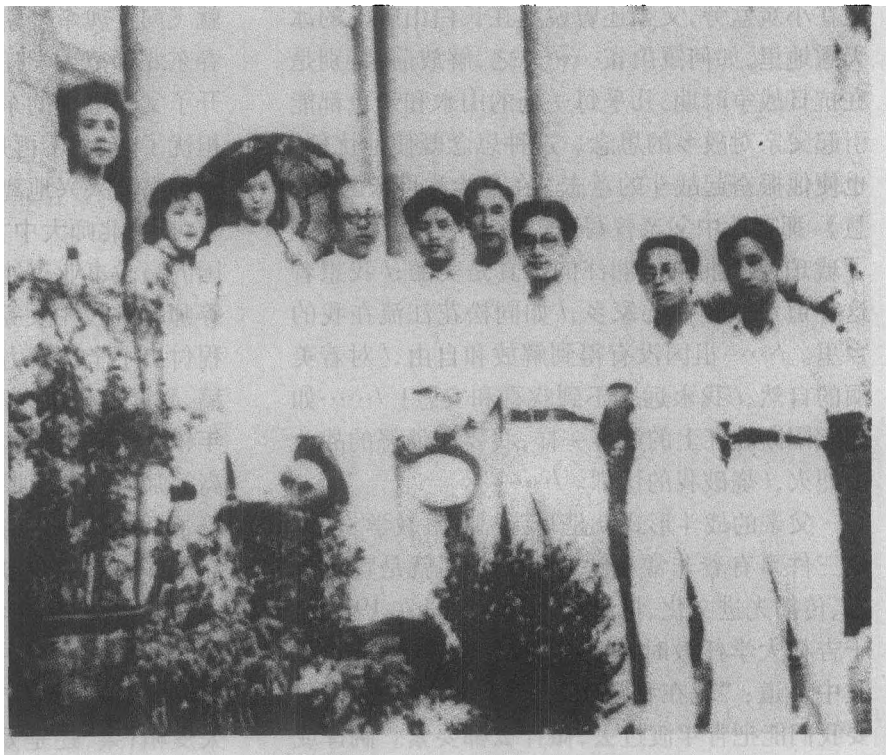
了眼睛看我们的目前。/……看吧,到处是土绅土匪,/看吧,到处是吗啡鸦片;/看吧,各地方的满洲银行……/看吧,私贩军火的外国药房;/看吧,那些化装的调查团,/……看吧,是谁占领了吉长、吉敦铁路,/看吧,是谁酿成了本溪湖事件。/朋友,这些事哪个不需要我们调查,/朋友,这些事哪个不需要我们表现。/……”此后,他陆续写出了《扫射》、《在哈拉巴岭上》、《守堤者》、《江村之夜》、《歌唱呀,我们那里有血淋淋的现实!》等诗篇,反映了东北人民深重的苦难和在血泪中的奋起与斗争。

1931年初他从东北来到上海,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中国诗歌会的带头人。父亲在为《中国诗歌会会刊《新诗歌》》作的《发刊诗》中写道:“压迫、剥削、帝国主义的屠杀,/反帝、抗日,那一切民众的高涨情绪,/我们要歌唱这种矛盾和它的意义,/从这种矛盾中去创造伟大的世纪。/……我们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在1932年初的“一·二八”战事期间,他和中国诗歌会的朋友们废寝忘食地在上海街头张贴散发宣传抗日、支持十九路军的诗抄和传单。

父亲究竟是如何从象征主义转变到现实主义道路上来的?他是如何从对“幽、微、远、渺”的寻觅中挣脱出来的,转而大力提倡大众化、提倡运用各种通俗文艺形式的?我以为他的这种180度的转变除了一些普遍性的原因外,似乎还有一个个性化的解释,那就因为他是东北人,他自己说他是“东北大野的儿子”,东北是他“心中的十字架”,对东北沦亡的切肤之痛和对东北大野的热爱,使父亲不可能像西方的象征主义诗人那样,去追求一个神秘的境界,一个生命的彼岸,在那里他的灵魂是得不

到安宁的;他所追求的只能是在现实中让东北大好河山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奴役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对东北乡土文艺的喜爱和熟悉,也使他认识到运用一些通俗的文艺形式是唤起民众、宣传民众所必须的。

父亲的童年是在浓郁的东北乡土文化的氛围中度过的。他的祖母常爱找邻居大伯来说书,父亲就跟着听;有时他还溜到街上去看皮影戏,听太平歌,自己也学会了一些段子。我两岁时,那还是在上海的家里,父亲伏案工作告一段落,稍事休息时,就曾拍着巴掌教我说唱东北的童谣:“张大嫂,李大嫂,上南洼,采豆角……”还有那段叫作《两头忙》的鼓词:“说南乡来道南乡,南乡有一个王家庄……”30年代父亲在《谈“太平歌”》一文中写道:“在童年,有两种乡土的艺术,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一种是驴皮影,另一种就是‘太平歌’。……也许是这两种东西的乡土性和大众性比较强的缘故罢。……每逢年节,这两种东西给予民众很大的快乐。那不只限于城镇,而是普及到各个村庄的。……在唱驴皮影和唱‘太平歌’时,乡里村间,真是人山人海,热闹极了。”可见,在《新诗歌》的《发刊诗》中父亲所写的“我们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民



穆木天(左四)与左联的同志在一起

谣、小调、鼓词、儿歌……”等等,并不是他为了响应什么号召而发出的空洞口号,而是由于他对这些乡土文艺形式真诚的喜爱和他深知这些民间文艺形式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影响。抗战初期在武汉时,他曾向北方逃亡出来的一些老艺人学习,创作了《卢沟桥》、《八百个壮士》、《游击队雪地退兵》等大鼓词(后来集结为《抗战大鼓词》)。父亲还和原来诗歌会的杜谈、宋寒衣、柳倩等以及原来就在武汉的诗人锡金、王站林等等一起组织了“时调社”,先后出版了诗刊《时调》、《五月》,大力提供朗诵诗和其他通俗的、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多种形式的诗歌,还为一些老歌填上抗日内容的新词。

父亲对东北大野是十分爱恋的。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书,那是在粤北坪石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村边有一条小河,父亲喜欢牵着我的手,在岸边树丛旁的小路上散步。春天,望着两岸山坡上大片的红杜鹃,父亲告诉我:“在东北老家,松花江正在开江呢!江上冰块开裂的时候,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老远就能听到……”夏天,望着骄阳下的山野,他又告诉我:“在老家,高粱正晒红米呢,火红火红的一大片……”冬天的晚上,在农家的小屋里,围坐在小炭盆旁,父亲还曾说起在长白山脚下的冰天雪地里,如何罩山雀……总之,解放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几乎每一处的山水和景色都能引起父亲对故乡的思念。这种思念既使他忧郁,也使他振奋起战斗的意志。在写给我母亲的《寄慧》那首诗中父亲曾写道:“在月夜里,/我渡过了琥珀色的湘江,/湘江的水真是美丽;/我想着这一道水流过你的家乡,/如同松花江流在我的乡里。/……祖国没有得到解放和自由,/对着美丽的自然,/我永远感不到欢喜和安慰!/……如同太阳撕破江上的浓雾一样,我要用愤怒的战斗的烈火,/烧破我的忧郁。/……”

父亲的战斗形式就是写诗、翻译、教学。他做这三件事有着非常自觉的目的,那就是宣传抗日、传播先进文化、培养革命青年。早在1930年于吉林大学任教时,他就在《我的文艺生活》一文中写道:“现在我认定我们就是一个桥梁,只要我们能将青年渡过去,做什么都要紧。翻译或者强过创作。教书匠都许是要紧的。以后我就要

做桥。”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诗作大部分都收到《流亡者之歌》、《新的旅途》两本诗集中,解放前夕他还写了一些抨击时政的诗,如:《我好像到了一个鬼世界》、《谢谢你,美国人!》、《为死难文化战士静默》等。几十年里他翻译了大量法国文学和俄苏文学作品,并先后在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同济大学等处任教。当年的生活是很清苦的,有时甚至是艰苦的,但也有过许多快乐的事情。那时,在左翼文化工作者和进步人士之间、在进步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同志情谊和关系是非常好的。在我家里,一般都是静悄悄的,父亲高度近视,总是鼻尖碰着书页或稿纸,在那里看着写着;但也有热闹的时候——有时是父亲和几个朋友在一起高谈阔论,分析国内外形势,抨击国民党的时政,讽刺当局的某些党棍和狗腿子,商讨共同的行动……真可说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有时家里则充满了青年学生的欢声笑语或热烈的讨论声……

父亲是把东北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联系在一起,但他的东北情却一直在心中激荡。1949年5月他欣喜若狂地迎来上海的解放,不久就听说东北派人来上海要求给予人力支援(高级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父亲的心一下子就飞向了魂牵梦萦的故乡,当年9月他已经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任教了。这次重回故乡,似乎解开了父亲心中的东北情结,他不再为东北的命运担忧了,东北不再是他心中的十字架了。1952年父亲高高兴兴地离开长春,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担任北师大中文系外国文学室主任。当时我国的高教事业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他为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开设外国文学和儿童文学课程付出了全部精力,以至没有时间整理自己的诗稿,翻译工作也只围绕着教学的需要进行。他当年领导制订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至今还在各个高等师范院校发挥作用。至于儿童文学,他也培养了一批这方面的骨干力量,初步建立起新的教学体系。他的学生后来成为一些院校外国文学教学和儿童文学教学的主力。那时,每天除了上课、开会,他还是伏在书桌前,鼻尖碰着书页或稿纸,在那里不停地看着,写着。冬天,他还戴那种东北大皮帽;菜,还是爱吃那几样;然而,那似乎仅仅只是一种习惯了。(责任编辑 吴思)

30年代电影童星张帆

张帆是中国电影史上在 20 世纪 30 年代成名的著名童星。她出生在上海,从影已有 60 多个春秋。由于她天赋好,从小就喜欢歌唱和表演。

张帆 13 岁那年,本来是上学念书的岁数,可因为家境贫寒,被迫停学谋生。小小年纪能在社会上做什么,即使到商店也只能当一名薪水微薄的童工。没想到她赶上一个很好的机遇,当时由黎锦光、黎锦晖兄弟二人所创办的上海“明月歌剧社”正在招考,他们发现张帆有表演天才,竟然破格录取。

她庆幸自己找到一个施展才华的好天地。在剧社张帆勤奋练功,很快掌握了有关声乐方面的基本知识,而且懂得了科学发声原理以及嗓音训练的科学方法。到剧社没有多久,就受领任务登台表演了,她和黎明健(即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同台演了三部歌剧,即《葡萄仙子》、《花生米》、《小小画家》(这部歌剧主要是讽刺陈旧迂腐的读经教育)。由于表演出色,一时轰动了大上海。上海中小学的歌迷们都记住了张帆的名字。后来“明月歌剧社”易名“大中华歌舞团”。张帆随团到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巡回演出,受到当地侨胞欢迎。至今新加坡等地的老歌迷还在唱张帆演唱过的歌曲。

几年之后,张帆考入新华影业公司演员训练班,从歌坛进入到影坛。20 世纪 40 年代初,该公司拍了一部以美国女作家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所改编的电影《四姐妹》。张帆在片中演老三,这部电影一放,一炮便打响,片中的四个女主角,享誉了上海影坛。接着该片导演李萍倩专为张帆写了一部故事片,名为《天外笙歌》。故事情节是:描写一个小孤女刻苦勤奋成为歌星的故事。张帆的演技在片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
宫洁民



中年时期的张帆

解放军渡江,张帆从上海赶到南京,加入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上海解放后,张帆又连续在《情天劫》、《相思债》、《患难夫妻》、《悲天悯人》等影片中担任角色。1958 年调进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几十年来,上片多部,塑造中老年妇女角色 80 余个。先后参加过《江山多娇》、《怒潮》、《永不消逝的电波》、《秘密图纸》、《同甘共苦》等多部影视剧的拍摄。她演戏从来不挑角色,一直以甘当绿叶为乐。北影厂赶排电视剧《四世同堂》时,她饰演马老寡妇,导演说她比老北京还老北京。

八一厂拍《再生之地》,她在片中饰演日本战犯伊藤的夫人。她特地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体验生活,经过一番努力,上镜时,她将战犯夫人那种唯唯诺诺的举止神态,演得细致入微、逼真。1987 年她曾经荣获首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2001 年年底,已是 80 岁的张帆接到新加坡“老歌俱乐部”邀请,作为嘉宾到那里和 20 世纪 30 年代老友相会,她们的演唱吸引了很多的歌迷,新加坡《新民日报》作为头条新闻刊登了演唱活动。

“文革”中,张帆被打成“黄色影女”关进“牛棚”,遭到无休无止的批斗。同时,她丈夫徐一元(八一厂编剧)也因出身资本家,被押送甘肃劳动改造。他们夫妇俩和四个孩子的身心都受到极大的摧残。只因张帆有着豁达的胸怀,在生活逆境中达观知命,在十年动乱中硬是挺了过来。(责任编辑 刘家驹)

绍兴女侠丰碑——风雨亭

● 程竞明

古轩亭口是浙江绍兴城的闹市中心，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街和府横街在这里交接。轩亭，始建于唐代，久经沧桑，现已荡然无存。如今巍然耸立着一座庄严质朴的方碑，高7米，四周环以石栏。花岗石碑上镌刻着“秋瑾烈士纪念碑”七个鎏金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纪念碑的须弥座，正面刻有蔡元培撰、于右任书写的《秋瑾烈士纪念碑记》。方碑之下，南来北往凭吊先烈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瞻仰纪念碑，默读碑文，仿佛亲眼看到烈士正气凛然的英姿。

秋瑾号竞雄，别名鉴湖女侠，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第一个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女英雄，也是近代诗坛上的爱国女诗人。她曾经书写过许多声讨清

王朝的战斗檄文、革命文告和风格卓异的壮丽诗篇。有一首《对酒》写道：“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不幸的是，古轩亭口便是她洒热血化碧涛的地方。风华正茂的秋瑾在经受了各种酷刑之后，于1907年7月15日慷慨就义。当天夜里，有人在古轩亭口贴出对联：

悲哉，秋之为气；
惨矣，瑾其可怀。

上联以萧瑟秋风影射残酷镇压人民的清朝廷，下联以美玉象征坚贞不屈的革命情怀，联内

对称地嵌入烈士之名，寄托哀思。

绍兴城内卧龙山的西南峰，有一座构筑精致的“风雨亭”，与古轩亭口的纪念碑遥遥相对。这是当地人民于20世纪30年代初修建的，亭名取自革命烈士的绝命词“秋雨秋风愁煞人”。登亭便可俯视当年拘押秋瑾的典史署。风雨亭单檐六角，亭角飞挑，石柱上镌刻着孙中山题写的挽联：

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
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联内“江户”即日本。秋瑾目睹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庚子之乱，立志救国雪耻，只身东渡留学，在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等，后被推选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

解放后风雨亭几经修葺，四周葱葱茏茏，成为后人缅怀革命先烈的胜地。有联多副：

漫言半山孤亭，看气象万千，雨来风满；
不尽腔中热血，举诗篇一二，石破天惊。

巾幗拜英雄，求仁得仁又何怨；
亭台悲风雨，虽死不死终自由。

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也题写对联一副：

丹心应结平权果，碧血常开革命花。

联内“平权”指秋瑾曾在东京创办《白话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提倡男女平权，并组织了我国最早的妇女团体——共爱会。归国后在绍兴两所女校执教，又到上海创办《中国女报》，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呕心沥血。

绍兴和畅堂18号是一座粉墙黑瓦的民房，由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便是与古轩亭口纪念碑、卧龙山上风雨亭齐名的“秋瑾故居”。从1906年秋瑾由日本归国直到壮烈牺牲之前，这里是她联络革命志士、密商革命大计和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场所。

少年时代的秋瑾曾经在这里读书习武，投身革命以后，她经常身穿男装，骑马佩剑出入和畅堂。故居的墙壁上悬挂秋瑾挚友吴芝瑛赠送的对联：

英雄尚毅力，志士多苦心。

故居设有“秋瑾烈士文物陈列室”，展出手稿、信札、照片等各种珍贵文物数百件。祖籍绍兴的周恩来于1939年书写的“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儿女争光！”手迹照片也陈列在这里。

（责任编辑 南云）

《炎黄春秋》2002年(1—12期)总目录

标 题	作 者	期·页
【开 篇】		
新年絮语·····	本刊编辑部	1· 2

【春秋笔】

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艰难历程 ·····	余广人 冀一兵	1· 3
一个知识分子的两个21年·····	张彦	1·10
我因不敢为她说句公道话而遗憾终生 ——悼念贺惠君同志·····	马识途	1·15
清官问题讨论的历史教训·····	耿一民	2· 2
马寅初:决不向不以理服人的批判者投降·····	张锡金	2· 7
胡耀邦是怎样做中宣部长的·····	郑仲兵	2·11
随宋庆龄走过最后三十年·····	李云	3· 2
万里整顿铁路与违心检讨·····	张广友	3·10
张闻天:中共倡导优秀传统文化第一人·····	曾彦修	4·14
“信阳事件”及其教训·····	李锐	4·19
富庶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引起轩然大波·····	杨克现	4·23
重读赵丹遗言·····	向继东	4·28
建国前后谦虚谨慎的毛泽东·····	余广人 于保红	5· 2
鲁迅假若活在1957年·····	钟沛璋	5· 7
章士钊与陈独秀的合与争·····	邹小站	5·11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创见与失误·····	汪澍白	6· 1
周恩来临终对台湾问题的批示·····	纪敏	6· 7
五四时期的百家争鸣·····	冯建辉	6·15
庚子赔款退还办学交涉记·····	黄延复	7·61
新中国屯垦戍边实录·····	许人俊	7·65
鬼子来到我家乡·····	黎莹	7·71
怀念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仲勋同志·····	周而复	8· 1
习仲勋命运中几次转折·····	田方	8· 6
黄克诚面示我们历史地书写林彪·····	李维民	8· 8
赵树理在检讨的日子里·····	陈徒手	10·43
蔡锷与梁启超共谋讨袁·····	傅国涌	10·48
陈独秀李大钊开创早期党风·····	沈建中	11· 1
总理办公室撤销始末·····	南哲	11· 4
周恩来宋庆龄交往半世纪·····	杨明伟	12· 1

标 题	作 者	期·页
叶剑英一生两件大事·····	王文理	12· 8

【陨星篇】

从激进军人到东北主帅——《世纪老人张学良 的多彩人生》(连载二)·····	徐庆全 赵杰	1·48
“不抵抗将军”的真相——《世纪老人张学良的 多彩人生》(连载三)·····	徐庆全 赵杰	2·53
从彷徨到踏上不归路——《世纪老人张学良的 多彩人生》(连载四)·····	徐庆全 赵杰	3·30
从蒋介石的剿总司令到阶下囚——《世纪老人 张学良的多彩人生》(连载五)·····	徐庆全 赵杰	4·39
我推荐《五四前后的杨匏安》·····	于光远	5·34
五四前后的杨匏安·····	李坚	5·37
义薄云天 宁愿作囚徒——《世纪老人张学良的 多彩人生》(连载之六)·····	徐庆全 赵杰	5·42
在塑像前说父亲华岗·····	华贻芳	5·49
中共“特科”精英刘鼎的传奇经历·····	穆欣	6·40
解除囚禁后的余生——《世纪老人张学良的 多彩人生》(连载完)·····	徐庆全 赵杰	6·46
毛泽东与少年中国学会·····	吴小龙	7·52
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	叶尚志	7·58
董必武平等对待民主人士·····	吴跃农	9· 7
忆关向应将军·····	穆欣	9· 9
刘澜涛晚年的人情味·····	吴江	9·15
父亲田家英的少年时代·····	曾自	9·19
我的父亲阳翰笙·····	欧阳小华	11·32
陈沂:凡来找我的都不拒绝·····	刘国尧	11·38

【英杰谱】

内务部长曾山在“文革”中·····	万建强	4·30
李公朴两访延安·····	孙彩霞	5·26
“中国拓朴学派”的数学泰斗江泽涵·····	江春泽	6·20
铁书生周小舟·····	华强	6·25
华岗的卓越贡献与悲惨遭遇·····	赵淮青	7·42
缅怀父亲周彪:祭奠一个时代·····	周华玲	7·49
送刘英大姐西行·····	何方	10·1

总 目 录

标 题	作 者	期·页
萧克临危受命：四次城市保卫战	陈 靖	10·7
“民主三号”触礁之后	奋 如	10·14
彭老总太原前线	吴 象	11· 9
陈伯钧毛泽东的将帅情	左玉河	11·14
罗荣桓和他的家人	崔向华	12·27

【 人物志 】

陈立夫晚年呼唤两岸统一	远 梦	1·70
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率船回归记	刘 力	2·18
由国民党失意元老转为历史学家的冯自由	傅国涌	2·23
民国前总理熊希龄的风云人生	周秋光	2·26
章士钊思想演变的轨迹	袁伟时	3·38
沉痛悼念王若水同志	江 海	3·45
家父周一良教授的尴尬人生	周启锐	3·48
孙中山的执着追随者杨赓笙	李松凌	5·30
头等战犯、大法学家王世杰	傅国涌	6·68
孙中山三识袁世凯	周新国 丁慧超	8·20
乔冠华用稿费安葬自己	汤 雄	8·25
金融巨子胡笔江的遭遇	王瑞芳	8·27
为国民党官史中的黄兴正名	薛君度	9·26
胡适黄炎培共辟职业教育新路	陆发春	9·28
梁漱溟韩复榘的合作与冲突	杜 林	10·66
蔡元培的为人风范	崔志海	11·23
周惠在内蒙古推行包产到户	储建中	11·29
国民党元老吴铁城的宦海浮沉	方 可	12·40
佟麟阁——抗日名将殉国第一人	熊先煜	12·45
孙中山挚友陈友仁	钱玉莉	12·48

【 人海浪 】

我军第一个驾机远航的人	孔迎庆	2·35
方志敏的最后知音——胡逸民	张 林	2·36
保举徐向前考黄埔军校的人	何 奇	2·38
王树声警卫何福圣与许世友比武	云 龙	2·40
邵力子疾呼计划生育受挫	吴跃农	4·48
追念我的父亲民主教授费汎	费莹如	5·50
章乃器与健身之道	黎苇之	8·40
我所认识的王若水	余焕椿	9·44
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沉	殷 毅	9·50
袁殊谍海风雨 16年	尹 骐	12·52

【 亲历记 】

在北京饭店一隅感受历史脉搏	宋新民	1·18
廖盖隆“文革”中拒绝“批邓”	曾宪新	1·22
忆中国原子弹的初制	袁成隆	1·24

标 题	作 者	期·页
如果 1958 年有舆论监督	冯东书	3·26
我亲历经济理论上的一段拨乱反正	吴 江	5·18
我听叶剑英谈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	纪希晨	5·22
我在“文革”中为两位省委书记申冤	宋政厚	6·34
论文答辩受挫记——怀念哲学家周抗	应克复	7·30
老伴杨沫二三事	李蕴昌	7·34
我在右派专列上	殷 毅	7·38
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	杨金声	7·40
亲历民权门恶战	杨昭仁	10·16
我亲见亲历的荒唐工程	张登善	10·21
“天天读”备忘录	雷 颐	10·23
我奉命保护苏加诺总统的华人助理出境	马尔韦·赛兰	10·26
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	郭影秋口述 王俊义整理	11·44
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	黄宗英	12· 9
“一二·九”学生下乡宣传亲历记	霍 泛	12·12
我在非常时期接触的特殊人物	江春泽	12·16
“五七”干校祭	季 音	12·22

【 求实篇 】

江青复仇和扬帆蒙冤	尹 骐	1·40
红军西路军烈士首级照片考	李敏杰 李宣辰	2·32
中国文学史上少有之奇局	吴 江	3·22
张爱萍将军澄清一则关于红军的谣传	喻权域	3·24
邓小平的求实与反思精神	余广人	4· 2
胡耀邦关于毛主席晚年的一席谈	严如平	4· 9
庐山会议与三中全会对比随想	徐庆全	7· 1
卢沟桥事变后中日高层决策	郭汝瑰 黄玉章	7· 8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值得一读	王人广	7·18
1955年“砍社风波”真相	高化民	8·11
陶铸倡导“生产责任制”始末	丁励松	8·16
胡绳晚年谈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问题	郑 惠	8·18
反右派中新闻界“第一大案”	李 锐	9· 1
——《1957年新湖南报人》序	黄东文	9· 3
我亲历高要县三年困难时期	何 蜀	10·56
中美合作所的本来面目	刘小清	10·61
鲁迅与左联解散	鄢烈山	12·35
陈昌浩的功过是非	鄢烈山	12·35

【 沉思录 】

毛泽东黄炎培“窑洞对”随想	钟沛璋	3·17
鲁迅“立人”和现在的“做人”	王景山	3·21
民意不可违——追记《丙辰清明纪事》的出版	袁 鹰	4·56

标 题	作 者	期·页
谁都无权淡化“文革”及其教训		
——《沧桑十年》序	季羨林	6·29
——《沧桑十年》前言	马识途	6·31
重新找回马克思	吴 江	7·20
胡绳周扬现象背后	李一蠡	7·22
记者史官说真话之难	刘 野	7·26
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	江仁宝	11·20

【一家言】

何处觅清高	刘志琴	1·56
从有人骂鲁迅想到鲁迅的绝笔	康 群	1·57
由“管好身边人”想到曾国藩家书	曾彦修	2·42
永不凋谢的汉字	刘志琴	2·43
不能遗忘革命英烈	何 辛	2·44
学风三昧	郭毅生	6·66
皇帝皇权影视剧与封建主义的潜意识	张岂之	8·38
中国文化方向还是提“四化”为好	曾彦修	9·22
病中随想	任仲夷	10·51
从民粹主义想到的	李一蠡	10·52
我们需要再反一次党八股	潘家铮	11·40
恩格斯勇于否定自我	冯东书	11·42
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几点思考	李靖炎	12·30

【时代风】

倔强老人孙大光	李 锐	1·28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	奚 青	1·30
克隆植物基因之父辛世文	聂 冷	1·35

【文荟苑 文荟园】

辛巳年的启示——纪念徐霞客		
逝世 360 周年	艾 若	1·64
喻宜萱与《康定情歌》	方辉盛 文有仁	1·67
国共两党斗争中的《大公报》	舒 展	2·46
20 世纪 30 年代影坛才女艾霞	夏秋雨	2·50
于右任办报屡败屡战	刘作忠	3·56
周旋于总统间的民初第一女伶刘喜奎	齐明昌	3·63
不懂外语的翻译家林纾	牛 钊	4·64
华罗庚诗作轶事	黄子云	4·67
体坛宗师马约翰	尹大川	5·59
满纸云烟记翰林	刘建业	5·62
牟作云梦系五环旗	李玲修	6·54
巴金的爱情与婚姻	明 红	6·62
儒雅君子孙道临	宫洁民	6·64
蒋劲华的手撕“书法”	傅宁军	6·65

标 题	作 者	期·页
《歌八百壮士》作曲者夏之秋	方辉盛 文有仁	8·33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一代报人张季鸾	傅国涌	9·56
王铃协助李约瑟写《中国科学技术史》	倪怡中	9·61
沈从文与几位文化名人的交往	魏家骏	10·70
一首当代名诗及其作者之谜	袁小伦	10·75
赵匡胤千里送京娘	张西帆	10·76
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新舞台”	李仲明	11·69
龙江剧创建者白淑贤	曲润海	11·72
朝鲜前线第一个《人民日报》记者李庄	申 春	12·70
东北大野诗人穆木天	穆立立	12·72
30 年代电影童星张帆	宫洁民	12·75

【文史阁】

追寻“国际纵队”的华人史迹	张至善	8·46
钱钟书英译“毛选”	王 冰	9·75

【挚友情、怀念集】

中国有个欧远方	于光远	4·34
独立思考在晚年	杜导正	4·36
韦君宜在“鲜花”中远行	吴学昭	4·58
杨虎城么女杨拯陆献身大西北	李升旗	4·62
闻一多与张光年的忘年交	闻黎明	5·23
追思孙犁老师	徐光耀	11·54
“好婆婆”莫艾	周建英	11·58

【两岸情、同心结】

日军弹药车旁的遗书	刘大为 傅 克	6·37
中国第一位日语播音员原清志	孙建和	6·39

【时政篇】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致李岷阳同志书	吴 江	1·38

【遗闻录】

溥仪是怎样走近日本的	爱新觉罗·毓贻	2·73
顾祝同枪杀报纸编辑刘煜生	散 木	2·76
傅斯年怒斥孔宋豪门	郭汾阳	3·50
民国省长杨增新处理沙俄扰疆事件	王俊彦	4·52
黄郛替蒋介石跳火坑	方 可	5·54
周佛海与汪精卫的恩怨	闻少华	8·62
马步芳:从“青海王”到“流氓大使”	金伯雄	8·67
在新加坡追思孙中山	杨兆麟	9·35
忆远征缅甸的戴安澜将军	王楚英	9·40
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		
——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	杨天石	11·62

总 目 录

标 题	作 者	期·页
邓拓收购名画的风波·····	苏双碧 王宏志	11·65
汪精卫何以曾为孙中山的“接班人” ·····	王 勇 那孝伟	12·66

【古今谈】

“孝”是否还属于现代道德·····	官伟勋	3·52
中国历代精简:冗员必胜·····	吴 思	7·74
南阳知府衙门·····	冯兴阁	7·79
崇祯自缢煤山前后·····	张德信	8·68
包拯的际遇与退化·····	张国华	9·76
钱穆铁券千年播迁记·····	钱听涛	12·68

【古镜台】

略谈汉武帝的文治·····	杨生民	1·78
史实中的康熙收复台湾·····	戴 逸	2·60
评说历史疑案:“孝庄下嫁”与“顺治出家” ·····	王俊义	2·63
朱元璋的重典之治与预防犯罪之策·····	江仁宝	2·67
李世民纳谏的前后变化·····	徐澄清	2·70
春秋时期“法制”思想先驱管仲·····	江仁宝	4·74
中国历史上官妓及其它·····	官伟勋	6·72
赤壁之战中的张昭·····	纪拥军	6·75
酷吏与酷刑·····	舒 展	6·76
欧阳修忠君误国·····	官伟勋	10·77

【九州景】

青州思古·····	梁 衡	1·58
青海的撒拉族之乡·····	杨兆麟	1·60
历经沧桑的雷峰塔·····	方 柯	1·62
芳草萋萋鹦鹉洲·····	程竟明	2·80
张自忠路两座大宅的故事·····	黄秀雄	3·80
宜昌小峰悬棺·····	李华章	6·80
神秘的龙泉青瓷·····	刘振贵 孟凡夏	8·78
屈原流放地溆浦·····	李华章	11·77
“苏三监狱”与《玉堂春》·····	谈 风	11·79
绍兴女侠丰碑——风雨亭·····	程竟明	12·76

【他山石】

土耳其现代化历程的启示·····	雷 颐	3·74
拯救美国的“扒粪运动”·····	雷 颐	4·70
杰出的人文主义者米朗多拉·····	张椿年	5·65
诀别“斯大林模式”·····	李冰封	8·72
挑战中世纪教会权威的生理学家哈维·····	赵文洪	8·76

标 题	作 者	期·页
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的财富观·····	张椿年	9·63
苏联剧变的再思考·····	田 森	12·60

【友谊桥】

比尔·盖茨之母的中国情缘·····	陈 立	1·73
内山完造“生为中华友 死作华中土”·····	高 梁	9·68
德国“巧克力大王”的中国情·····	李世隆	9·72

【资料库】

为蒋家王朝经济领航的台湾技术官僚·····	孙代尧	2·78
民国时期土匪组织内幕·····	江仁宝	3·69
民国最有科学成就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李学通	6·58
国民党退台后党政关系调整素描·····	孙代尧	6·70
旧中国的军衔制度·····	徐 平	9·32

【读史录】

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 ——读季羨林《牛棚杂忆》书后·····	李 普	10·28
突破标准答案——读吴江《马克思主义是 一门大史学》·····	林京耀	10·36
彭德怀的厄运是如何注定的 ——重读《庐山会议实录》感言·····	汪澍白	10·38

【编读窗】

把《炎黄春秋》办成《资治通鉴》现代版·····	杜润生	4·78
本社召开在京作者新春座谈会·····	致 中	4·79
《炎黄春秋》编辑部约稿启事·····	本刊编辑部	9·80

【教学苑】

八年抗战中的中央大学·····	刘敬坤	5·74
-----------------	-----	------

【世纪窗】

中华民居百年之变·····	闵 杰	5·68
---------------	-----	------

【新视点】

金门厦门“小三通”—— “合则两利”的示范·····	何仲山	8·49
中华千年交通发展纪略·····	林 青	8·56

【总目录】

《炎黄春秋》2002年(1—12期)总目录 ·····	本刊编辑部	12·77
--------------------------------	-------	-------

本期：终审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审校 赵友慈

2002 /12 总第 129 期

罗荣桓和他的家人

佟麟阁——抗日名将殉国第一人

陈昌浩的功过是非

国民党元老吴铁城的宦海浮沉

汪精卫何以曾为孙中山的“接班人”

苏联巨变的再思考

ISSN 1003-1170



12>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